

# 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八十周年 纪念活动文集

中共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  
中共泰顺县委党史研究室

主 编 黄益友

副主编 周祖平

编 辑 陶汉心 周婷婷

王远萍 陈蔡玉

潘 达





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书记刘英

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组织部长粟裕

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宣传部长兼少  
共省委书记叶飞



泰顺九峰白柯湾小官庙（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旧址）



泰顺灵家山革命堡垒村纪念碑





泰顺白柯湾将军亭（粟裕夫人楚青题写亭名）



泰顺台边战斗旧址



泰顺峰文大战旧址



中共浙南特委成立旧址（泰顺峰文小南山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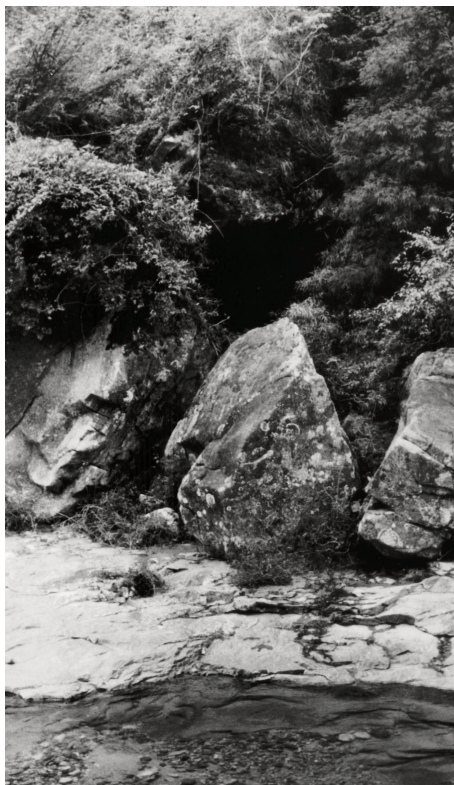




福鼎仓边村龟仔山战斗旧址



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紧急扩大会议旧址（泰顺松垟天门下牛童往）



泰顺峰文红军山洞医院（水边洞）



泰顺百丈警察所旧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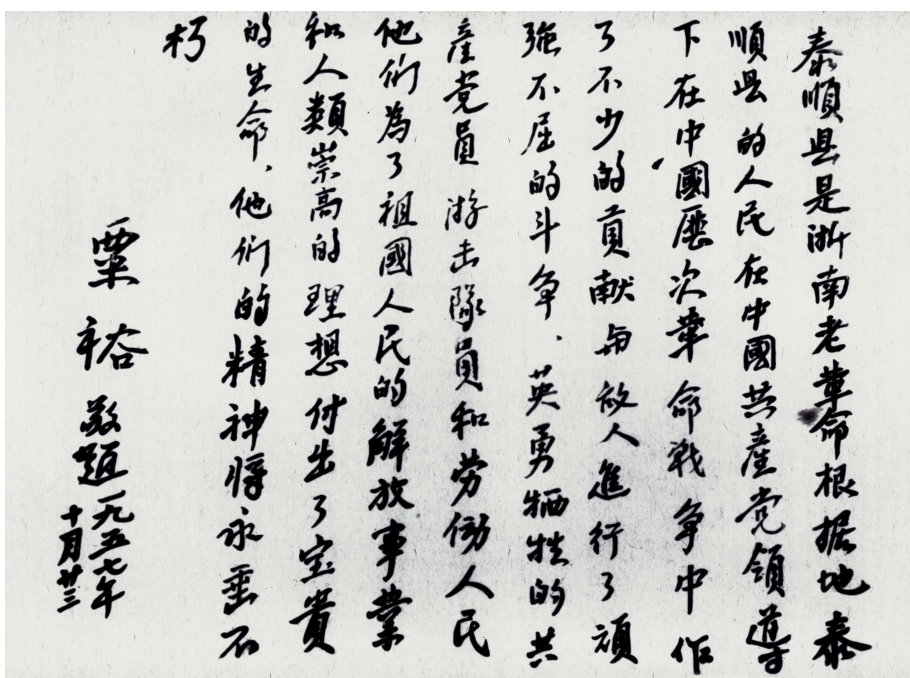


1938年3月，曾山、刘英、粟裕与即将开赴皖南抗日前线的浙南红军指战员在平阳山门合影。





1938年3月，曾山（后排左八）与刘英（左七）、粟裕（左六）等在平阳山门抗日干校合影。



泰順革命根據地  
創立五十週年紀念  
發揚革命光榮傳統  
葉飛 一九八六年十月

革命先烈浩氣長存  
繼往開來再展宏圖

慶祝泰順革命根據地創立五十週年

王永瑞 一九八六年

十月三十日



纪念泰顺革命根据地  
地创立五十周年  
发扬革命老根  
据地艰苦奋斗精神  
不怕牺牲的光荣  
传统为四化建设  
而努力奋斗！

张文碧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三日

发扬革命  
优良传统  
团结建设  
振兴泰顺  
高庆祝创立  
泰顺革命根据地  
五十周年

谢文清写

于书州  
一九八六年十月

泰顺县革命根据地创立五十周年纪念

继往开来 振兴泰顺

中共温州市委 赠  
温州市人民政府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日

緬懷英烈繼承  
遺志譜寫老區  
建設新篇章

劉小英  
劉錫榮 敬題  
乙未正月

英姿凜凜融冰柏

勁節錚錚喜雲梅

甲午年孟冬  
劉永書



紀念閩浙邊臨時省委成立八十周年

銘記歷史功績  
繼承革命傳統  
沿着新的征程  
實現復興之夢

二〇一五年秋

陳法文敬題



紀念中國浙邊臨時省成立八十周年

懷既往  
指將來  
而築夢  
永銘

甲午冬月朱樞本于北京



紀念閩浙邊臨時省委成立八十周年



繼承革命優良傳統  
完成兩個百年目標

九十五歲革命老戰士

唐炎



永樂





中央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代表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领导亲属讲话



出席纪念大会的主要领导和嘉宾



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温州市委书记陈一新讲话



中共泰顺县委书记张洪国致辞





出席纪念大会人员



出席纪念大会人员



少先队员献词



合唱团高唱革命歌曲





刘锡荣、栗戎生、叶小楠、叶葳葳、阮朝阳等嘉宾在纪念馆前植树纪念



与会嘉宾参观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纪念馆



与会嘉宾参观白柯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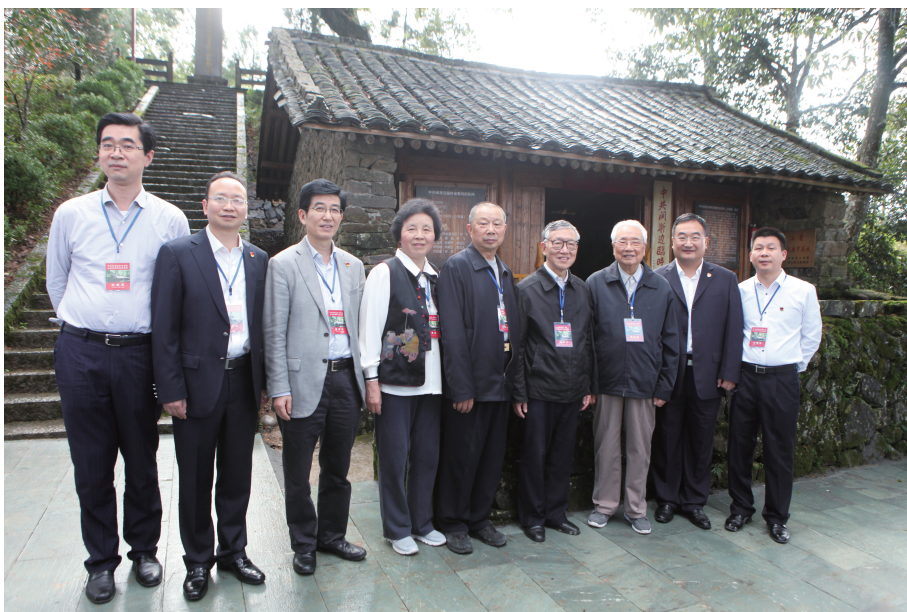


与会嘉宾参观白柯湾





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领导人亲属在白柯湾小官庙与刘英、粟裕、叶飞蜡像合影



与会嘉宾在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旧址白柯湾小官庙前合影



与会嘉宾在白柯湾将军亭阅览碑文



与会嘉宾在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纪念馆前集会





与会嘉宾在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纪念馆前集会



与会嘉宾在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纪念馆前集会



讲解员向与会嘉宾讲解革命事迹



与会嘉宾在泗溪镇北涧桥前合影



# 目 录

前 言 .....	001
-----------	-----

## 讲话篇

在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 80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	刘锡荣 009
坚定理想信念 传承革命精神 .....	粟戎生 033
在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 80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	陈一新 035
在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 80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致辞 .....	张洪国 037

## 追忆篇

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 ( 摘录 ) .....	刘 英 041
回忆浙南三年游击战争 ( 摘录 ) .....	粟 裕 053
忆三年游击战争中的粟裕同志 .....	叶 飞 060
闽浙边界革命力量的初期发展 .....	范式人 062
1935 年至 1936 年间挺进师在泰顺的革命活动 .....	龙 跃 065
关于挺进师在泰顺革命斗争的回忆片段 .....	张文碧 069

闽浙边根据地的斗争 .....	郑丹甫	072
回忆粟裕同志 .....	余龙贵	086
回忆刘英同志在白柯湾的日子 .....	吕作成	089
从反“清剿”到国共合作的转变 .....	陈 辉	092

## 传承篇

向老一辈革命家学习 .....	陈法文	101
深深怀念我的父亲阮英平 .....	阮朝阳	105
粟裕泰顺行的前后回忆 .....	鞠 开	116
青春梦想永不停歇 .....	林小露	123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的原因与教训 .....	李岳松	125
白柯湾·红色印记记 .....	思未 / 词 张俊 / 曲	135
挺进浙南 红色的辉煌 .....	陶汉心 汪航健	136
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 80 周年感赋 .....	郑云峰	140

## 聚焦篇

红色泰顺 绿色崛起 .....		143
追忆浙南烽火 传承革命精神 .....		151
继承革命光荣传统 推进绿色赶超发展 .....		160

## 前言

九一八事变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不顾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坚持对日妥协、加紧扩大内战。从1933年下半年开始，调集百万军队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挥，造成了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节节失利。为冲破国民党对苏区的“围剿”，1934年6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将红七军团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内部仍保留军团建制，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7月7日，先遣队在红军主力开始长征之前的三个月即从瑞金出发，吸引调动了大量敌军，策应红军主力突围。11月，先遣队根据中央指示进入闽浙赣苏区，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师，并合编组成红十军团，下辖两个师，对外仍称北上抗日先遣队。

1935年1月，抗日先遣队在江西怀玉山地区遭敌围击，大部分指战员英勇牺牲。粟裕、刘英率领的先行部队和从怀玉山突围出来的部分部队到达赣东北苏区，与中共闽浙赣省委会合。省委传达了中央军委1月15日指示电，命令迅速组建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境内开展游击战争，创建苏维埃根据地，以积极的作战行动打击、吸引和牵制敌人，保卫闽浙赣基本地区和邻近根据地。2月初，在闽浙赣省委的领导和省军区的帮助下，挺进师的组建工作完成。新组建的挺进师以原抗日先遣队先头部队和

突围部队为基础，加上闽浙赣军区的红三十师第一团100余人，共538人，师长粟裕，政委刘英，参谋长王永瑞，政治部主任黄富武。挺进师武器较为精良，配有重机枪4挺、轻机枪8挺、长短枪445支；指战员作战经验丰富，战斗力强，许多干部参加过中央苏区的五次反“围剿”，一般战士也有好几年的革命经历。挺进师组建后，挺进师领导分析了浙江的地理和社会环境，决定选择以仙霞岭为中心的浙西南地区创建红军游击根据地，并确定了具体的进军路线。

2月，挺进师穿过国民党军的六道封锁线，到达闽浙赣边的武夷山区。3月1日，突遭江西省保安部队的伏击，电台被毁，从此失去了同上级党组织的联系。3月23日，挺进师进入浙江江山境域。此后，活动于浙西南地区，并创建革命根据地。

挺进师在浙西南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极大震惊。1935年7月，浙江省政府在遂昌县设立了“浙南剿匪指挥部”。8月10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成立“闽赣浙皖边区清剿总指挥部”，纠集了国民党“中央军”32个团及地主武装约七八万兵力，从9月19日开始，向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发动大举进攻。

9月下旬，粟裕、刘英率红军挺进师主力120余人突围后，辗转于闽浙边的景宁、泰顺、松溪、政和、建阳、寿宁、福安等地区。10月5日，在寿宁县含溪村与叶飞率领的闽东独立师会师，双方会面后十分高兴。当日，双方移驻寿宁郑家坑自然村，召开了第一次联席会议。会议一致认为，分散在浙闽边区各地的红军游击队自从与上级失去联系后，相互隔绝，各自为战，这对反“清剿”斗争十分不利。鉴此，刘英提出：应恢复被敌人摧毁的闽浙赣临时省委，请闽北分区区委书记黄道任临时省委书记，统一领导浙西南、闽东、闽北三块游击区，以粉碎敌军的反革命“清剿”。

刘英请叶飞与黄道联系，并建议在没有联系上之前，可先成立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

这次联席会议还决定创建浙南革命根据地。会上，叶飞主动提出将有一定工作基础的福鼎、鼎平地区划给临时省委直接领导，作为省委创建浙南游击根据地的基本地区。

会后，筹备中的临时省委致信中共闽北分区区委，通报了闽东特委与挺进师政治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建议成立闽浙赣临时省委，拟邀请闽北分区区委参加闽浙赣临时省委等情况。叶飞携带此信前往闽北找到黄道。黄道对于闽北、闽东、浙西南三块游击区打通联系、相互配合的建议表示赞同，但认为马上恢复闽浙赣临时省委的条件尚不成熟，决定暂不加入。

11月7日，恰逢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日，刘英、粟裕和叶飞在泰顺县九峰乡白柯湾村村头的小宫庙举行第二次联席会议。叶飞汇报了闽北方面暂不加入闽浙赣临时省委的情况。依照先前商定意见，闽东特委和挺进师政治委员会正式决定成立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刘英、粟裕、叶飞、黄富武、阮英平、刘达云、许信昆、洪家云、范式人、方志富、许旺等11人组成闽浙边临时省委，刘英任书记，粟裕任组织部长，叶飞任宣传部长兼少共临时省委书记。同时成立闽浙边省军区，粟裕任司令员，刘英兼政委。

临时省委成立后，大力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建立健全基层党组织，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相继建立健全浙西南、闽东、浙东、浙东南、浙南五个特委及省委白区工作团、宣遂汤工委、瑞平泰县委等组织机构。临时省委还培养了一批优秀地方领导干部和革命骨干分子，锻炼和储备了一支英勇善战的队伍，在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使闽浙边革命根据地成为我国南方革命的一个重要战略支撑点和新四军的

发源地之一。临时省委机关立足于泰顺、福鼎、平阳之间，使闽东、浙南、浙西南、浙东四个游击区基本上连成一片。就临时省委成立所在地泰顺而言，全县 1933 平方公里的土地，有 630 平方公里成为革命根据地，有 1120 平方公里成为游击区，是浙南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也是闽东苏区的可靠后方。

1936 年 5 月，闽东特委退出闽浙边临时省委。1938 年 5 月，中共东南分局决定撤销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中共浙江临时省委，待中央批准后，再正式成立中共浙江省委。至此，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光荣地完成了历史使命。

2015 年是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 80 周年，刘英同志诞辰 110 周年。为了缅怀革命先辈，传承革命精神，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新时期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经中共浙江省委同意，决定举办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 80 周年纪念活动。纪念活动由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温州市委主办，中共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泰顺县委承办。

在筹备纪念活动过程中，中共泰顺县委、泰顺县人民政府精心谋划，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如面向革命亲属、领导嘉宾征集题词，拍摄反映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革命历史题材的记录片，创作纪念临时省委成立 80 周年的革命歌曲，编印反映临时省委领导根据地军民革命斗争的书籍；投资修缮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纪念馆，改建浙南红军路，建设小南山、红军山洞医院、灵家山等红色旅游设施。

11 月 7 日，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 80 周年纪念活动在浙南革命老区泰顺举行。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领导人亲属代表，挺进师转战地党史研究机构负责人，省内党史部门负责人，以及温州、泰顺的干部群众，一起重温了这段英

勇壮烈的历史。

是日上午，白柯湾上空彩球飘扬，旌旗猎猎。雄壮的革命歌曲在群峰之间回荡，修缮后的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纪念馆显得格外庄严肃穆。参加纪念活动的嘉宾在当地干部的陪同下，参观了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旧址小宫庙、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纪念馆，以及刘英、粟裕、叶飞同志的办公旧址等。其间，刘锡荣、粟戎生、叶小楠、叶葳葳、阮朝阳等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领导人的亲属还与参加纪念活动的其他嘉宾合影，并挥锹培土，植树纪念。下午，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 80 周年纪念大会在县城影剧院隆重召开。受邀的各位领导嘉宾，泰顺县四套领导班子成员，全县各部门、各乡镇主要负责人，泰顺“三老”人员，驻泰部队官兵，各界群众代表出席纪念大会。中共泰顺县委书记张洪国致欢迎辞；刘锡荣同志代表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领导人亲属，回顾了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带领根据地军民浴血奋战的光辉历史，表达了对革命前辈的崇高敬意与深切怀念；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温州市委书记陈一新作重要讲话。纪念大会由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金延锋主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和营养剂。为了铭记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的光辉历史，加强地方党史宣传教育，中共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泰顺县委党史研究室编印了《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 80 周年纪念活动文集》。《文集》汇集领导嘉宾在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新闻媒体对纪念活动的报道、部分纪念活动的现场照片，以及反映临时省委领导根据地军民革命斗争的题词、图片、文章、诗词等。

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带领根据地军民的革命斗争史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编印《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 80 周年纪

念活动文集》，既是对此次纪念活动的总结，也是对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开展革命斗争历史的再次宣传。在此，我们希望广大读者从中汲取精神力量，勇当革命优良传统的传播者与践行者，切实肩负起历史赋予的神圣使命，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 讲话篇





# 在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 80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刘锡荣

各位领导，各位老同志，各位革命老前辈的亲属，革命老区的乡亲们，各位来宾，同志们：

大家好！

在举世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之际，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温州市委主办，中共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泰顺县委承办的“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 80 周年纪念大会”，对我们大家共同重温光荣的党史军史，缅怀学习革命先烈和先辈的丰功伟绩、崇高的革命献身精神和优秀的品德作风，继承人民英雄的遗志，团结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意义重大。

提到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就不能不提及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和挺进师。1934 年 7 月 7 日，先遣队早于红军主力长征三个月，提前从瑞金出发，吸引调动了大量敌军，掩护红军主力突围。方志敏作为北上抗日先遣队军政委员会主席，是先遣队最高领导人。先遣队先后由红军最年轻的军团长寻淮洲和刘畴西任军团长，粟裕伯伯任参谋长，我父亲刘英任政治部主任。先遣队转战闽浙赣皖，所到之处撒传单、贴标语、作讲演，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团结抗日主张，播撒抗日救国火种。

1935 年 1 月，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江西怀玉山地区被七倍于我的国民党部队堵击包围，遭到失败。方志敏不幸被捕，在狱中大

义凛然，坚贞不屈，还指定先遣队 20 师乔信明参谋长任狱中党支部书记，组织难友与敌人开展不屈不挠的斗争。同年 8 月，方志敏在南昌慷慨就义。在狱中，他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等近 20 万字的不朽著作，还做通监狱看守人员工作，经上海鲁迅先生将遗作送到延安。这些著作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

1935 年 1 月下旬，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先头部队和突围部队到达赣东北苏区，与中共闽浙赣省委会合。省委传达了中央军委 1 月 15 日指示电，命令以抗日先遣队先头部队和突围部队为基础，迅速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长期行动。中央赋予挺进师的任务是：“进入浙江境内，开展游击战争，创建苏维埃根据地，以积极的作战行动，打击、吸引和牵制敌人，保卫闽浙赣基本地区和邻近根据地。并从战略上配合主力红军行动。”2 月初，挺进师的组建工作完成，共 538 人，粟裕伯伯任师长，我父亲任政委，王蕴瑞任参谋长。挺进师领导分析了浙江的地理和社会环境，决定选择以仙霞岭为中心的浙西南地区作为创建红军游击根据地的目标，并确定了具体的进军路线。

挺进师组建后，穿过国民党军六道封锁线，到达闽浙赣边的武夷山区。3 月 1 日，突遭江西省保安部队的伏击，电台被毁，从此失去了同中共中央分局及闽浙赣省委的联系。3 月上旬，挺进师进入闽北苏区。为加强对党政军工作的统一领导，挺进师成立了师政治委员会，由刘英、粟裕、黄富武、宗孟平、王维信、姚阿宝、洪家云、刘达云、方志富等 9 人组成，刘英任书记。4 月下旬，挺进师在浙江庆元的斋郎地区遭到国民党浙江保安第一团和福建保安第二团共 2200 余人及当地大刀会等近千人地主武装的分进合击。4 月 28 日，挺进师以少胜多，打败了国民党军

的进攻，毙伤 300 余人，俘虏近 200 人，缴获多挺机枪和大量步枪子弹。斋郎战斗是挺进师入浙后的关键一仗，迫使龙泉河以南的国民党军转攻为守，为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创建提供了条件。1935 年 5 月上旬，挺进师召开政治委员会会议，决定成立浙西南特委，宗孟平任书记，师部于 7 月进驻了具有特殊的政治经济地理有利条件的丽水遂昌县王村口，领导浙西南人民全面建设革命根据地，开展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到 1935 年 8 月底，挺进师已拥有 5 个纵队，发展到近千人，连同地方工作人员共计 2000 余人。在短短的四个多月中，创建了以仙霞岭为中心的方圆一百余公里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完成了挺进师入浙作战的最初目标。父亲在安徽黄山谭家桥战斗中右手严重负伤，大量出血不止，生命垂危。方志敏指示卫生部长张德华为父亲动手术，挽救了父亲生命。当时没有麻醉药，父亲以坚强毅力，口咬毛巾，忍受剧痛，做完手术。大家都称父亲是“红军关公”。但手术后留下右手功能障碍，不能写字拿筷子。父亲就坚持用左手写字打枪，坚持战斗。粟裕伯伯左手也负过伤，所以当时有“师长政委两人一双手”的说法。但就是这一双手，打得国民党后院天翻地覆。

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建立，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极大震惊，国民党浙江当局的喉舌《东南日报》惊呼：“浙江素称平安之区，自粟刘窜浙后，匪化已波及全浙，以目下形势来论，浙江共匪不亚于四川、江西之匪。若当局未能迅速肃清，前途实堪可虑。”浙江是蒋介石、陈诚、汤恩伯、胡宗南等国民党高层人物的老家，江浙财阀是南京国民政府赖以生存的经济后盾。红军在浙江建立党组织、根据地，就等于在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心脏”扎上一把尖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这是国民党当局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的。解放前浙江先后共有中共十一位省委书记（临时书记），就有九

位牺牲。在我父亲就义前牺牲的八位省委书记是王家漠、张秋人、夏曦、李硕勋、徐英、卓兰芳、罗学瓚、龙大道，八位烈士足见浙江国共两党的斗争是非常残酷而长期的。1935年7月，浙江省政府在遂昌县设立了浙南剿匪指挥部。8月10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任命卫立煌和第18军军长罗卓英为“闽赣浙皖边区清剿总指挥部”正副总指挥。国民党32个团，连同地主武装号称40个团，共约七八万兵力，从9月19日开始，向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发起大举进攻。

1935年9月下旬，粟裕伯伯和我父亲率领挺进师主力突围后，辗转于闽浙边的景宁、泰顺、松溪、政和、建阳、寿宁、福安等地区。挺进师留守浙西南的两个纵队没有从以往的运动战完全摆脱出来，与国民党军正面对抗，结果损失殆尽，黄富武被捕牺牲。松遂龙游游击纵队指挥陈凤山、副总指挥卢子敬和玉岩边苏维埃政府主席陈丹山也先后牺牲。

1935年10月5日，挺进师主力在福建省寿宁县郑家坑与闽东特委和闽东独立师主要负责人叶飞、阮英平、范式人等会师。这是叶飞与粟裕和我父亲第二次见面。第一次见面是一年前，1934年8月，北上抗日先遣队在福州城北和国民党守军王敬久的87师打了一仗，歼灭敌人一个前卫团，俘获甚多，但我方伤亡也很大，单伤员就有700多人，先遣队领导紧急商议后决定，由粟裕率领一支部队狙击敌人掩护主力撤退，刘英负责护送伤员到罗源、连江一带的闽东游击区，与率领闽东独立二团的叶飞会师。在闽东党组织、游击队及广大革命群众热情接待和大力支持下，众多伤员得到妥善安置。第二次会师时，闽东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也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已久，热情欢迎挺进师的到来。为了协同对敌斗争，双方领导人召开了联席会议。据《叶飞传》记载：“当

时，刘英说，现在，敌人的剿匪指挥部已经从江西上饶搬到浙江江山，目标就是集中力量“围剿”我闽北、浙西南、闽东三块根据地。我们应该抓紧恢复被敌人摧毁的闽浙赣临时省委，请黄道同志任书记，重新树起闽浙赣三省革命指挥部的大旗。”对这想法，大家都很赞同。独立师师长叶飞主动提出：“在与黄道同志取得联系之前，我们可以先联合起来，挺进师、独立师两支部队改编，闽东特委、独立师接受你们领导。”会后，即致信中共闽北分区委，通报了闽东特委与浙西南政委会举行联席会议以及筹备成立闽浙边临时省委等情况，并邀请闽北分区委参加闽浙边临时省委。叶飞携带此信前往闽北找到了黄道书记。黄道对于闽北、闽东、浙西南三块游击区打通联系、相互配合的建议表示赞同，但认为马上成立中共闽浙赣省委，条件尚不成熟，决定暂不加入临时省委。

11月初，叶飞回到闽东，7日在浙江泰顺县白柯湾村小宫庙与我父亲、粟裕伯伯再次举行联席会议，传达了黄道书记的意见。鉴于闽北方面不参加临时省委，按照原商定的意见，闽浙边临时省委正式宣布成立，由刘英、粟裕、叶飞、黄富武、刘达云、阮英平、范式人、许信焜、方志富、洪家云、许旺 11 人组成，刘英任书记，粟裕任组织部长，叶飞任宣传部长兼少共临时省委书记，下辖浙西南和闽东两个特委。同时成立了闽浙边临时省军区，粟裕为司令员，刘英为政委。后闽东叶飞、范式人两位领导人主动提出，闽东特委将有一定工作基础的福鼎、鼎平地区划给临时省委直接领导，作为省委在创建浙南游击根据地时的基本地区。闽东特委和独立师主要领导人如此支持临时省委工作难能可贵，粟裕、刘英十分高兴感动。在红军挺进师入浙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闽东地区革命运动已逐渐向福鼎、平阳、泰顺边区发展。1934 年 3 月，泰顺出现了第一个红色政权——岭上湾乡苏维埃政



府。5月，霞鼎泰县苏维埃政府成立。1934年至1935年间，中共闽东特委在泰顺县境内建立了中共寿泰县委，下辖三个区委。同时闽东特委在福建省内建立的三个县委其活动范围都伸展到泰顺县。闽东党组织还在泰顺县境内建立了寿泰县游击队（独立营），共78人，县队下属游击队7支，共200多人。游击队在独立师指挥下，经常出击攻打泰顺的国民党地方武装。工作基础很好，为挺进师创建与发展浙南游击根据地奠定了坚实基础。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后，闽东和浙南方面关系密切，在反“围剿”中双方紧密配合，协同作战，取得了显著成绩。挺进师还派了一些军事干部和做肃反工作的保卫局干部，帮助闽东方面开展工作。粟裕、叶飞两位将领不时在一起交流对游击战的看法。如独立师采用昼伏夜战，依靠群众提供情报，“狡兔三窟”甩掉敌人跟踪的“尾巴”等游击战术，对打惯了运动战的挺进师很有启示。挺进师还学习闽东红军用毛竹叉与步枪结合的办法制服了大刀会。挺进师在战斗中缴获的武器除重机枪外也送给独立师。

闽浙边临时省委的成立，极大鼓舞了红军挺进师广大指战员的斗志和信心。从1935年11月上旬开始，挺进师以急行军方式席卷瑞安、平阳、泰顺三县九个重镇。与此同时，临时省委则活动于平阳、泰顺、福鼎、庆元、松溪、寿宁等县之间。12月，临时省委决定建立瑞平泰县委，书记周建生，组织部长陈昌会，宣传部长林辉山，下设两个区委，鼎泰区委书记郑丹甫，泰平区委书记周建生。这是红军挺进师进入浙南建立的第一块根据地。1935年11月，成立了以刘达云为书记的浙东特委，统一领导浙东游击根据地的对敌斗争。

据《粟裕回忆录》记载：“临时省委成立以后，面对敌人不受调动，集中力量摧残我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反革命策略，我



们立即着手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除令北渡瓯江的第一纵队加紧向浙东地区发展外，重点放在开辟浙南地区的游击根据地。浙南地区，主要是瓯江下游以南的广大地区，东濒东海，南接闽东，山岭连绵，地形险要。它比浙西南地区有两个更为有利的条件：一是 1924 年这里就有党的活动（成立了中共温州独立支部），1929 年冬天以后的两年间，党在这里领导过武装暴动，（1930 年，根据党中央指示，浙南红军游击队统一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5 月，十三军军部在温州永嘉县成立，军长胡公冕，政委金贯真，政治部主任陈文杰）红十三军的旗帜曾插到瓯江两岸的许多乡镇，在群众中留有很深的影响。此时在平阳、福鼎已有闽东党的工作，可以互为依靠。二是这里离浙赣线较远，国民党统治势力比较薄弱。于是，我们由闽浙边向东北行动，攻下了渊溪镇，立足于瑞安、平阳、泰顺三县之间，以此为枢纽向东南和东北方向发展，一直打到瓯江南部，直抵东海之滨。接着，我们又出动主力，兜了两个大圈子，攻克了瑞平泰外围敌人许多重要市镇和据点，如云和之东坑、梅岐、沙湾、渤海、大顺、小顺、文成、云南田、西坑、黄坦、大岙、玉壶、岙口、瑞安的营前高楼、湖岭、马屿、陶山、平阳坑、泰顺的百丈口、左溪、泗溪、仕阳、平阳的水头街、山门、腾蛟、苍南的莒溪、福鼎的南溪等地。局面打开后，临时省委确定刘英同志带少数短枪和省委机关在瑞平泰地区开展游击根据地的建设工作，粟裕则率领武装部队在闽浙边进进出出，从浙江打到福建，又从福建打到浙江，吸引和打击敌人，以掩护和保卫省委开展工作，并支援浙西南地区 and 闽东地区的斗争。我浙南游击区经受严峻考验的重要时期，我浙西南游击根据地暂时丧失了，但我们在浙南地区又开辟了大块游击根据地，游击战则在浙西南、浙闽边、浙东、浙南更广泛的区域展开了。

从总体上看，罗卓英的三四十个团的‘围剿’并没有打败我们，我们获得了新的胜利。”

1936年初，刘英则率领省委机关工作人员进入鼎平基本地区，在桥亭乡文垟村与鼎平中心县委会师。从鼎平抽调了一批干部到泰顺和瑞平边接替挺进师干部工作，并成立了泰顺县委，由原鼎平上东区委书记周建生担任县委书记。6月，周建生调平阳县委工作后，泰顺县委书记由周钦明接任。父亲率省委机关和特务班在地方干部和游击队的配合下，连续打了几个胜仗，拔掉了浙南基本区的一批“钉子”。3月，临时省委在泰顺县峰文乡小南山召开会议，决定建立浙南特委，郑宗毓任书记，同时，闽东特委将所辖鼎平中心县委、福鼎县委划归刚成立的浙南特委领导，临时省委从泰顺移至福鼎。1936年春夏之交，以泰顺、平阳、瑞安、福鼎等县边界为中心的浙南游击根据地形成。

1936年2月2日，闽浙边临时省委召开会议，确定了进一步开展武装斗争与群众工作紧密配合的斗争方针，决定由粟裕任挺进师政委会书记，并把公开发动群众与秘密工作结合起来；以挺进师第三纵队第七支队和第五纵队第十三支队为基础组成浙西南独立师，粟裕为省委代表兼师长，谢文清任政委，张友昆任政治部主任，任务是返回浙西南牵制和打击国民党军，以掩护和保卫省委在浙南开展工作。

粟裕率领浙西南独立师重返浙西南后，击溃了前来阻击的国民党军和民团武装，攻占一些乡镇，站稳了阵脚。1936年6月，两广事变爆发后，罗卓英的第18军从浙江调往湖南。浙江境内敌情趋缓。临时省委根据新的形势，决定重建浙西南特委，书记许信焜，并重建第二纵队，赵春和为纵队长，张文碧为政委。粟裕率部收复了遂昌王村口和龙泉住溪两个重要据点。重建了龙浦、

龙遂、江浦三个县委及王村口、住龙等区委。紧接着，粟裕又挥师转战宣平、武义、永康、缙云等地，以松（阳）遂（昌）龙（泉）边界为中心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逐渐得到恢复。7 月，粟裕率部回到浙南与省委会合。1936 年 8 月，闽浙边临时省委在福鼎李家山召开了第十次扩大会议，会议对本年 2 月以来的工作进行检查和总结，并对今后游击战争的开展，游击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党和共青团的建设，以及群众运动开展等都作了新的部署。会议决定粟裕为挺进师省委代表、许信焜为挺进师政委会主任，刘达云为临时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增补龙跃、谢文清为临时省委委员。

1936 年，泰顺革命斗争进入鼎盛阶段。根据地群众革命热情高涨，迫切要求实行土地分配。早在 1935 年 10 月在闽东苏区管辖的泰顺境内，曾首先发动了分粮斗争。闽浙边临时省委于 1936 年 6 月，在瑞平泰县委所辖的排头村（今属福建福鼎）开会，决定当年冬天在部分县进行土地革命。临时省委规定了 6 条政策原则，并成立了浙南人民革命委员会来具体领导土地革命。由原瑞平泰中心县委书记郑丹甫任主席，委员陈辉、蔡爱凤。至 8 月先后由 6 个县、16 个区成立了人民革命委员会，建立了乡村二级政权，颁发了苏维埃公民证。

从 1936 年春夏到 11 月的半年时间，是挺进师进入浙江以来斗争环境最好、发展最顺利的时期。闽浙边临时省委和挺进师抓住了国民党主力部队在两广事变后撤离浙江省的有利时机，创建扩大浙南游击根据地，恢复和开辟了浙西南和浙东等游击根据地和游击点。游击战争的范围到达闽浙边界两侧，浙江南部、金（华）衢（州）盆地以及台州部分地区，共计 30 多个县，纵横 200 余公里。党员发展到 3000 余人，地方工作干部 500 多人，部队发展到 1500 余人，还有数千人的地方游击队和群众武装。根据地普遍建立了

党团基层组织和贫民团、工会、妇女会、少先队等群众组织。

红军挺进师在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历尽磨难，不但没有被打垮，反而发展壮大革命队伍，建立了浙南游击根据地，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实属罕见。这与在红军挺进师最困难的岁月里，浙南人民给予子弟兵极大支持是分不开的。在辽阔的浙南大地上，到处都流传着拥军爱民的动人故事。如泰顺县南院乡棠坪村刘素珍母子四人先后参加革命，支持红军挺进师，最后在1936年先后壮烈牺牲，“一门四英烈”，感人至深。如1937年2月，著名的峰文大战之后，红军有30多名重伤员难以随军转战，急需安置救治。刘英决定在泰顺县峰文乡双溪口村一带利用天然岩洞，安置医治伤病员。双溪口村党支部书记黄明星毅然接受了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他带领周围各村的党支部，将伤病员秘密安置在人迹罕至的几个山洞内，送被送饭，悉心照料。根据当地郎中指点，就地采药治疗伤病员。在救护红军伤病员的当地革命群众中，有被敌人严刑毒打拷问而守口如瓶的，有被搜山敌人枪杀的，还有大爱救重伤员的“浙南红嫂”。在众多村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八个月的艰辛医疗，30多位重伤员除1名牺牲、2名被捕、1名叛变外，其他都安全被保护下来，治好了伤病，重返战斗岗位。平阳县农民领袖郑海啸，一心支持革命，一门三英烈。大女儿郑明德也是中共党员。一次为掩护战友，持枪断后，负伤被俘。受尽刑讯折磨，坚贞不屈。被害前，还把脚上一双力士鞋脱给拉她上刑场的黄包车夫，从容就义，年仅十八岁，被誉为“浙南刘胡兰”。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1939年在平阳县召开，已任中共平阳县委书记的郑海啸伯伯除安排好一切会务外，还亲自承担大会保卫工作，使省党代会顺利召开，胜利闭幕。粟裕伯伯和我父亲都亲切称他为“老海”，解放后任

温州第一任专员。

挺进师进入闽浙边区和浙南后，福建话、温州话都很难听懂，像到了外国一样，向当地群众借东西问事要靠做手势，向群众做宣传、作调查，需要有人翻译。闽浙边临时省委领导人除了自己带头学习方言外，还要求广大指战员加强学习当地方言。因为工作急需，省委就着重抓了对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教育和培养。除郑丹甫外，还有刘清扬、郑奎、陈希简、郑香山等。省委把他们调到省委机关做翻译和文字工作，定期派到基层做群众工作。这些同志都有很大进步，后来都分配到各县担负了相当重要的工作。郑丹甫成了鼎泰县和泰顺东部一带群众领袖，威信很高，解放后任福建省政协副主席；其夫人任曼君（任弼时的妹妹）也曾在浙南战斗过，一度被捕被当地游击队和群众救出，解放后任福建省人大副主任。这段时间，省委也亲自培养了一批当地工农干部，如郭道欵、林老缺、郑老八、周广达、刘宝生、陈辉、蔡爱凤、黄明星、苏君忠、夏梅山等同志。由于重视对知识分子干部和当地群众领袖的培养，党的领导机关与广大群众的关系更密切了。在三年游击战争中，从浙南基本地区调出了大批干部，有力支持了浙西南和浙东南。

新组建的闽浙边临时省委和红军挺进师正处在国民党的残酷“清剿”之中，环境十分恶劣。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临时省委想方设法搜集国民党出版的报刊和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刊物、书籍，从中分析国内革命形势的变化，了解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特别是从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杂志上，了解到许多全国性的重大事件，如党中央和主力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北平“一二·九”青年学生爱国运动后全国掀起的抗日救亡运动，以及中国共产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等，这些对于处在几乎与外

界隔绝的紧张、艰苦的游击战争环境中的闽浙边临时省委来说是极为珍贵的。从中省委领导预见到全国抗日高潮即将到来，党中央的政策将会有重大的转变。

与此同时，临时省委还对外发表宣言和公开信，宣传党的抗日主张。1936年1月6日，发表了《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致北平学生书》的《快邮代电》，声援北平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两广事变爆发后，刘英、粟裕分别以临时省委和挺进师政治部名义，在浙南和浙西南发表宣言，揭露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反对军阀内战，要求国民党放弃反共，枪口对外，团结抗日。6月上旬，临时省委又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增兵平津《告全国民众书》，呼吁“举国一致，共赴国难，停止内战，枪口向外，为挽救危机而作正义的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为保障国土完整坚决抗战除奸。”这些宣言和通电的内容，和党中央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完全是一致的。

临时省委还在具体政策和策略上作了一系列调整，以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为了扩大团结对象，缩小打击目标，改变了过去打土豪的办法，把“没收委员会”改为“征收委员会”，把没收地主豪绅的财产改为征收“抗日捐”，对国民党的乡镇、保长由严厉惩治改为尽可能予以争取；对地方上的士绅和中等商人的进步表示欢迎，中立的也允许来去自由，其经营不受侵犯；对国民党军政策由“欢迎白军士兵杀死长官，拖枪当红军”改为“欢迎白军官兵枪口对外，同红军一起共同抗日”；把“穷人不打穷人”的口号改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重视团结争取知识分子的工作和争取团结工商业者，让平原城镇的客商进山做买卖，发展山区经济，改善群众生活。这些具体政策的调整，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1936 年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接受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倡议，停止了对陕甘宁边区主力红军的军事进攻。然而在南方却执行“北和南剿”的方针，不但没有放松对南方游击根据地的“清剿”，反而变本加厉加紧部署新的更大规模的“清剿”。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从湖南调第四路军进驻闽浙赣皖边区，并在浙江江山设立了以刘建绪为主任的“闽浙赣皖边区主任公署”，计划将四省划分为三个“清剿”区：皖浙赣边区、赣浙闽边区、浙南地区。在浙江云和县设立“清剿”指挥部。“清剿”红军的国民党军有 6 个师、2 个独立旅，连同地方保安团共计 43 个团，10 余万兵力。

国民党在“清剿”皖浙赣游击根据地后，即对浙南游击根据地进行了第二次大“清剿”。1937 年 1 月 15 日，刘建绪亲自指挥向浙南红军挺进师发起进攻，向泰顺峰文进攻。粟裕伯伯、我父亲率挺进师主力在简垟大山峡伏击国民党军，歼敌数百人。然后趁大雾弥漫之际，迅速将部队转移。面对严峻形势，2 月中旬，闽浙边临时省委在泰顺县牛童往召开会议，吸取了皖浙赣根据地丧失的教训。省委确定了“隐蔽精干，保存力量，机动灵活，积极作战”的方针，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打游击。我父亲率领省委机关和特务队北渡飞云江到永（嘉）瑞（安）平（阳）泰（顺）边区活动，粟裕伯伯率挺进师主力回浙西南地区活动。1937 年 3 月，临时省委决定由龙跃任浙南特委书记。在浙南特委领导下组成武装工作团，下设武装工作队或武装工作组，时而集中，时而分散，机动灵活地同国民党军周旋。3 月间，由浙南党组织派往上海学习的吴毓回到温州，带来了中央驻上海办事处交刘英的同年 2 月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五项要求、四项保证”的电文。吴毓、陈铁军、黄先河先以临时省委和临时省军区司令

部名义发布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致国民党闽赣浙皖边区主任公署和闽浙两省当局的快邮代电》。国民党浙江地区当局接到快邮代电后，在5月2日的《浙瓠日报》上刊登“启事”，表示愿意与闽浙边临时省委代表“面洽”。为此，临时省委在平阳北港三门乡大墩村召开了专门会议。临时省委认为敌强我弱，这次谈判很少有实现可能。但是，为了宣传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扩大党和红军的影响，争取政治上的主动，决定还是派代表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5月7日，闽浙边临时省委派吴毓、龙跃和陈铁军三人为代表在平阳北港区山门畴溪小学与国民党四省边区主任公署代表邓切等举行会谈。我方还请了当地知名人士畴溪小学校长邓野农等人以地方公证人士身份列席会议。临时省委代表提出了五项保证和五项要求。但国民党当局对这次和谈毫无诚意，并提出了极其苛刻的条件：一是闽浙边红军接收改编，统一由国民政府领导调遣；二是红军所有干部全部集中在南京受训，然后另行分配工作。显而易见，国民党当局想在谈判桌上达到他们在战场上没有达到的消灭红军与消灭浙南游击根据地的目的。因此，遭到了临时省委的拒绝。和谈破裂后，国民党军继续大举进攻。挺进师采取以逸待劳，避实击虚，出其不意的袭击和伏击国民党军队，并进一步将力量分散。挺进师有分有合，灵活机动，国民党军防不胜防，疲于奔命。即使是国民党闽浙赣皖边区公署主任刘建绪亲自率兵到瑞安、平阳“督剿”，也无法找到挺进师主力进行决战，沮丧地承认：“以数万之众，剿千百之匪，数月于兹，未奏肤功。”挺进师在国民党第二次大“清剿”中，虽然也遭到重大损失，但终于胜利坚持下来了。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突然向中国驻军进攻，中国官兵奋起抵抗，此即七七事变。中华民族



全面抗战从此开始。第二天，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就发出通电和宣言，再次敦促蒋介石、国民党闽浙赣皖四省边区主任刘建绪，在国难已到生死存亡最后关头，应无条件的首先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建议与国民党当局再次举行和平谈判。党中央也十分关怀红军游击队的命运，请贺龙写信给早年同学刘建绪，呼吁化干戈为玉帛，和红军携手共同抗日。在这种情况下，8月下旬，刘建绪释放了在战斗中受伤被俘的闽浙边临时省委谈判代表陈铁军，让他带去给刘英、关英、黄道的亲笔信，同意重开谈判。同时把贺龙写给刘建绪的信一并带上送交我父亲，以示诚意。8月24日，闽浙边临时省委谈判代表吴毓、陈铁军、黄耕夫与刘建绪的代表邓切在温州申江旅馆进行第二次谈判。在谈判中，临时省委代表在坚持共产党独立、批评自由以及保持红军武装独立性等前提下，作了适当让步。国民党方面也不再坚持原先的苛刻条件，双方初步达成五项协议。

1936年7月，以叶挺鹏为书记、吴毓为组织委员、黄先河为农运委员、陈铁军为军事委员、杨进（林怡）为宣传委员的浙南临时革命委员会通过派到上海的交通员杨进与中央驻上海办事处取得联系，上海办事处交给他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和《红军要求南京政府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等文件，并交代杨进要设法找到刘英、粟裕率领的红军部队，把党中央的文件转交给他们。8月，父亲接到文件后，立即向党中央写了有关情况报告，9月初派林秋侠送到中央办事处。林秋侠即著名的林心平烈士，是杨进的妹妹。当时年仅17岁，临行前她表示“宁可丢头颅，决不失机密。”她携密件赴上海，千方百计找到中共中央驻上海办事处，圆满完成了任务。林心平烈士同年在上海入党，1942年5月，任苏南抗日根据地宜兴官林区区长时，由于汉奸告密，

被日伪军逮捕，她在日寇据点虽受严刑拷打，但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壮烈就义，年仅23岁。国家民政部去年9月1日将林心平烈士列入我国公布的首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名录。

红军挺进师与党中央建立了联系后，闽浙边临时省委立即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学习中央文件，理解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统一对形势的认识。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临时省委及时调整斗争策略，把“中国工农红军闽浙边军区”改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闽浙军区”，“红军挺进师”改为“人民抗日红军挺进师”，赤卫队改为“人民抗日义勇军”，苏维埃政府统一称人民革命委员会。同时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闽浙两省各界人民书》和《致国民党官兵的一封信》，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号召各界人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团结起来组成抗日阵线，呼吁国民党军队与红军携起手来，枪口对外，一致抗日。

1937年10月，根据国共两党谈判协议，原活动在湘、赣、闽、粤、浙、鄂、豫、皖八省十四个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12月15日，新四军军部在武汉成立。1938年2月28日，中共东南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曾山伯伯由龙跃、余龙贵陪同，从南昌出发，3月上旬到达平阳山门，向父亲、粟裕伯伯传达了中共中央和东南分局的指示：（一）浙江红军部队编为新四军第七团队，集中地点为皖南泾县章家渡，部队应尽早出发；（二）浙江地理位置重要，原来的游击根据地不能放弃，要留下一些人在浙江继续斗争；（三）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撤销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中共浙江临时省委，待中央批准后转为正式省委。原闽浙边临时省委两位主要领导（指刘英和粟裕），一个带队去前方，一个留下来继续领导浙江工作。曾山一再强调浙南游击根据地是“十年血战的结果”，

是“今后抗战和进行革命斗争的重要战略支点，无论如何不能放弃，一定要保存。”于是经协商后并请示党中央同意，决定粟裕伯伯率部去皖南，我父亲和一部分干部及三个短枪班的武装留下坚持浙南革命战略支点。

为了适应形势需要，培养知识分子干部，1938 年 1 月，闽浙边临时省委在平阳山门开办了抗日救亡干部学校，校长由粟裕兼任，黄先河任副校长，教务长黄耕夫，对外称为“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救亡干部训练班”，为部队和地方培养了一批抗日骨干，为抗战作出了贡献。

为了向东南分局请示今后浙江党的工作，3 月 14 日，我父亲随曾山到南昌。途经金华时，父亲会晤了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并提出两点要求，在平阳、温州、丽水设立新四军后方办事机构；由于挺进师部队过去一直处在艰苦的环境中，物质条件艰苦，现在要开赴前线与日本侵略军作战，要求省府发给 500 支步枪，10 万发子弹和一千套军服。黄绍竑同意了第一点要求，并答应发给子弹 5 万发，军衣一千套。3 月 18 日，粟裕伯伯率领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主力 400 余人从平阳山门出发，前往皖南集中。沿途受到各地各阶层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慰劳。4 月 18 日，部队到达安徽歙县岩寺。根据新四军军部决定，浙南红军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三营，粟裕伯伯为第二支队副司令员。闽东独立师也由叶飞率领开往皖南，一起编入新四军。两支兄弟部队共赴抗日前线，并肩战斗，从新四军一师，一直到华东野战军，全国解放。

闽浙边临时省委和红军部队在党中央关注领导下光荣地完成了历史使命。经历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恢复了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创建了浙南根据地，二次粉碎国民党军大规模的“清

剿”，较长期地牵制和消灭了相当数量的国民党军，在一定程度上策应和支援了党中央和主力红军的战略行动，配合和掩护了邻近游击区的斗争。国民党重兵集结“清剿”浙西南、浙南，为闽北、闽东等邻近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赢得了大好时机。在闽北，由于敌人兵力空虚，许多封锁线撤销，闽北党组织迅速发展，由8个县委扩大到20几个县委，并建立了闽北、闽西北、闽中三个地委，武装斗争范围也大大扩大。在闽东，叶飞等利用有利时机，重建了闽东和12个县委，整顿和发展了武装，建立了比较巩固的四块游击根据地。当然，闽北和闽东等革命根据地对浙南游击根据地的斗争也给予了极大支持。同时，闽浙边临时省委和红军部队在多地建立了党组织，广泛发动群众，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和统一战线建立，使党组织和革命力量重新获得了发展机会，成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革命在南方的重要战略支点。

1938年9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浙江临时省委转正为正式省委，刘英任书记。这也是相隔近十年，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中央恢复了浙江省委建制。这对加强浙江党的各项工作，推动抗日救亡形势的发展是极为有利的。省委成立后，于同年11月成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骆耕漠任书记（解放初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为了开辟浙西沦陷地区工作，于1939年2月建立了浙西特委，书记顾玉良。

在省委领导下，浙江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如火如荼，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受到了各界爱国人民的瞩目和好评。如1939年2月，父亲派骆耕漠协助抗日英雄李友邦在浙江金华建立了抗日组织——台湾义勇队和义勇队少年团，为抗日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李友邦曾任国民党中将，后因身份暴



露被杀害。以中共党员为骨干的政工队组织活跃在全省各阶层各条战线。父亲非常重视统战工作，省委专门成立了统战部，父亲亲自兼任统战部长。父亲成功地与黄绍竑为省主席的国民党政府建立了比较融洽的上层统战关系，推动黄少竑颁布了以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基础制定的《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使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促进了抗日进步力量的发展。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的周恩来检查指导抗战工作时，曾在金华亲自听取了父亲和省委其他领导汇报并作指示。周恩来称赞：“在东南战场上，浙江是站在前进的地位，是值得其他各省仿效的。”

浙江当时党组织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到 1939 年 7 月，全省建立了 55 个县委或县工委，没有县委和县工委的县也有党支部或党员活动，党员二万人。经中央东南分局曾山伯伯亲临调查了解，党中央认为浙江省委召开全省党代会的条件时机已经成熟，党中央予以批准并分配了浙江省出席党中央七大会议的代表名额。1939 年 7 月 21 日，在温州平阳召开了中共浙江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浙江党组织召开的唯一一次全省党代表大会。父亲作政治报告和工作总结，大会通过了一系列文件，还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了浙江省委，以及出席中共七大的十二位代表、三位侯选代表。新的浙江省委：书记刘英，常委汪光焕、薛尚实、龙跃，委员张麒麟、郑丹甫、林辉山、刘清扬、顾玉良，候补委员：杨思一、林一心。薛尚实任组织部长，汪光焕任宣传部长，统战部长和妇女动员委员会主任由刘英兼任，青年运动委员会由郑嘉治负责，职工运动委员会由陈雨笠负责。大会还选出刘英、汪光焕、龙跃、张麒麟、顾玉良、郑丹甫、林一心、杨思一、丁魁梅、林辉山、孙绍奎、刘发羨等十二人为浙

江省出席党的七大的正式代表，林尧、谢廷斋等三人为候补代表。这次大会是在国民党顽固派开始积极反共，在各地疯狂捕杀共产党人的严重形势下召开的，浙南特委和平阳县委为保证会议顺利召开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党代会开得圆满成功。后因国民党反共高潮到来，党的七大推迟到 1945 年才召开。

1941 年 1 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长叶挺被扣押，副军长项英遇害，为了悼念皖南阵亡牺牲的新四军将士，父亲悲愤地写下了“生而为英，死而为灵，念我将士，万古垂青”的诗句。皖南事变后，局势更加险恶。1941 年 5 月，党中央任命刘英为中共华中局委员；7 月，任命为华中局特派员，负责指挥闽浙赣三地区工作。未料，1942 年 2 月 8 日，父亲因叛徒出卖，在温州被捕。敌人狂呼，“刘英被捕，胜俘敌十万。”父亲在狱中英勇斗争，坚贞不屈，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1942 年 5 月 17 日，蒋介石自重庆发来急电，“飭速处决刘英。”第二天黎明前夕，父亲在永康方岩从容就义，年仅 37 岁。与父亲一起被枪杀的还有战友中共衢属特委书记张贵卿烈士。

得知父亲被捕，母亲即烧掉机密文件和照片并向全省各特委书记发出了省委破坏的密信（技术信），后被地下党组织掩护送到上海。母亲通过华中局驻上海的负责人杨斌将浙江省委被破坏、父亲被捕的消息转报华中局、党中央。华中局立即发紧急措施指示，要求浙江各特委独立坚持基本地区，保存实力和组织，各特委间互不发生联系，否则有遭到顽固派跟踪追击全部破坏的极大危险。华中局还要求“各特委应派人直接与华中局发生关系，一切横的关系应斩断。”并重申必须严格执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斗争方针。总之，“温州事件”以后，中共浙江各级地方党组织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在国民党顽固派的又

一轮疯狂进攻下，各级党组织认真执行中央指示，保存了党的力量及基本地区，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一举摧毁中共浙江党组织的图谋。

1942 年 5 月 20 日，母亲生下了我。产后悲愤万分的母亲将我从上海送回浙江天台外婆家，和两岁的姐姐小英生活在一起，她自己又奔赴浙江四明山游击区找党组织和浙东游击队去了。后组织上调母亲到江苏淮安华中局组织部工作。两年后粟裕伯伯和华中局副书记、组织部长曾山伯伯、组织部组织科长邢子陶叔叔为防止敌人加害姐姐和我，派了几位化装的指战员，由在新四军任文化教员的林敏舅妈带路到天台，把姐姐和我连外婆一起接到淮安和母亲团聚。从此，我和姐姐小英在党和人民军队摇篮中幸福成长。在南征北战、战火纷飞、十分困难的岁月，华东野战军总留守处乔信明司令总先将把担架、独轮车、马车、汽车等交通工具让我们老小先坐，缴获的罐头等食品总先送到我们手中。我从入学、入队、入团、入党直至参加工作，每前进一步都得到各级党组织、广大干部群众和老前辈老同志无微不至的关怀教导、信任、支持和培养。记得读小学时我曾患肺结核卧床休养，粟裕伯伯和夫人楚青阿姨从苏联治疗休养回来，给我带了许多糖果和玩具，还有苏联红军的纪念章。1981 年，我调到温州工作后，粟裕伯伯还曾在电话中鼓励我：“锡荣啊，担子重了，好好干！”1982 年，粟裕伯伯和我父亲老首长聂荣臻元帅还给父亲的墓碑和陵园题字，寄托对老战友的怀念。想不到两年后，1984 年 2 月 5 日，我们敬爱的粟裕伯伯就逝世了。我们永远怀念他。粟戎生将军在父亲头颅骨骨灰中发现了残留多年的弹片，我才明白为什么粟裕伯伯生前头部经常剧痛，头戴半圆形金属镇痛器。在长期的戎马生涯中，为了务求必胜，尽可能减少伤亡，竭尽心力打好每一仗，

战火不息不休息。一场大胜仗打下来，总要昏睡很久才苏醒。粟裕伯伯出生入死，身经百战，指挥了许多威震中外的著名战役，可谓开国元勋、一代名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经过十四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迎来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全国人民渴望在国共合作抗日的基础上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建国。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主动将包括浙江在内的南方八个解放区的部队撤至陇海路以北及苏北皖北集中，作出让步。9月30日，为浙东抗日战争立下赫赫战功的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和党政机关，地方工作人员约一万五千人，在谭启龙、何克希、张文碧等率领下渡过杭州湾北撤。但国民党反动派为了达到其独裁统治的目标，背信弃义，对全国解放区全面进攻“清剿”。解放区党组织领导人民奋起自卫反击。国民党32集团军司令李烈庵亲自到浙江诸暨指挥，妄图消灭浙江人民革命力量。但未能得逞。

从浙江新四军北撤到全面内战爆发，除浙西留守武装被国民党“清剿”部队打散外，浙东、浙南、浙西南等地区中共组织和武装部队都在极为严酷的环境下，顽强地坚持下来，宣告了国民党军“清剿”的失败。并且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浙江地方武装力量在解放战争中越战越强，发展成南方解放区一支实力雄厚的劲旅，根据地也日益巩固。1949年在解放大军渡江之后，浙江地方党组织和武装积极配合大军解放各县。据统计，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有关部队到达之前，浙江地方武装共解放了24座县城。其中坚持浙南十四年的浙南特委书记兼解放军浙南游击纵队司令兼政委龙跃（胡景斌、邱清华任副政委，郑丹甫任副司令员，胡景斌任政治部主任，张金发任参保处主任后由程美兴任参谋长）领导的地方武装就解放了玉环、泰顺、景



宁、青田、温岭、文城、温州（永嘉）、瑞安、乐清、平阳、黄岩 11 座县城，加上同解放军三野 21 军一起解放的福建福鼎、柘荣和同二野 12 军一起解放的寿宁共解放 14 座县城。浙南游击纵队共接受国民党军起义投诚 2400 人（争取了国民党 200 师师长兼任温州专员叶芳起义），歼灭 9300 人。在浙东地区，浙东临委决定成立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马青任司令员，顾德欢任政委，刘发清任副司令员，张任伟任参谋长，诸敏任政治部主任，下辖六个支队，使浙东地区武装有了统一的领导，形成了浙东地区的主力军。在解放军野战军到来之前，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和其他游击区地方武装力量共解放了三门、松阳、分水、临安、新登、肖山、桐庐、浦江、诸暨、绍兴、天台、临海、仙居 13 座县城。浙江地方武装力量为全省解放作出了巨大贡献。

当代，历史已翻过新的一页。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历史使命已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推翻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转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维护世界和平和共同发展的三大历史任务。闽浙两省在新时代继续携手、并肩前进。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两省特别是福建宁德地区和邻近浙南温州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相互交流学习理解支持，将闽浙两省建成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福温铁路、高速公路，更使两省血脉相通，密不可分。两省对台工作资源丰富，台南多笃信妈祖早期移民的闽南人，台北多解放前过去的浙江人，血浓于水，共同语言多，易化干戈为玉帛，统一“九二共识”，海峡两岸共同发展繁荣了，就为最后实现“一国两制”、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创造条件。当年国共合作是为了抗日救国，今日两岸统一是为了振兴中华。祖国统一大业实现了，本国的事情办好了，又会对世界和平共同发展作出新的持久的更大贡献。

刚才，温州市委、泰顺县委领导作了很好的致辞和讲话，详实追忆了当年闽浙边临时省委领导军民浴血奋战、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革命斗争史，深情表达了对革命先烈先辈的崇敬和怀念，同时介绍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所取得的可喜成就，令人欢欣鼓舞。接下去浙江省委领导还要讲话。浙江省各项工作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温州改革开放后发展很快。泰顺县是地处边远的革命老区，被称为浙江的“西藏”。高山峻岭，是当年掩护革命军民的天然屏障，今天却成了经济发展的障碍。温州泰顺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将当年不畏艰险、马上打天下的革命精神，化作敢为人先、马下建天下的改革开放精神。泰顺县早已摘掉了贫困县的帽子，并承担成千上万移民重任，将青山绿水间一江一级清水送入珊溪水利枢纽工程，滋润造福温州七百多万人民。贡献巨大，精神可嘉。去年泰顺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突破万元大关，坚信今后按照十八届五中全会“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的到2020年农村人口全脱贫的要求，一村一户一人精准扶贫，让革命老区人民人人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方志敏烈士在狱中曾预言，可爱的中国，解放后，一定建设成“到处是欢歌、笑脸、富裕、康健、智慧、友爱、生之快乐的花园”。今天，我们正为之奋斗，实现千百万人民英雄的美好崇高理想，就是对他们英灵忠魂最好的告慰和纪念。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 坚定理想信念 传承革命精神

粟戎生

古人讲：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纪念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 80 周年，是为了缅怀先辈，更重要的是激励后人，并总结出可以借鉴的历史经验，用于指导我们现在的工作。

首先，要学习先辈崇高的革命精神。在主力红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万里长征以后，南方各省游击队孤悬敌后，有不少还与中央失去联系，得不到红军大部队的一点消息，几乎看不到胜利的曙光。现在看来，当时革命是暂时进入低谷，但当时的人们是不知道哪年哪月革命形势会好起来的。而且，临时省委是在蒋家王朝反动政权的“心脏”地带搞革命，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革命先辈们没有丧失斗志，凭借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坚持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开创性地开展工作，并在闽浙地区建立政权，削弱反动统治，有力的支援和配合了主力红军长征，直到最后胜利。当前，全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老区人民的物质生活明显改善。但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经济生活的活跃，各种有悖于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有悖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统的思潮，也会趁虚而入，使一些理想不坚定、意志不坚强的党员和群众逐渐堕落，甚至走向党和人民的对立面。今天，我们缅怀先辈，不单单要赞扬他们的丰功伟绩，更重要的是要向他们学习，进一步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并努力为之奋斗，同时要与各种不良的思想恶习作坚决斗争。

其次，要学习先辈们的顽强革命意志。在数十倍于己的强敌“围剿”下，与敌人反复作战，他们不畏强暴、不怕牺牲、长期血战，牺牲了就地掩埋，负伤了住在野坟地的棺材里养伤。平时天当房地做床，树叶茅草是被装，野菜野果是主粮。虽然队伍几起几落，但他们始终坚持战斗，最终迎来了革命高潮。当前，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波谲云诡，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同样面临许多困难和问题，但只要我们的党员干部能够学习先辈们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广大群众相信党，支持政府，团结一心，勇往直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再次，要学习先辈们正确分析把握形势的战略眼光。1935年夏天，当周边几个省的敌人联合“围剿”的时候，红军挺进师决定把闽东、闽北、浙西南、浙南的红军力量联合起来，更好地打击敌人。在这种形势下，成立了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临时省委成立后，几个游击区互相配合，游击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历史是智慧的源泉。当前，全国上下集中精力搞经济、发展社会事业，同样需要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先建什么、后建什么、主抓什么、带动什么，各地发挥什么优势，如何互相配合，都需要结合本地的具体情况，去决策、去实施，否则就不可能真正搞好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现在，我们要想真正做好工作，就必须有大局意识，敢担当，不唯上，只唯实，一切工作以国家需要和群众利益为出发点。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得到人民的支持，我们的事业才可能大步前进。



## 在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 80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陈一新

尊敬的各位老领导、老红军、老党员，同志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 80 周年，重温闽浙边临时省委的光辉历史，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弘扬伟大的革命精神，进一步凝聚起推动温州赶超发展的强大正能量。在此，我谨代表省委和市四套班子，深切缅怀为浙南革命作出卓越贡献的老一辈革命家和为浙南解放事业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向所有老红军、老党员、老同志和革命先烈的亲属，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问候！

1935 年 11 月 7 日，刘英、粟裕、叶飞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泰顺白柯湾举行联席会议，正式宣布成立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为闽浙边红军开展革命斗争铸就了坚强的领导核心。

在那极其艰苦险恶的战争环境中，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的开辟者和浙南优秀儿女，面对敌人的“围剿”沉着坚定，面对死亡的威胁义无反顾，谱写了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史诗。他们的英雄壮举、伟大精神和卓著功勋，永垂青史。

党史是资政育人的最好教材，是永葆共产党人先进性和纯洁性的营养剂。今天，我们纪念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 80 周年，最重要的就是要用党史和先烈先辈的英勇事迹教育和激励全体党员干部。借此机会，我提几点希望与要求，与大家共勉：

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弘扬伟大的革命精神，就必须始终坚定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面对极为恶劣的斗争环境，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领导下的广大革命志士坚持英勇斗争，支撑他们的力量之

源就是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现在同革命年代相比，尽管时代不同了、环境不同了、使命不同了，但我们的理想信念不能变。我们一定要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始终拧紧理想信念这个“总开关”。

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弘扬伟大的革命精神，就必须始终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后，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能够不断壮大革命力量，最根本的就是把自己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与人民群众心连心、同甘苦、共命运。新形势下，我们一定要坚持用好党的群众路线这一重要法宝，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以共享发展的新理念引领广大人民群众创新创业，使党的执政基础坚如磐石。

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弘扬伟大的革命精神，就必须始终抓好科学发展这个第一要务。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领导党员群众献身革命事业，孜孜以求的就是为了人民解放、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贯彻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统领，以“五大发展理念”为引领，以“八八战略”为总纲，以富民强市为追求，以全面转型赶超为主线，深入实施“五化战略”和“十大举措”，加快推进温州赶超发展，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弘扬伟大的革命精神，就必须始终大力支持革命老区的发展。革命老区是我们党发展壮大的红色摇篮，老区人民为党的事业发展付出巨大的牺牲和代价。我们必须坚持协调发展不动摇，以切实有效的举措，帮助、支持和推动革命老区加快发展，努力使老区人民早日脱贫致富、过上幸福安康的美好生活。

同志们，抚今追昔，我们感慨万千；展望未来，我们信心百倍。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同心同德，开拓进取，扎实工作，为温州“赶超发展、再创辉煌”而努力奋斗！

## 在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 80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致辞

中共泰顺县委书记 张洪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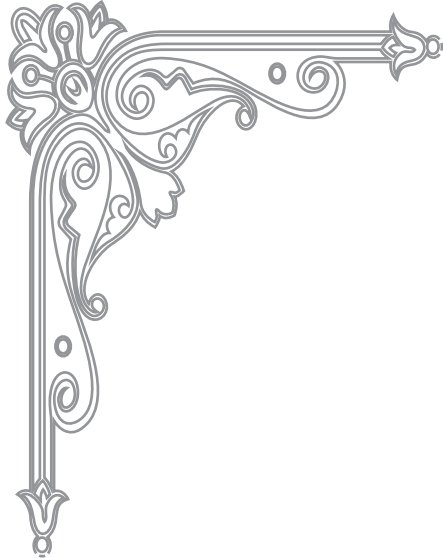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老领导、各位来宾、朋友们、同志们：

铁血铸英魂，丹心照青史。带着对革命历史的深切缅怀，怀着对革命先烈的无限敬仰，含着对革命精神的无尚追求，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 80 周年纪念大会。在此，我谨代表泰顺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和全县人民，对不辞辛劳莅临泰顺参加纪念大会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界朋友，表示热烈的欢迎！对闽浙边临时省委委员及挺进师亲属，致以崇高的敬意！对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泰顺红色文化传承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级领导、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泰顺，是一片生机盎然的“绿色之地”；泰顺，也是一片革命历史悠久的“红色之地”。泰顺的革命历史源远流长，早在 1923 年，泰顺籍人士林秉权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浙江省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他们在家乡积极宣传革命思想，使得泰顺成为浙南地区较早传播马列主义的地方。自 1925 年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泰顺人民前赴后继，革命斗争从未间断。1935 年 4 月，刘英、粟裕率领的红军挺进师进入泰顺，与叶飞领导的闽东独立师胜利会师，在九峰白柯湾成立了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战争，开创了一段难以磨灭的革命光辉历史，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革命动人事迹，为泰顺人民革命的胜利、为推动浙南全境的解放、为全国革命事业

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88年，泰顺被浙江省人民政府命名为“革命老根据地县”，至今泰顺境内仍然保存着中共浙南特委成立旧址等20多处革命胜迹。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以史为鉴，资政育人，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自立自强的文明基因。泰顺作为革命老区，深入挖掘、整理和研究泰顺的革命历史积淀以及红色文化内涵，传承和发扬好革命精神，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开展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80周年纪念活动，是对革命先辈丰功伟绩的缅怀，更是对泰顺红色文化和崭新面貌的宣传和展示。重温这段历史，眼前仿佛再现那一段段激情燃烧的烽火岁月，耳畔再次回荡着那一曲曲嘹亮不息的英雄赞歌。广大革命先驱们视死如归、忘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始终激励着泰顺人民栉风沐雨、砥砺前行。我们将以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80周年纪念活动为契机，进一步传承弘扬优良传统、红色文化以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革命精神，为开创泰顺绿色赶超发展新局面、打造“廊桥国家公园”新目标注入新的活力！



# 追忆篇







## 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摘录）

刘 英

### 挺进师的成立与胜利地到达闽浙边

#### （一）中央分局给红军挺进师出动的任务

中央分局根据中央政治局 1935 年 1 月 15 日的指示电，责成闽浙赣省委立即组织挺进师到达浙江长期行动。当时正是北上抗日先遣队在开化、婺源、德兴遭受到极大的损失，方志敏、王如痴、刘畴西诸同志已被捕，反曾洪易路线的斗争正在开展着。当时中央分局给挺进师的主要任务，是经过闽北到达浙江，长期行动，发动广泛的游击战争，扩大党与苏维埃的政治影响，发动群众斗争，直到分配土地创立苏维埃新的根据地，以及建立党的组织，配合友军行动，调动和吸引住大批的敌人，保卫闽浙赣基本地区及邻近游击区域，并打通闽东闽北的关系，取得工作上、行动上有力的配合，响应主力部队的行动，彻底粉碎敌人“清剿”计划与五次“围剿”。

#### （二）挺进师到浙江行动的实力及其干部的配备

闽浙赣省委接到分局指示电后，便组织了挺进师，粟裕同志为师长，刘英同志为政治委员，黄富武同志为政治部主任，宗孟平同志为组织科长兼地方工作科长，王维信同志为宣传科长，姚阿宝同志为特派员，王永瑞为参谋长，刘达云为供给部长，谢文清为没收委员会主任。当时挺进师的人数 538 人，长枪 445 条，

重机关枪4挺,轻机关枪8挺。这些部队的组成是七军团的一部分,十军团的一部分,独立师的一部分,但因组成时间太短,加之部队中当时党内外的动员工作做得不够,部队出动时,潜逃回独立师者近百名,于是将多余的枪支留落闽浙赣。到达闽北时与先遣队前留江浦一带行动的2个连汇合,该部人数150名,长枪82条,轻机枪2挺。这样一来,此数略可抵潜逃数目。

当我们进到闽北时,闽北军分区原司令员李得胜叛变,电台已失去了。这样一来与闽浙赣及分局今后的交通联络颇成问题。为了加强挺进师的领导,以作长期行动与便利指挥与工作起见,便组织了政治委员会,是挺进师行动区域内最高的党政军领导机关,以粟裕、富武、宗孟平、刘英、姚阿宝、王维信、洪家云、刘达云、方志富等9人组织之,以刘英同志为书记。

### 挺进师在闽浙边行动第四时期的情形及其所得经验与教训

(从临时省委成立即1935年十月革命纪念节起至1936年7月止)

#### (一)当时所处环境及经过情形

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后,除将闽浙边整个干部重新配备,部队重新整理,工作重新布置外,当时决定省委暂时随挺进师行动一个时期,待浙西南工作布置完毕后,省委的位置应放在闽浙边泰顺、平阳、福鼎、瑞安之间,以便指导闽浙边整个工作。此时进攻浙西南之敌已集结于龙泉、遂昌、松阳、丽水之线,在那里大开其所谓剿“匪”胜利之祝捷大会,我们以一晚两天的急行军,通过了闽浙边1师以上的兵力的封锁线,而一举占领了瑞安属之珊溪镇,当时所得情况是:1.浙西南基本地区稍受损失。2.黄富武同志被捕,但部队的实力大部分仍然存在。3.洪家云同志等尚

在江山、浦城、龙泉、遂昌等县边境行动。4. 群众斗争的情绪仍然很好。5. 浙东部队仍然活跃于大盆山一带。此时军区司令员兼挺进师政委会书记 × × 同志，则提出浙江暂不能行动，应依靠闽东原来的工作地区，转到两建行动（即建瓯、建阳）。于是当晚召集临时省委会议，除将整个政治局面及当时浙江所处环境作了比较充分的估计与分析外，并着重地指出：没有信心在浙长期行动与积极而又迅速地去恢复浙西南工作，是极端错误的。另方面则决定挺进师应从速集结自己的部队，打击进攻闽浙边薄弱之敌，并迅速地回到浙西南行动，临时省委则暂随挺进师行动。会议结束后，则在泰顺、庆元、寿宁、松溪间，行动了2个月光景，发动了数县的群众，恢复了不少的组织，并缴获长短枪百余支。此时国民党的十八军有向两广开拔的消息（两广事变快要到来的时期），于是决定挺进师全部回到浙西南行动，省委位置于泰顺、福鼎、平阳间。兹将此时的情形，分别地摘述于下：

一、挺进师之部队由粟裕、谢文清、许信焜、张友昆、赵春和、张文碧等同志率领，迅速地回到浙西南，集结部队与恢复该地工作（此时原在浙西南行动之主力依然存在）；并以文清、信焜、春和、文碧等同志组成政委会，以信焜同志为书记，粟裕同志为随军省委代表，将该地工作整理完毕，部队集结好了以后，粟裕同志应率特务连经宣平、丽水、永康之线，这些地区原已有了工作，进到浙东（如仙居、永康、缙云、武义之间），检讨与重新布置浙东特委的工作，然后南下回到省委所在地。于1936年3月间，挺进师胜利地占领了龙泉属之住溪镇及遂昌属之王村口，当时群众的斗志依然如昔。二、四纵队及广浦独立营依然存在（此时十八军正开始调动），浙西南基本地区的群众坚决地要求挺进师再不要走了。可是，由于当时几个主要负责人不团结与意见不

一致，大概行动了十几天光景，将部队拉到闽东去了。这样一来，不但部队未集结，工作一点也没有恢复，相反，反给了群众一个不好影响。

二、临时省委与挺进师分别后，只带了一个特务班，有短枪6支、长枪2支，当时的敌情，福鼎有第九师的1个团及闽保第四团，在平阳方面有浙保第四团，在泰顺方面有保安十一大队等。此时省委的中心任务，是以全力整理与建立福鼎、泰顺、鼎平及瑞、平、泰的工作，约1个半月的光景，各地组织均已普遍建立，广大群众业已发动。但进攻我们的敌人，随时以连排甚至以班为单位，分散行动，专门压迫群众屠杀工农，抢粮迫债，无所不为。省委工作人员并特务班只不过二十几人，大部都是赤手空拳，然而广大群众在敌人不断压迫下，真是忍无可忍了，于是不断地要求我们配合他们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群众有梭标、土枪之类，斗争精神很好）。经我们多方的考虑，认为配合群众力量，采取埋伏侧击的战术，选择有利的条件，是可以给进攻之敌以打击，并决定首先就要打击第九师（因为第九师的牛皮最大，说他一连人可以消灭全福鼎的游击队及共产党）。因此，第一仗就击溃了第九师的2个排，缴获轻机关枪1挺，步枪数条，解决最多不过30分钟，我方只一特务班政治委员周兆坤同志牺牲。此时群众的斗争情绪较前更加高涨，并到处传播说，七军团到了很多的便衣队；此时部队中得到了一支轻机关枪，真是如鱼得水般的高兴和快活。接着又一次战斗，除将敌人便衣队1排全部击溃外，接着击溃了浙保4个连。此时这个小小的特务班已扩充成特务队了（群众名之为七军团的驳壳队）。于是进攻我们之敌固守堡垒，由进攻转到防御。省委根据当时的环境，除组织直属工作突击组，分到各地区去切实的帮助与指导各地工作外，并决定普遍的巡视各



县工作，由瑞、平、泰转到福鼎、鼎平各县，同时在战斗中，已将特务队扩充到教导第一团和第二团（时间约3个月的光景）。此时鉴于整个形势的转变，两广事变已发生，闽东、浙西南特委及挺进师亦毫无音讯，于是除给信与闽东、浙西南及粟裕同志等，约其到闽东开会外，并将分开后省委工作的现状告诉他们。此时省委布置了浙南、浙东南及闽浙边整个工作后，则率领教导第一团，由鼎平到瑞、平、泰与霞浦、福安一带巡视与布置各该县的工作，并求得早日与闽东、浙西南诸同志召开临时省委会议。

当挺进师陆续回省委后，前后争取了十几次的胜利，缴长短枪400余支，轻机枪5挺，俘虏近200余。闽浙临时省委第十次扩大会议就在1936年“八一”革命纪念日的前后举行了。

#### （二）在第四期行动中所得的经验教训总结

A. 在游击战争方面，不但战术的运用有很大的转变，而且游击区域的开展更加宽广了，差不多温、台、处、衢各县及杭州以南以至蒋介石家里的奉化附近也有了红军的足迹，这不仅震动了整个的浙江的敌人，而且震动了整个的统治阶级，尤其是政治上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B. 由于红军的活跃和实际行动中表现着他们英勇奋斗、艰苦卓绝的先进行动，不但揭破了国民党军阀说红军已经完全消灭了等武断欺骗宣传，同时在龙泉、丽水、青田、温州以南，宣平、武义、永康、缙云、金华、义乌、东阳、仙居及浙东数县，共计不下30县的广大群众，除了一小部分外，无不对红军爱好，特别是浙南、浙西南及闽浙边数十县的民众，对红军的热望与拥护，确实表现得非常明显，在某些地区甚至表示同老苏区一样，群众自动地替红军担任运输、向导及治疗伤病员等，并自动地组织游击队，进行分粮和肃反等工作。

## 挺进师在闽浙边行动第五时期的情形及其取得的成绩、经验与教训

(自 1936 年 8 月至 1937 年 1 月)

闽浙边临时省委第十次扩大会议的主要精神，估计与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与确定了党的任务，检讨了浙西南的斗争，讨论了对 ×× 问题的处理，检讨了浙东的工作，改选了省委，检讨了挺进师二年来在闽浙边的斗争，讨论了 ×× 同志 3 次声明书，并通过了省委给 ×× 同志的一封信。总结起来，闽浙边临时省委第十次扩大会议，不仅总结了挺进师及闽浙边的党一年来的斗争与工作，而且解决了许多无原则的纠纷，开展了反 ×× 为首的取消总的领导机关，破坏党内团结，取消浙东工作的错误斗争，使挺进师及闽浙边全党的同志更加团结和巩固；另方面奠定了挺进师在浙长期行动与闽浙边的党获得进一步的巩固与发展，确定今后的斗争方针与策略路线的转变和运用。

在这一时期，正是两广事变爆发的前后，敌人的正规军均已他调，除浙江 3 个保安团、11 个保安大队和 6 个独立营与地方武装部队外，尚有闽保第四、第六两个团，但由于党的领导正确，挺进师行动积极，以及各级干部的团结一致，这时期是挺进师到闽浙边行动以来最好的环境，工作与斗争最顺利的时期不但巩固了浙南、浙西南，而且开展了浙南各县的工作，并打通了浙东原来的基地，除正规部队已扩充到近 2000 人外，在浙南特委领导下的地区随时随地都可号召成千成万的群众配合我军作战，同时对县乡村均有普遍的自卫队及以分区为单位的独立营、连等组织。当时敌人进攻我们的机会是很少的，于是除消灭了各地许多地主武装外，并攻开了游击基本地区内不小的反动堡垒及据点。各个游击基地的互相联系也从此打通了，浙南某些地区的土地业

已分配，浙西南某些地区则实行分青苗，至于红军及游击队经过之处，富户的粮食极大部分均已分配给广大群众。

接着是双十二西安事变爆发了，此时客观形势更利于革命的发展，不久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当时我们认为“和平统一，共赴国难”将从此实现，且中央红军和国民党军队双方已停止军事动作，然而对东南各省的苏区和红军，仍然采取绝望的进攻，企图一举而消灭东南各省的苏区和红军，并从报端上得悉将遣刘建绪的部队来浙闽赣皖四省“剿共”。

### 挺进师在闽浙边行动第六个时期的情形及其所得的经验与教训

(1937年2月至1937年12月)

#### (一) 当时所处的环境和布置

当敌人大举进攻将要布置就绪时，正值闽浙边临时省委第二届第六次扩大会议开幕之际，大会除正确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与确定了闽浙边党和挺进师当时的紧急任务外，尚有如下决议：

1. 大会一致认为当时整个的政治形势是起了很大变化，而这种变化总的趋势，是日趋于激烈地走向革命与战争的大道。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我党以大公无私的态度，进一步的提出策略路线的灵活转变，从此“和平统一”“团结御侮”之方针是能够迅速的实现。但由于国民党之进步与转变十分不够，东南形势一般说来，仍然处于复杂严重的斗争环境之中，最明显的事实，莫过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与国民党三中全会闭幕之后，当局对于东南各省苏区和红军的进攻，不但没有丝毫的减轻和放松，相反的依然采取绝望的进攻，企图一举而消灭东南各省的苏区和红军，刘建绪从湘调浙，组织闽浙赣皖四省“清剿”总部，就是最明显

不过的事实问题。

2. 为了彻底地粉碎敌人的绝望进攻,与适合当前斗争的需要,二纵队仍回浙西南,一纵队回浙东,三纵队进至浙东南,师直属部队在浙南,特务队随省委行动,给进攻之敌当头一个严厉的打击。除一、二纵队迅速回到自己工作地区依靠党与群众力量坚持各该地斗争,其余各部队及闽浙边区之独立营连队则编第十九师(三个团),采取分散集中的策略(随时能够集中打击敌人,随时又可分散行动,同时能够独立行动的各级干部,亦预先分配好了)。

3. 党政军的任务详另决议和指示信。

4. 为了便利指挥,加强各地党领导起见,决定闽浙边区成立省委办事处,以粟裕同志为省委办事处主任,直接领导指挥闽浙边区党政军工作。省委直属机关由瑞平泰出发,经泰顺、平阳、鼎平,巡视与布置该县工作后,通过飞云江进至浙东南,选择适当地区以便领导浙东南、浙西南,并与浙东及闽浙边区取得密切的联系。

5. 首先要集中全力乘敌人各路进攻尚未靠拢时,给第十九师李觉部及第九师一团有力的打击,因为这些部队是敌人进攻的主力(可是事实上战斗力并不强,且不断地发生小的兵变,以连排班为单位好几次拖枪过来),必须在各方面占着优势才进行必要与有利的战斗,一、二纵队在必要时应集中力量打击卢兴邦的土匪部队(该部纪律最坏,逃亡最多,战斗力最差,不断的拖枪到浙东南,尤其是浙西南的部队里去)。

6. 各特委各部队必须保持与省委和军区的联络,并迅速地建立顺畅的交通站。

## (二) 敌人的布置和企图

敌人此次围攻的特点,在战略上是采取由北而南,由西而东

的包围，各路都有纵深配备，并以五十二师及闽保第二、四团及第九师，首先散布于闽浙边，构成了一道将近 700 里的封锁线，并构筑了相当巩固的工事和数千个乌龟壳（即堡垒）。第一步计划限 3 个月消灭我们。他的兵力的布置，刘建绪自己兵力首先布置于江山、衢州、汤溪、龙游、武义、永康、宣平、缙云、丽水、永嘉之线，则企图由北而南的把我们压迫到闽浙边，而协同由西向东进攻之敌，及围守闽浙边封锁之敌，而消灭我们，西线布置首先以新五师、五十二师及江西保安团和福建保安团，布置于江浦公路（即江山到浦城的公路）及松溪、庆元、政和之线，由西向东压迫我们，以独立第二旅及九旅、浙江保安团保安大队及独立营等首先封锁瓯江及飞云江所有的民船，并将所有的民船于午后 3 时均集中于指定地点的北岸，来往人员检查甚严，并构筑了数千个堡垒，另方面则压迫群众组织联甲及“剿共义勇壮丁队”有了 5 家或 10 家以上的村庄，特别是重要的口子及交通要道上，均限期构筑堡垒和派人守口子，动员了几十万的壮丁队（根据其当时报纸上的消息），协助军队“进剿”，50 步一哨，300 步一班，每个壮丁带了三个月的粮食和费用，欺骗群众说红军有几千万的银子，吃的用的不知有多少，打到红军住的地方去，一概都分配给老百姓。

在政治方面，利用反动的乡保长、地主、富农，压迫群众组织联甲及义勇壮丁队，并实行了移民政策、烧杀政策（一乡的人民均集中于乡公所驻在地附近），山头山尾的房子与茅蓬一概烧掉（在此次进攻中，起码烧了万座以上的房子），一切食物均集中于一地，集中时先算过每人每日只准领多少油盐柴米，到处大造谣言，说朱毛红军已投降了，为了要打日本，首行要“剿灭”共党和红军；颁布了通红军者，向红军报告消息者，送红军粮食者



等十条杀头状，压迫群众执行，此外还有赏格布告散发到各地去，捉到红军首领的赏多少，杀到红军首领的头赏多少，并说只要拿他们的头来。还向蒋介石说共产党员和红军均消灭干净。可是后来蒋介石得悉此种消息不正确，给刘建绪谎报军情戴罪立功的责备与处分。

### (三) 我们当时的对策

在军事方面：一纵队由浙南出发，经浙东南以电光形的进行回到浙东活动；三纵队回到浙西南；其余各部集结于平鼎交界处。首先给了进攻之敌浙保及闽保以严厉的打击，并与十九师的李觉打了两仗（按：李觉是何键的马弁，因何的女儿爱上李觉后为何的女婿，同时又是蒋的干儿子），敌人死亡颇重，我军无甚损失。此时敌人主力均已到达平阳、福鼎、泰顺之线，闽浙边省委根据当地情况及敌我力量的对比，认为部队集中一起行动，在当时那样的环境中实属不利，于是除将各地方武装分布于各游击基本地区进行持久的顽强斗争外，其余各部均于1937年3月间先后挺进到浙东南及敌后方翼侧去了，于是敌人企图消灭我军于闽浙边之计划，完全归于失败。

正当着敌人大举进攻时，省委及军区发出了快邮代电，中心内容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号召，不到1个月的光景，当局派遣了代表到温，并在各报披露，愿与我们进行和平谈判。经省委讨论的结果，认为当时的谈判，当局所提条件一定是很苛刻，而且没有诚意，但我们很可利用15天的停战机会，布置我们新的工作与扩大我们党的影响，于是双方谈判。可是谈判的焦点至我方代表坚持我党组织与部队独立性和划分驻地地区时，当局企图扣留我方代表，此时我们很机动地要求对方到温州谈判并邀请各界先进人士参加，不数日蒋介石给刘建绪“停抚进剿”之手令，

于是谈判遂告破裂，我们代表也安全地绕道回来了。此时我们的主力由整化零，组成了大批的赤色武装工作团，除配备军政干部外，并配以各当地党的干部，一起行动约半月的光景，各部挺进到敌人后方及翼侧去了，并发出《为团结御侮共赴国难以及和平谈判破裂告各界人士书》。5月间继续发出和平谈判通电，6月中继发《呼吁各界人士要求当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宣言》。当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第三天，当局派四省“剿共”总指挥党政处主任邓初先生来温与我方进行谈判。此时我们谈判的对方是处于被动地位，且环境也非常有利于我们，于是我们即坚持主力红军谈判的条件作为我们谈判的准则，此时对方一一允许，并再三要求停止军事动作（因为进攻我们的部队均要调动，且各地游击队异常活跃），于7月13日（编者按：原文如此）双方在温签订了和平谈判的协定，并由当局每月供给我们15000元的开支。当和平谈判协定签订之后，省委由青田、永嘉、瑞安边境一昼夜的行程赶到回平阳北港，集中部队与布置新的工作，约半月的光景，即将散布于瑞平泰青丽温等县的部队全部集中完毕，工作人员及红色战士共集中约300人左右。当部队集中完毕，浙南及边区工作布置就绪后，即分别地派人往浙东南、浙西南及金、衢属方面找粟裕、谢文清、张文碧、范联辉、赵××等同志，约1月的时间，始将各地部队找回，最大的力量是用在创办党的训练班，恢复各地工作，加紧部队教育，创办救亡学校，组织救亡团体及训练群众的抗日自卫队等。

#### （四）浙闽边党的建成及其发展的情况

当挺进师于1935年到达闽浙边时，浙江党的组织除浙东有极少数的零星组织外，其他各地均没有党的组织，政委会根据中共东南分局（编者按：原文如此）的指示，及各地的具体情形，

首先建立了松溪、政和、庆元、泰顺等县某些地区党的组织，并迅速地打通了闽东、闽北的联系。至1935年10月间则建立了景宁、云和、龙泉、遂昌、松阳、宣平、江山、浦城、汤溪、龙游、武义等县普遍党的组织。有些县份如武阳等县则部分的组织，并正式地成立了浙西南特委，同时派遣了一纵队配备党政干部挺进到浙东，将该地零星的党的组织经过数月整理后，亦成立了永、缙、仙、处等县某些地区的党的组织，是年10月南下开辟与整理了泰顺、福鼎、平阳、瑞安等县工作，于1935年12月正式成立了浙闽边区特委（编者按：原文如此）。1936年3月间正式成立浙东南特委。1937年3月至1937年8月开展了永嘉、青田、瑞安等县工作，和平谈判成就前后，成立了台属工作委员会，当时党员数量是4000余人，最多达到5000余党员，一般的说来，党的发展在挺进师胜利的影响之下和各级干部的努力，对于党的发展得到极大的成绩，但由于挺进师的干部，党的工作经验不够，只顾大量发展而缺乏严密的巩固。（摘录于刘英1940年夏于皖南撰写的回忆录。原载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浙南——南方革命的一个战略支点》，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 回忆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摘录）

粟 裕

### （一）挺进浙西南

浙西南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地区，敌人在那里驻有较强的保安团队。我们必须先在外围活动，把那些保安团队吸引出来，给以各个打击，才好进入该地区。为此，我们于三四月间在浙闽边境进进出出，往返作战，一度打到江山，又在武夷山、洞宫山区兜了几个圈子，后来又辗转游击于龙泉河以南之庆元、景宁、松溪、政和、寿宁、泰顺一带，先后打了大小几十仗。比较重要的有溪头、小梅、沙湾、上标、潭（台）边街、百丈口等战斗，歼灭了一批保安团队和地主武装。敌人自感“风鹤频惊”，十分惶恐。此时，敌人以为我们必将在龙泉河以南的浙闽边境立脚，遂将龙泉河北的浙江保安团队纷纷南调，并令福建的新十师和第五十六师北进，妄想南北夹击，消灭我军。

……

### （二）创建浙西南游击根据地

……

### （三）第一次反“围剿”

9月下旬，我们由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中心区南下，在龙泉道太以东敌军第六十七师和第十一师的接合部——蛤湖偷涉龙泉河，突破了敌人的云、龙封锁线，进入浙闽边境。

10月5日，我们在寿宁县境与闽东特委主要负责人叶飞同志



等胜利会师。这是头一年我们抗日先遣队北上途经闽东与他们会师之后的又一次会师，群情振奋，十分欢快。随即，我们进到浙江泰顺县境。双方在交谈中，一致认为，敌人组建了一个“闽赣浙皖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统一指挥四省边区的反革命力量来对付我们，而我各红色游击区却互不联系，各自为战，这是很不利的。如果我浙江与闽东、闽北三个地区能取得密切联系，即使一时尚难统一行动，但只要能在战略上互相协调、互相策应，定可更有力地打击敌人。基于这一认识，双方领导人很快取得了成立“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的一致意见。经协商，临时省委由刘英、粟裕、叶飞、黄富武、刘达云、阮英平、范式人、许信焜、洪家云、方志富、许旺等 11 人组成，以刘英同志为书记，我任组织部长，叶飞同志为宣传部长兼少共临时省委书记。相应成立闽浙边临时省军区，由我任司令员，刘英同志兼政委。

临时省委成立后，面对敌人集中力量摧残我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反革命策略，我们立即着手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除令北渡瓯江的第一纵队加紧向浙东地区（即括苍山南北地区）发展外，重点放在开辟浙南地区的游击根据地。

浙南地区，主要是瓯江下游以南的广大地区。东濒东海，南接闽东，山岭连绵，地形险要。它比浙西南地区有两个更为有利的条件。一是从 1924 年起，这里就有党的活动，1929 年冬天以后的两年间，党在这里领导过武装暴动，红十三军的旗帜曾插到瓯江两岸的许多乡镇，在群众中留有很深的影响。此时在平阳、福鼎之间，已有闽东党的工作，可以互为依靠。二是这里离浙赣线较远，国民党统治力量比较薄弱。于是，我们由浙闽边向东北行动，攻下了瑞安珊溪镇，立足于瑞安、平阳、泰顺三县之间，以此为枢纽向东南和东北发展，一直打到瓯江南部直抵东海之滨。

接着我又出动主力，兜了两个大圈子，攻克了瑞平泰外围敌人许多重要市镇和据点，如景宁之东坑、梅岐、沙湾、勃海、大顺、小顺，文成之南田、西坑、黄坦，瑞安的大岙（现文成县）、玉壶、岙口、营前、高楼、湖岭、马屿、陶山、平阳坑，泰顺的百丈口、左溪、泗溪、仕阳，平阳的水头街、山门、腾蛟、莒溪，福鼎的南溪等地。局面打开后，确定由刘英同志带少数短枪和省委机关在瑞平泰地区开展游击根据地的建设工作，由我率领武装部队，在浙闽边进进出出，从浙江打到福建，又从福建打到浙江，以此吸引和打击敌人，掩护和保护省委开展工作，支援浙西南地区的斗争。

……

#### （四）第二个发展时期

从1936年6月两广事变爆发到同年12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浙南游击战争的第二个发展时期。从客观上说，“中央军”调走了，敌情逐渐缓和，从主观上说，是因为我们依据实际情况，适时地调整了政策，发挥了政策的威力。

……

此时，浙南根据地的建设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前面已经提到开辟浙南游击根据地是从1935年秋挺进师主力跳出包围圈，进入浙闽边，同闽东的同志会师后开始的，首先开辟了瑞平泰地区，接着闽东同志为了互相支援，利于机动，将原属闽东特委的鼎平中心县委（在福鼎、平阳、泰顺边界）划归浙南，使浙南游击根据地的范围扩大到浙闽边境东段。……1936年11月，我根据地的幅员由浙闽边境东段向北扩展，一直扩大到飞云江中游的南北两岸，包括瑞安、平阳、泰顺、福鼎，以及青田、景宁、丽水、寿宁、霞浦、庆元、永嘉等县的部分地区，纵横500余里。

为了加强党政领导，全区成立了浙南和浙东南两个特委，并先后成立了福鼎、平阳、泰顺、桐霞、霞鼎泰、鼎泰、瑞青泰、永瑞青、庆景寿、丽云边等 10 个县委和一个瑞平泰中心县委，成立了浙南人民革命委员会。

在根据地内，普遍建立了党、团基层组织和贫民团、工会、妇女会、少先队等群众组织，建立和发展了地方武装和群众武装。一批地方干部在斗争中迅速成长，如郑丹甫、周钦民、林辉山等同志，后来各担负起了一个县的领导职务。这时的浙南游击根据地，又如头年夏秋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那样了，“党、政、军、民、学、工、农、青、妇、儿”，搞得十分红火。

浙南游击根据地建设的基本政策，仍是继续贯彻土地革命的纲领，打土豪、分田地。开始是领导群众开展抗租、抗债、抗捐、抗税的“四抗”运动，进而发展到在一些中心区实行包括青苗在内的土地分配。

.....

1936 年底，挺进师再次由几百人发展到一千五六百人，地方游击队和群众武装达数千人。我们的活动范围扩大到了温州、台州、处州、金华、衢州、绍兴地区所属的 30 几个县境。我们有了像浙南这样的比较巩固的大块游击队根据地，还有了如宣遂汤边区及青瑞边的梅山、李山，飞云江边的五云山等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和大量的分散的游击基点。做到了公开的，秘密的，互相支持，互相掩护。部队打游击的经验也丰富起来了，可以分散发动群众，也可以集中打击敌人。我们在浙江又打开了一个大发展的局面。

### （五）第二次反“围剿”

1936 年冬，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红军三大主力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西安事变的发生，迫使蒋介石接

受了停止反共内战的条件。

可是，国民党蒋介石为了消灭我南方红军游击队及游击根据地，加紧了在西安事变以前已经策划的对我南方游击区的“围剿”。他任命第四路“剿匪”总指挥刘建绪接替上台还不到两个月的张发奎担任闽赣浙皖四省边区主任，又派国民党 CC 系骨干分子朱家骅接替黄绍竑任浙江省主席，还调浙江省保安处副处长蒋志英到温州地区主持“剿共”。

如同卫立煌、罗卓英在 1935 年 9 月开始的那一次历时 8 个多月的“围剿”一样，这次又以浙南游击区作为其主要进攻目标。1936 年 12 月 15 日，刘建绪由杭州赴江山“四省边区总指挥部”接事，随即调集主力部队 6 个师、2 个独立旅及地方保安团共 43 个团，开始筹划对我进攻。由于这时我游击区的范围已大为扩大，刘建绪已不可能采取罗卓英包围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方针，他采取了拉网式的由北而南，由西而东，由外围到中心的逼进包围的方针，企图先将我军向东南压迫，然后在浙南包围聚歼。

针对敌人“大拉网”的战术，我们采取与敌人相向对进，易地而战的打法。敌人梳过来，我们钻过去，你要我的山头，我要你的后方。为对付敌人大规模的“围剿”，作战单位逐渐分散，由开始百把人集中行动，逐渐分散到几十人，十几人，甚至几个人。但这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往往根据敌情与任务，有合有分，好在大家都已锻炼成为游击好手，可以组自为战，人自为战了。

.....

在抗击刘建绪 43 个团的“围剿”中贡献最大、牺牲最大的是浙南的广大革命群众。他们中的一些优秀代表，把革命的希望、未来的理想，全部寄托在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身上。他们以崇高的品德和视死如归的气概，保卫着共产党，保卫着我们的干部



和军队。……我军从泰顺泰平区根据地转移时，双溪口村党支部书记黄明星和他的妻子卢桂莲，动员群众，将几十个伤员分散隐蔽治疗，不久，他俩先后被敌人抓去，严刑拷打，逼他们交出伤员，夫妻俩守口如瓶，没露半点破绽。后来，这批伤员在群众的掩护下，全部养好了伤，完全归队。

刘建绪的“围剿”，虽然动用的总兵力比罗卓英那次的“围剿”要多，但是，我们反“围剿”的有利因素也有增加：第一，由于我游击区的范围已大为扩大，刘建绪的兵力与罗卓英集中于浙西南的兵力相比，相对说来没有那样密集了；第二，经过前一时期的工作，我们的社会基础更巩固、更广泛了，各大、小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基点的互相策应，加强了我们的抵抗敌人的力量；第三，全国形势的变化，曾迫使刘建绪一度放松“围剿”的进程，这对我们也是有利的，因此，尽管浙南游击区的中心地区所遭受的摧残是十分严重的，但是几块游击根据地还是坚持下来了，而且保存了较多的干部。浙南这个战略支点，坚如磐石。

#### （六）迎接抗日高潮

1937年5月之后，刘建绪对浙南的“围剿”进入最严重的阶段，其残暴程度达到了高峰，真是黎明前的黑暗。但是，此时民族矛盾已空前激烈，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相继爆发。而我红军主力北上已胜利到达抗日的前进出发地，南方八省的游击根据地的革命红旗始终屹立不倒，全国人民，包括海外侨胞又以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斗争紧密配合，国民党蒋介石迫于形势和全国抗日运动高涨的压力，其“北和南剿”的反动方针再也不能推行了。

临时省委在同上海党组织取得联系后，逐渐了解到党中央关于联蒋抗日的主张。1937年4月，在刘英同志主持下，以临时省委和省军区名义向浙江国民党当局发出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

文电。……刘建绪复于8月间给临时省委送来亲笔信，要求和我方重开谈判。临时省委遂派代表到温州同国民党浙江当局谈判。9月16日双方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

3月18日，我们由平阳山门出发，欢送的人群是饱含深情的。浙南游击区的革命群众，三年来哺育了我们游击队的成长，不少人以自己的生命换取了我们的新生，现在，新的革命使命在召唤着我们，大家都要为了迎接新的任务而战斗了。这样的分别又是很有意义的。

在我们途经瑞安、泰顺、丽水、松阳、遂昌、龙游、衢县、常山、开化、屯溪等县境时，都曾派人去同国民党当局交涉，要求立即释放“政治犯”，使一批被国民党逮捕和迫害的同志得以出狱。……我们行军一个月，到达歙县岩寺，加入了新四军的战斗行列，整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三营。（摘录于粟裕回忆文章：《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 忆三年游击战争中的粟裕同志

叶 飞

我是三年游击战争之前就同粟裕同志认识的。第一次见面是1934年8月，那是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即红七军团），在渡过闽江，进攻福建省会福州之后向闽浙边挺进，经过闽东地区时，我代表闽东特委和闽东红军在宁德赤溪、福安穆阳同北上抗日先遣队会师时同粟裕同志见面的，那是他是军团参谋长。再次见面是1935年10月，那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最艰苦的岁月。他和刘英同志率领红军挺进师，挺进到浙西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浙西南新的游击区，到达闽东地区在泰顺、寿宁交界的郑家坑村和闽东特委、闽东红军会师。会师后，召开了挺进师政委会和闽东特委联席会议，成立闽浙边临时省委和闽浙军区。从此，我和粟裕同志结下了战斗友谊。

粟裕同志是很有脑子、长于思索和善于总结经验的人。会师不久，我们有一次深谈。他向我提出一个当时游击战争中非常重要的问题。粟裕同志说，他们最苦恼的一个问题就是丢不掉“尾巴”。“尾巴”指的是跟踪的敌人。粟裕同志问我，你们闽东的队伍是怎么摆脱跟踪的敌人，丢掉“尾巴”呢？我一下回答不出来，因为我们还没有好好总结经验。我想了下就说，有什么经验，我说不上来，我就把闽东部队活动的规律告诉他。我说：闽东部队（即闽东独立师）是土生土长的游击队，没有本事不要根据地或者远离根据地到白区（即国民党统治区）横冲直闯，部队要到

白区活动，开展游击战争，发展新的游击区，我们的做法一般是先派人去做工作，掌握情况，了解道路，然后部队才出动。我们把这叫做：群众工作再先，部队在后。此外，我们部队到白区工作，是以根据地为依托的，当时闽东地区有四块根据地。而且我们部队活动规律是不走回头路，即从这块根据地出去活动，回到另一块根据地隐蔽休息。我们从根据地出去到白区活动，是夜间行军，一夜走七十八里，一般敌人要到第二天或者第三天才发觉我们部队行动，又不知道这个部队从哪里来的。等到敌人调动兵力要来打我们时，我们能打就打，不能打就又于夜间开回另一块根据地隐蔽休息，敌人不知道我们部队到哪里去了，就把要跟踪或已跟踪的敌人摆脱了。粟裕同志听了后说：“哦，这叫做‘狡兔三窟’！就是根据地。”他还说：“我们在浙西南就是吃了没有根据地的苦头，所以甩不掉‘尾巴’，部队得不到休息，伤病员也没法安置！”他这么一概括，实际上就是总结了开展游击战争要有的根据地的思想。粟裕同志是从浙西南游击战争的亲身体验中深刻地领会了这一毛泽东军事思想。（摘录于《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浙南游击区》，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



## 闽浙边界革命力量的初期发展

范式人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闽浙边界的平阳、瑞安、庆元、龙泉等县是闽东根据地的一部分。对泰顺来说，与闽东党所领导的福鼎、柘荣、寿宁三县有直接关系。1933年下半年，黄淑宗（福鼎墩头人）和几个学生从福州回家乡开展党的组织活动。七八月间，福州中心市委派叶秀藩到福鼎活动，领导斗争。叶秀藩这时就住在黄淑宗家里。1933年底至1934年初，组织建立了游击队，队长名叫罗烈。从此，扩大了政治影响。

1933年3月，叶飞、范式人、阮英平同志率领武装队伍和革命群众在寿宁西区（泰顺边界）和东区先后举行了武装暴动。由于浙保的残酷镇压，损失惨重，暴动没有成功。游击队当即撤到福安。有一部分工作队员撤到霞浦、柘荣、堵坪一带活动；一部分人员就在泰顺的交溪和柘荣一带开展工作，组织群众开辟新区。这时王陶生也一起在这一带活动，他是工作队的领导人之一。我主要在军队中工作。

1934年1月，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马立峰为主席。到三四月间又由叶秀藩任主席。四五月份，福建省委被破坏，闽东地区一带失去组织领导。因此，1934年7月，连（江）罗（源）中心县委、福安中心县委合并成立了闽东特委，苏达任书记，常委有马立峰、叶飞、阮英平、占如柏、叶凯、魏耿等。

1934年9月30日，叶飞、冯品泰、赖金标等同志在宁德县

支提寺召开会议，由闽东独立团和连罗十三团合并成立闽东独立师。

叶飞为独立师政治委员，冯品泰为师长（冯是抗日先遣队留下的伤员），赖金标为副师长。

1934年11月以后，敌人大举“围剿”闽浙边区，形势很严重。福安苏维埃政府受到了严重损失。叶飞带独立师一、二团到宁德一带活动，把敌人引到苏区去，以分散打击敌人。这时，我与叶秀藩，范义生在泰顺边界一些地方活动，并派人到泰顺的洲（周）边一带抓土豪、烧碉堡，建立党组织。当时在麻竹宅这个地方建立了区苏维埃政府。这段时间由于敌人的进攻，形势紧张，闽东特委也遭到严重损失。

1935年6月，闽东特委恢复，叶飞任特委书记，阮英平任组织部长兼闽东游击区办事处主任，我任宣传部长、独立师政治部主任、闽东苏区办事处主任。特委委员有许旺、黄固生，后增补了郑宗毓、吴基现、占嫩弟。寿宁、霞浦、闽浙边一带都属特委苏区办事处领导。这段时间福寿县委的工作开展得不大好，不够扎实。到1936年初，才决定成立寿泰县委。县委是在寿宁郑家坑山上一座单独房子内成立的，叶飞同志和我都住在这里。决定缪洪骥（三星人）为县委书记，王陶生、许威、叶家竹、缪阿固等为县委委员。许威兼任县游击队政治委员。他调任后方办事处后，由缪阿固（南山下一带的区委书记，1935年牺牲）接任游击队政治委员。

1936年秋，寿泰县委游击队扩大为独立营，金星海（大王前人）为营长。1937年三四月，独立营负责人之一的方耿叛变，金星海牺牲，游击队被搞垮。

1936年初，还成立了霞鼎泰县委。县委书记是柘荣人，姓谢，

名字记不起，后来牺牲了。该县委属霞鼎中心县委领导，中心县委由许旺同志负责。

关于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的情况，我记得是这样：1935年农历8月间，我以前派到寿宁西区及泰顺一带活动的游击队政委叶藩来向我报告，说红军挺进师已到浙江庆元一带。我就带一部分同志赶去。赶到庆元边上，挺进师已走了。这一次没有联系上。10月间，粟裕、刘英同志率领的红军挺进师120多人来到福建省寿宁县含溪与叶飞、阮英平和我们会师。会师后的第二天，我陪同粟裕、刘英同志到甲坑和郑家坑住了一二天，他们就走了。

听叶飞同志说，会师时，刘英、粟裕同志与叶飞同志研究决定成立闽浙赣省委，并决定叫叶飞同志去找黄道同志商量，请他当书记。刘英、粟裕同志仍回浙西南活动。一个月左右叶飞同志才回来，刘英、粟裕同志也回来。由于黄道同志不同意，因此第二次会议就成立了闽浙边临时省委，同时相应地成立了临时省军区，刘英为书记兼省军区政治委员，粟裕为组织部长兼省军区司令员，叶飞为宣传部长兼团省委书记。省委委员闽东方面有阮英平、范拯民（范式人）、许旺等；挺进师方面有那些人是省委委员，我记不清。第二次会议不在寿宁的含溪、郑家坑、甲坑一带召开，我当时都在这一带地区活动，比较清楚。第二次会议我记得是在泰顺召开的。

这只是一个简要回忆。可能有的不大准确，请粟裕、叶飞同志更正。（中共泰顺县委党史研究室：《泰顺革命亲历记》，1995年内部编印。）

## 1935年至1936年间 挺进师在泰顺的革命活动

龙 跃

1935年1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和红军中央军委，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指示电责成闽浙赣省委，将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余部组成红军挺进师到浙江长期行动，当时中央分局给红军挺进师的主要任务是深入浙江，广泛的开展游击战争，扩大党和苏维埃的政治影响，充分发动群众斗争，直到分配土地创建新的游击根据地，以及建立党的组织，配合友军行动，调动和吸引敌人，从而粉碎敌人的“围剿”计划。

闽浙赣省委接到分局的指示后，便立即组建了红军挺进师，粟裕同志为师长，刘英同志为政治委员，黄富武同志为政治部主任，姚阿宝同志为特派员，王蕴瑞同志为参谋长，全师人数共500余人，长枪400多支，重机枪4挺，轻机枪8挺。由闽浙赣根据地出发，全师上下在党的领导下，精神振奋，斗志顽强，深夜兼程通过了敌人的六道封锁线，最后胜利渡过信江，进入武夷山区。于1935年3月下旬入浙，到达龙泉以西地带，4月13日、14日占领景宁县的上标打下沙湾，同月20日进入泰顺，在潭边街（现称台边）消灭敌人一个基干连，并乘胜占领司前和百丈口，百丈口的敌人闻风逃跑，同时切断和破坏了泰顺通往瑞安的水路交通及电话线，严重威胁泰顺县城罗阳镇，潭边一仗是我们在泰顺打的第一个胜仗。此外，扩大了红军在各界层人民中的政治影响。

浙江是中国四大家族中的蒋、陈两家族的老窝，反动基础比

较强，反革命的嗅觉也比较灵敏，我们刚踏进浙江，敌人就立即调来了二、三个团对付我们，敌人的力量胜过我们好几倍，但我们这个部队是很能打游击战的，我们部队的前身是红军第七军团，在中央苏区反对蒋介石第四、第五次“围剿”时，灵活地运用游击战术在极频繁的运动中消灭了大量敌人，曾经得到过党中央和红军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嘉奖。

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时，浙南大部分还是个白区，当时与地下党还未联系上，我们要想得到敌人的情报比较困难。我们这次由上标方向出发向泰顺挺进时，后面就有敌人两个团的兵力跟踪我们，以致取得潭边战斗胜利后的第二天晚上在福建省寿宁县的上村，遭到闽保第二团的袭击，略受了一些损失，行动曾一度趋于被动，但我们的部队英勇善战，粟裕、刘英同志指挥得机动灵活，后来经过斋郎一战（斋郎现属庆元县，时间是1935年4月25、26日）打垮了浙保主力第一团李秀部和闽保第二团马洪深部，以及一二千名大刀会的进攻，俘虏了敌人几十名，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打伤了伪团长李秀。

红军挺进师渡过龙泉河后，又派遣了第四纵队继续回到庆、景、寿、泰之间活动，于5月底或6月初，在寿宁县境内与闽东红军会师，将粟、刘两首长的信交给了闽东特委负责人，并带回了闽东特委给粟、刘同志的回信。这一次是红军挺进师第四纵队与闽东党和红军第一次会师。

1935年9月，国民党调来罗卓英的十八军向浙西南进攻，为了牵制、分散敌人的兵力，以保卫浙西南游击根据地，以求粉碎敌人“围剿”之目的。粟裕、刘英同志率领挺进师师部及第三纵队又重新南下，回到庆、景、寿、泰之间行动，10月5日在寿宁的甲坑与闽东特委和闽东红军会师。这是红军挺进师与闽东特委



和闽东红军第二次会师。那时双方都有联合起来，统一指挥，统一步调对付敌人的愿望。因此，挺进师领导与闽东领导人召开了联席会议，商议成立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事宜，后来又成立了红军闽浙边临时军区，统一领导和指挥闽东和浙江两方面的工作和部队。会议一致公推刘英同志为临时省委书记，后来又兼任闽浙边临时省军区政治委员；粟裕同志为临时省委组织部长，后来又兼任闽浙边临时省军区司令员；叶飞同志为临时省委宣传部部长，后来又兼少共临时省委书记，省委委员除刘、粟、叶外，还有黄富武、刘达云、洪家云、方志富、许信昆、阮英平、范式人。此外闽东的范极民、挺进师的谢文清和后来担任浙南特委书记的郑宝玉（毓）是不是省委委员，我记不十分清楚，如是的话，省委委员就是 13 人。这次会议，只是初步提出一个方案，约经过一个月左右时间的酝酿，红军挺进师再与叶飞等同志会合举行第二次联席会议方才正式定下来。

红军挺进师师部第一次与闽东特委和闽东红军会师后，又迅速回到了浙南，经过景宁、青田、瑞安和平阳之间。由于全体指战员在党和师首长的领导下，英勇作战，先后攻下了国民党反动派十几个重要据点，如南田、大岙、玉壶、平阳坑、腾蛟和水头街等市镇，打了好几个胜仗，然后又经过泰顺，于 11 月中旬之间再次进入寿宁县境内，大约是 11 月底，再出福建打回浙江，经过瑞安县的珊溪（珊溪现属文成县）、高楼和平阳县的晓坑、顺溪、莒溪、青街等地第三次进入泰顺。从此，红军挺进师在泰顺辗转不停地开展游击战争，几乎泰顺县的所有大的村镇，如百丈口、莒江，司前、大安、卢梨、战州、仕阳、东湾坑、雅阳、五里牌、白粉墙、西地、白柯湾、峰文等地方挺进师都到过。1936 年 1 月间在泰顺国岭冥斋岩与闽保四团的一个连遭遇，我军

英勇顽强，猛打猛冲，只用了半个多小时全歼该连，缴获全部武器弹药，其中重机枪二挺。2月间（注：有的同志说是1935年11月初）在白柯湾消灭浙保独立第十大队一个连，在取得一连串胜利的基础上，我们就在泰顺“扎根落户”，建立了泰东根据地（即泰平区和平阳、福鼎的一部分）。同年2月间，在金寨（现名为均山）、二湖与福鼎地下党会师。在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领导下成立了中共浙南特委，郑宗玉（毓）为书记，组织部长由我担任，接着又成立了泰顺县委，书记开始由周建生担任，稍后由周钦明担任，周钦明同志是福鼎周家山人，是个比较好的同志，可惜于1937年春在敌人进攻中英勇牺牲。泰东（即泰平区）根据地建立之后，接着建立了泰东北和泰东南根据地，红军在泰顺的活动也更加频繁。

1936年10月13日，挺进师一部在刘英同志的率领下，在仓边消灭浙保一个连，伪连长被击毙，副营长陈达德和全部敌兵被俘，缴获长短枪70多支，轻机枪1挺。17日，挺进师在淡竹阳开会庆祝仓边战斗的胜利，第二天早上敌闽保一个团在富垟敌人的配合下，兵分三路来进攻。这一仗缺乏警惕没有准备，未能打好，我率领陈先海那个支队阻击敌人，掩护省委撤出淡竹阳，经叠石（原称玉石）到达西地村。

此后，我离开了泰顺，去平阳、瑞安一带活动。（1982年7月谢水斌于上海华东医院记录整理，已经本人审阅。泰顺县民兵斗争史办公室内部资料。）

## 关于挺进师在泰顺革命斗争的回忆片段

张文碧

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全师共 500 余人，粟裕同志为师长，刘英同志为政治委员。根据中央分局的指示，为了吸引敌人，粉碎敌人的“围剿”，挺进师在闽北车盘坑短期休整后，全师上下精神振奋，斗志旺盛，日夜兼程通过了敌人六道封锁线，最后胜利渡过滔滔的信江，进入武夷山区。1935 年 3 月 22 日进入浙江西南面的龙泉、遂昌、松阳一带。为了和闽东北游击区连成一片，还把第二纵队部署在龙泉、松阳、云和、泰顺一线。这个地区到处是深山老林，群众居住分散，交通极为不便，群众生活贫困。敌人的反动宣传影响较深，加上封建迷信严重，地主反动武装和大刀会多，我们部队连吃饭问题都难以解决。因在这一地区立足有一定的困难，行动了 10 多天后，1935 年 4 月间，刘英、粟裕同志派我所在的支队去把第二纵队找回来。刘英、粟裕同志率领部队向泰顺、寿宁进发。我们和刘英、粟裕同志分开行动的第二天，在松溪县的边界处与敌人遭遇，打了一仗。敌人大约有 1 个加强连的兵力。我们打得英勇顽强，敌人死伤很多，溃退了。我们的损失也很大，我支队七八十人，撤退下来只有四五十人。支队政委在战斗中失踪，找了一天也没找到，政委一职就由我代理。我与支队长把人员集中起来，我给同志们作了思想动员。我说：“同志们，这次战斗我们虽损失很大，但我们一定能发展壮大起来。我们是革命的，你们放心跟我们走，去找刘粟两位首长，革命一

定能取得胜利。”我们在一个向导的带领下，两三天后在泰顺和寿宁的边界地区找到了挺进师师部和刘英、粟裕同志。4月20日在泰顺台边消灭敌人1个连，并在泰顺转了两三天。4月25日转到庆元斋郎。在粟裕、刘英同志的指挥下，打垮浙保主力第一团李秀部和闽保二团马洪琛部，以及2000名大刀会的进攻，打伤了敌团长李秀。斋郎战斗是挺进师进入浙江以来较大的一个胜仗。这一仗后的5月中旬，我们挺进师在刘英、粟裕同志的率领下，又经过泰顺、瑞安、永嘉、青田、龙泉、遂昌、宣平，绕了一大圈。最后把落脚点放在遂昌与龙泉交界的松阳县境内的枫坪、安岱后一带山区。没有多久的时间就把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陆续建立了农民协会、贫农团、妇救会。到了1935年5月底，儿童团、少先队等青少年团体也都建立了。我们部队从几百人发展成一二千人，并在这里建立了浙西南军分区。

1935年9月，敌人大举进攻浙西南根据地，部队撤出上述地区。当时除留一部分队伍坚持外，我们随师部到浙闽交界地区活动。一次，袭击了驻上标的保安团1个连。10月17日，挺进师一部200余人在粟裕、刘英同志的率领下，袭击了泰顺百丈镇警察所，歼灭敌警察1个分队，缴获步枪七八支，子弹170发。同一天，一鼓作气赶到泰顺可溪。10月18日消灭敌保安团1个连。我们在师首长的率领下，不怕疲劳，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一口气跑了130多里的山路，一连打了3仗，缴获了许多战利品，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鼓舞了军民的斗志。

1937年2月，我们参加了泰顺峰文大战。这一仗虽然被我方消灭的敌人不多，但在浙闽边影响很大。当时我们挺进师部队有1000多人参战，敌人的兵力有3000多人。苏联《红星报》曾报导了峰文大战的消息。峰文大战后的7月间，我们带一个支队几

十个人到达峰文，并在山上住了三天。这次去主要是找粟裕同志，没有找到。我们就把敌人的电话线一直割到山门，破坏了敌人的通讯联络。

国共谈判达成协议后，1937年11月，我们部队驻山门一带时，叛徒刘达云从国民党衢州监牢里放出来，到山门找部队，可不久又跑了。稍后，刘英同志又派我到浙西南地区去找粟裕同志及部队，共集中了七八十人带回平阳山门。

1938年2月，我们部队从平阳山门出发时，我和刘亨云同志又到泰顺县城（部队未进城），与国民党县政府交涉放人问题，因为我们知道泰顺监牢里关着好几位同志。不一会，国民党县长何芸生慢吞吞地来了。一见到我们是红军，他假装客气请我们坐下。我说：“我们在战场上已多次交过战，久闻县长之名。我们共产党以大局为重，和你们团结抗日，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可你们不讲信用，至今仍将我们的战士关在牢里。你带我们去看看，到底关了我们多少人。”何芸生只好点头答应，陪同我们两人去监牢。我们认到有两个同志，就当场释放带回来了。牢里还有一个原来是我们支队的司务长。他已叛变投敌，国民党县长也要我们带回来。我说：“这个人就给你们了。”就这样，我们带着战士，去追赶自己的部队了。（中共泰顺县委党史研究室：《泰顺革命亲历记》，1995年内部编印。）



## 闽浙边根据地的斗争

郑丹甫

福鼎原属闽东革命根据地,1933年开始,闽东党多次派叶秀藩同志(寿宁县城鳌阳镇人,1929年至1931年在福州乌石山师范读书,曾任闽东特委委员、闽东苏维埃政府副主席,1935年被敌杀害)来福鼎开展革命活动。1935年,闽东特委叶飞等领导同志决定开辟闽浙边区根据地,派特委常委阮英平、郑仲毓(郑宗毓)率领福鼎独立团(即闽东红五团)进入福鼎、泰顺、平阳交界地带开辟新区。同年10月,以粟裕同志为司令员、刘英同志为政治委员的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进入闽浙边与闽东党会合。不久,成立了闽浙边临时省委。临时省委的成立对建设闽浙边根据地起了重大作用,党的组织和红军得到了发展,从而胜利地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 一、闽浙边区根据地的创建

1935年11月,闽东特委叶飞等同志决定开辟闽浙边根据地,派特委常委阮英平、郑仲毓同志带领红军独立团(团长陈义成、政委罗烈生)向福鼎、泰顺、平阳三县交界地带开辟新区,这就需要一批地方干部。因此,把我和周义群调出来随独立团行动,阮英平、郑仲毓带领独立团到达上东区周佳山,又从上、下东区调出周钦明(又名刘祖文)、谢卿城、邓质玉和碇洋的李桂玉、占

脚的李正玉、五岱的陈辉、战坪洋的温德奎、柘坑下的陈德胜等十几个当地干部,跟随独立团一起进入泰顺,到达金山大湖、二湖、富垵、彭坑一带活动,后来转到福鼎茗洋牛栏岗。在牛栏岗,有一天独立团团团长陈义成、政委罗烈生把我和其他几个同志叫去开会,在会上介绍我入了党(从当日起即为正式共产党员),同时宣布成立鼎泰区,任命我为区委书记,区委委员有邓质玉、周钦明、谢卿城、李桂玉、陈德胜、陈文凯(后来叛变)等人。

从鼎泰区西北到泰顺峰门大坳外时玉塔、五里牌,从南到福鼎桐山,从东北到平阳桥墩、分水关,这一带的农民群众深受地主压迫剥削之苦,福鼎茗阳、岭头的贫苦农民,每年要向桐山城里的地主交纳八千担租谷。重租高利盘剥,苛捐杂税繁多,农民纷纷破产,不少人沦为长工,生活极端贫困。早在1934年下半年,就有地下党同志化装茶商来这一带秘密活动,建立了地下交通站,播下了革命种子。鼎泰区成立以后,广大贫苦农民在党的领导下,觉悟起来,革命烽火很快燃遍整个鼎泰区。在鼎泰区成立前后,又成立了泰平区(泰顺与平阳交界地区)和泰东北、泰东南等三个区。泰平区委书记陈鸣皋叛变后,由李正玉、黄明星前后接任;泰东北区委书记从鼎泰区调周钦明去担任;泰东南区委书记陈希简牺牲后由刘宝生同志接任。

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以后,接着成立浙南特委,闽东特委常委郑仲毓同志留在浙南任特委书记。这时浙南特委下辖有福鼎县委、鼎平中心县委及新成立的瑞平泰县委(只有鼎泰和鼎平两个区)。大约在1936年夏秋之际,郑仲毓被当作AB团错杀了,特委书记前后由谢文清、龙跃同志担任。

## 二、红军的胜利和根据地的扩大

挺进师进入泰顺打了几仗,那时还未与我们联系上。大约在1935年12月底,粟裕同志率领红军约200人在泰顺富垟头村宿营,派交通员到柘坑下找我(时任鼎泰区委书记)。当夜我赶到他们驻地,向粟裕同志汇报了鼎泰区的情况,他全面了解情况后对我说:“挺进师以后要依靠这一带根据地开展活动,下次我还会来,刘英同志也会来找你。”并告诉我,他的化名叫金米,刘英同志的化名叫可夫。第二天天亮之前,敌军向金山方面追过来,粟裕即率部队插过板山向泰顺峰门而去。一个星期后,刘英同志率领部队到金山二湖找我,我向他汇报后,他交给我一百块银元安置伤病员。还告诉我,临时省委已决定把鼎泰区划为省委直属区,由省委直接领导。又过了半个多月,春节刚过,那天大雪纷飞,层林皆白,刘英、粟裕两位同志带领部队在富垟莲花山宿营,我们地方党的同志为他们探消息,站岗放哨,搞吃的穿的,部队的同志感到很温暖,像到了自己家里一样。

挺进师在闽浙边活动一个时期后,粟裕同志带领部分主力回浙西南,巩固浙西南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刘英同志带领省委机关和警卫班在福鼎、泰顺、平阳一带活动,以巩固发展新建立的根据地。

1936年4月下旬的一天,刘英同志带领两个警卫班和地方干部(只有20多人,8支驳壳枪,4支步枪)从鼎泰区过乌溪前往百井丘,因洪水暴涨,不能过溪,就在王家山驻扎下来。当地的反动分子向保安团长陈佩玉报告,陈即派一个连来袭。鼎泰区的群众觉悟很高,耳目很灵,很快就探明了情况,敌人一出动,地下党同志就赶来向刘英同志报告。他立即带领警卫班抢先占领了山头。

敌人由透埕岭上来，用一挺机枪在前面开路。当敌人距我军伏击地只有几米远时，刘英同志一声喊“打”，一警卫班战士一边射击，一边向敌人猛扑过去，一把夺过敌人的机枪，调转头就打，后面的大队敌人吓坏了，不知我军有多少兵力，掉头就跑。就这样，我们20多人，打垮了敌人一个连，缴获了一挺机枪和十几条步枪。这一仗打掉了敌人的锐气，打出了我军的威风，使我军站稳了脚跟。以往敌人每次出动“清剿”，耀武扬威，到了哪里，哪里的群众就遭殃。因此这一仗对群众鼓舞很大，普遍被发动起来了。革命群众纷纷加入红军，刘英率领的警卫班由20多人发展到100多人，新建了一支省委机关的直属部队。省委为了进一步开展群众工作和加强武装斗争，编印了《各种组织与工作大纲》的小册子，对贫农团和贫农协会的组织办法及其任务和要求，对建立侦察网和游击队都作了明确规定。各县、区游击队进一步扩充人员，新区也建立起游击队，鼎泰区游击队就是新建起来的一支武装。

同年6月，省委机关在南峰山开会，得悉有一连敌人从桐山西北“清剿”过来，要经过上奥青山岭回桐山县城。刘英把部队埋伏在青山岭待敌。由于上次遭到红军伏击吃了亏，敌人这次到上奥村，先派一个排向青山岭探路，这个排被我红军消灭，其余敌人退守上奥村，向排头王家山方向退去。

这一时期，闽浙边革命发展趋向高潮。红军节节胜利，敌人龟缩在城里很少出来，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发展，省委上半年在浙南整顿党组织，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任务基本完成。浙南地区除原有的鼎平、福鼎、瑞平泰三个县外，还相继成立了桐霞县委、泰顺县委、平阳县委（后并鼎平县）。还对干部进行了调整，我任瑞平泰中心县委书记，瑞平泰中心县委原书记周建生同志调任平阳县委书记，泰顺县委书记由周钦明同志担任，桐霞县委书记由林

辉山同志担任，鼎平中心县委书记黄固生叛变后，调江如枝担任，江逃跑后，由龙跃同志担任。闽东、浙南、浙西南、浙东四个特区基本上联成一片，像一条铁链锁住了敌人的咽喉。这期间发生了两广事变，蒋介石将驻浙江的罗卓英这个王牌军调到湖南去对付两广军阀，还调走驻闽东福鼎、霞浦第九师的一部分，只剩刘和鼎的第五十六师仍留在闽浙边界的建、松、政地方。在浙江方面剩下6个保安团，15个保安大队，和新成立的5个独立营；在闽东方面有闽保第四和第六两个团。此外，就是国民党一些县、区的地方武装，浙江的基干队，福建叫民团。国民党主力军的暂时调离，对于我们开展游击战争，是一个很有利的因素。

鼎泰区归瑞平泰中心县委领导后，经过半年来的建党和群众革命斗争，全区有20多个村庄建立了基层党支部，普遍成立了村贫农团、赤卫队和农会，有些地方还成立团支部和妇女会。1936年五六月间，在浙南特委和瑞平泰中心县委领导下，鼎泰区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全区性的群众斗争。那时正值青黄不接，群众面临饥荒。根据群众迫切要求，瑞平泰中心县委，于6月间的一个晚上，在鼎泰区发动上岙及其附近村庄的100多名贫苦农民，冲到双溪口大地主家要粮分粮。大家动作很快，只半个小时就把粮食分掉。之后，牌头、透垵、乌溪、石帮屈等地也跟着行动起来，很快就形成了全区性的运动。群众渡过了难关，斗争情绪更高。在发动要粮分粮斗争的同时，还发动群众破坏敌人交通，摧毁敌人碉堡。5月的一天晚上，发动全区群众，分段包干，当夜把从福鼎县水北溪至平阳县桥墩镇五六十里路的电线杆全部锯光。以后敌人架起电杆又被我们锯掉。这样反复多次，搞得敌人束手无策，只好龟缩在城里干瞪眼。

1936年6月，临时省委在福鼎排头召开扩大会议，为了使根



根据地群众得到实际利益，充分发动群众，搞好根据地生产，加强根据地建设，会上决定成立浙南人民革命委员会，开展分青苗、分土地斗争。我任委员会主席，陈辉、蔡爱凤分别负责青年、妇女工作。福鼎、鼎平、桐霞、瑞平泰四县同时成立人民革命委员会，各区、乡也普遍成立人民革命委员会。首先决定分青苗，由于这是一项新的工作，没有经验，8月份就在泰顺东云办了一期20多人的训练班，培训骨干。当时罗连生在东云治病（后来叛变），他帮我一起办。办法是一律按人口平分，这样虽然粗糙一些，但群众还是发动起来了。由于各地情形不同，比较巩固的根据地分得比较彻底，有的地区没有开展。这年11月，国民党反动派重兵“围剿”闽浙边区，形势急剧恶化，就没有开展分土地斗争。

1936年10月中旬，刘英率领部队200多人，加上各地游击队共有300多人，计划攻打驻泰顺富垵碉堡的浙江保安团，拔除敌人据点，巩固根据地。经探明敌人增兵到一个营，又有碉堡工事易守难攻，因此，决定把敌人引出来加以歼灭。刘英把部队部署于仓边三降山（又名龟仔山），派一支地方游击队有意暴露目标引诱敌人，又派当地群众到富垵向敌人报告游击队到达仓边的消息。第二天，敌人果然出动一个营，分两路向仓边包围过来。一路由敌副营长陈达德带领，直接向仓边进犯，进入我军伏击圈，被我军全部歼灭，陈达德也被我军俘虏。另一路敌人进到车头，闻这边战斗打响，赶来救援，也被击退。红军打仗时，群众积极配合，站在山上助威，喊杀连天，红军打了胜仗，他们勇敢地冲上去抓俘虏，收缴武器。

仓边大捷后，军民一起在淡竹阳开庆祝大会，搭台演戏。不料浙江保安团和福建保安团共2000多人兵分三路向淡竹阳包围过来，当群众接连来驻地报告敌情时，我领导人麻痹轻敌，认为消

灭敌人很有把握，遂按兵不动，而由地方游击队防守山头。本来如能及早部署，利用淡竹阳的有利地形，在游击队的配合下，我军集中兵力消灭一路敌人是有可能的，群众如能及早撤出也可以减少损失。由于在关键时刻贻误了战机，当敌人抢占了淡竹阳周围山头后，红军还在淡竹阳村，处境十分不利，好在红军战士久经锻炼，机动灵活，一番激战之后，部队大部分突围出来了。敌人占领了淡竹阳后，疯狂进行烧、杀、抢，群众受了很大损失，由于此仗失利，形势开始急剧变化。

### 三、坚持八个月反“围剿”的艰苦斗争

1936年11月，蒋介石派刘建绪的第四路军由湘入浙，并在衢州设立“闽浙赣皖四省剿共指挥部”，以刘为总指挥，调集正规军和保安团等约十余万兵力进行“围剿”，重点进攻浙南游击根据地。浙保二、三、四三个团兵力及国民党第八十师一个团直接进攻闽浙边，妄图一举消灭红军游击队，彻底摧毁我根据地，来势异常凶猛。尽管敌人步步为营，重兵“围剿”，我们并没有被压垮、被吓倒，仍活跃在敌人鼻子底下。1936年12月上旬的一天，浙南特委和瑞平泰中心县委武装兵分两路出击，全歼了鼎泰区银洞坑、丁埠头的联甲兵，烧毁了敌碉堡。在这期间省委率红军主力从浙西南回浙南，又消灭了鼎泰区月湖洋三个村的全部联甲兵，烧毁了这一带的碉堡，狠狠刹下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1937年春节，刘、粟部队和游击队共1000多人，正在峰文大力训练干部，准备新的斗争。1月7日，浙保二、三团和八十师一个团约3000多人向峰文进犯。敌人从秀涧经峰坳冲上来，在距峰文五华里的董家坪，受到我军顽强阻击。敌人见山路堵住进不

来，就爬山从右侧的高山架重机枪扫射。临时省委和红军主力从董家坪、峰文陆续撤到甘洋一带，准备等敌人返回时，埋伏在那里消灭他们。第二天，国民党驻福建的八十师又从富垵向这边逼进，占领了板山。我军控制了制高点峰文寿桃尖，但敌人前后夹攻，情况非常危急，从上午一直打到下午，未见分晓。下午三四点钟光景，气候转变，山上笼罩着大雾，我们就乘机从两股敌人夹攻中撤出。敌人以为我们还在山上，从福建增援的八十师和从秀涧来的浙保二、三团交起火来，等到发现是自己人时，双方已伤亡惨重。这次战斗影响很大，当时苏联《红星报》曾报道过这个消息。峰文战后，刘英决定红军和游击队分散活动，跳出敌人包围圈，开展游击战争。一部由粟裕同志带领转战浙西南，一部由刘英带领进入浙东南，一部分地方武装由浙南特委掌握，留在闽浙边坚持斗争。

敌人这次“围剿”，采取进攻中央苏区时的反革命策略，占领一地，即构筑碉堡，派兵防守，步步推进，层层缩小包围圈。所有村庄实行联保联甲，强迫群众并村。面对敌人的疯狂进攻，根据地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坚决斗争。鼎泰区群众一夜间破坏了从福鼎到分水关的全部电话线路。茗阳等地地下党员和群众，在敌人强迫筑碉堡时，白天筑，晚上拆，使碉堡很久筑不成。岭头乡长谢阿登（地下党员）和群众采取又拖又顶的方式坚持不筑碉堡。茗阳的群众把粮食、牲畜转移到山上藏起来，甚至把石磨都搬走，使敌人没吃没喝蹲不住。在敌人进攻的第一阶段，碉堡未建，立足未稳，车头、富垵等地干部群众纷纷要求特委武装去支持他们打击敌人。当时特委内部有两种意见：一是乘敌人立足未稳，依靠群众打击敌人；二是等待主力红军回来再打。由于后一种意见占上风，浙南特委没有采取积极的措施，车头群众要求打，

我们说不打，直接挫伤了群众的斗争积极性，群众曾责问我们“为什么按兵不动？”1937年1月，当刘英同志带领红军主力回到闽浙边时，敌人碉堡已经筑好，各种反动组织已经建立起来，边界地区已被敌人控制，由于前些时浙南特委的犹豫等待，失去了主动打击敌人的机会，我们面临的困难更大了。这时省委已把特委书记谢文清调走，其职务由龙跃同志接任。

1937年2月间，临时省委在泰顺天门下后门山上牛童往一座房子里召开会议，一共有20多人参加，我也参加了。临时省委根据敌人重兵压境，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决定部队化整为零打游击，地方干部分散隐蔽活动。采取“隐蔽精干”和“白皮红心”的策略，派一些党员和积极分子当伪保长和村丁，以便坚持斗争，掩护我党干部，保存革命力量（这条措施对坚持反“围剿”斗争并最后取得胜利起了很大作用）。刘英同志估计，同志们与临时省委分开的时间较长，要大家作长时间坚持斗争的打算。会议决定：陈辉、余龙贵、蔡爱凤等几十位同志留在泰平区一带坚持斗争；我和林辉山同志带三十多人插到鼎泰区敌人后方活动；龙跃同志带领特委机关，坚持鼎平、平阳一带的斗争。

牛童往会议后，我们开始在茗阳一带活动。这时敌人已经筑好碉堡，在这里驻扎了一连兵，周围的村庄实行联保联甲制，还组织联甲队站岗放哨，封锁交通要道。联甲队员本来都是我们的基本群众，有的还是我们的党员和积极分子，温德奎等几位同志还曾化装成联甲队员和他们一起站岗放哨。因此，尽管敌人戒备森严，我们照样可以进行活动，一个连的敌人驻扎在这里也等于瞎子。

我们同临时省委机关分开后，形势日趋紧张，福鼎县委书记刘清扬因交通被敌人封锁，回不去了。福鼎地区的工作由郑魁同

志暂时负责，他在柴头山一带坚持斗争，在太姥洋一次作战中被捕，于桐山壮烈牺牲。福鼎县委垮了，鼎平上、下东区党组织也遭到了破坏，特委机关转移到平阳去，我们与特委机关失去了联系。泰顺县委书记兼泰东北区委书记周钦明和区委委员谢卿城被叛徒出卖牺牲了。鼎泰区委书记陈文凯、区委委员翁振南和泰平区委书记陈鸣皋叛变了。陈文凯带着 2000 多银元和 2 支短枪、8 支长枪投降敌人，陈文凯、陈鸣皋、翁振南都是茗阳人，对当地情况和我们的活动规律非常熟悉。这三个叛徒带着敌人到处逮捕，杀害我党同志和革命群众。党的基层组织和交通站遭到严重破坏。他们还像猎狗一样紧紧地跟踪我们。我们在茗阳站不住脚了，退到高滩、南峰山、何坑、上奥、青山岭、柴山、百井丘一带，一天转移一个地点，甚至好几个地点，跟敌人兜圈子，环境异常艰苦，坚持在泰顺斗争的同志只好钻山洞、吃树皮，栖身在峻岭密林之中。敌人天天搜山“围剿”，我们活动的地区越来越小。有一次，我们在柴山，敌人搜到跟前，我化装走了出去，蔡爱凤也化装采茶妇女上了山。我的警卫员林宗红和交通员谢加石来不及出来，掩护我们的房东黄章英（黄宗明父亲）急中生智，把自己祖宗的坟墓洞口打开，让他们两人藏在墓洞里，才躲过敌人的搜查。

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我们逐渐摸到敌人的规律，他们对老区疯狂“围剿”，而对新区比较放松，我们决定钻到敌人的眼皮底下去活动。山门底离桐山县城只有 10 华里，是个新区，我同林辉山商量，利用辉山姓林的宗族关系，插到山门底的园山仔村，建立立足点。山门底 200 多户人家分散居住在十几个自然村，群众基础好。我们以“五虎将”为骨干，建立了党、团组织，接着发动贫苦农民，相继建立了贫农团、妇女会、儿童团。所谓山门底“五虎将”是指林鸭妹、林珠妹、杨亚绿、李奕柱、邱御烛五人，他



们善于联系群众，有勇有谋，在群众中很有威信。党支部就是由这五个群众头头组成。在支部书记李奕柱带领下，全村群众都站在我们这一边，唯独联保主任夏联枝一户没有争取过来。我们与党支部研究，大家认为干脆派武装同志住到他家里去，看他态度怎样？夏联枝看到全村人那么齐心拥护我们，也不敢反对，只是说：

“其他人来往可以，只是红鼻子（辉山同志绰号）不要来。”因为他的儿子在桐霞县参加革命时，被当作 AB 团杀掉了，至今有气。我们让辉山隐蔽在其他村子，不让他看到，夏联枝被我们争取过来了，以后表现很好，没有泄露秘密。就这样我们逐步在山门底扎下了根。

我们同山底的群众建立了鱼水般的关系，他们为我们送情报，舍生忘死保护革命同志的安全，出现了许多动人的事迹。交通员吴三妹常以走亲戚为名，到岭头竹仔山一带送信，她把信藏在头发里或缝在双层鞋底里，保证信件及时送到。妇女董阿菊十分勇敢机智，有一次蔡爱凤正在她家吃饭，敌人突然进了村子，蔡爱凤来不及逃出去，董阿菊把蔡爱凤当作自己的表妹，同时叫许多妇女一起来拧竿麻，蔡爱凤也化装在里面，瞒过了敌人。敌人经常派特务到山门底密查暗访，并出布告悬赏通缉，声言抓到郑丹甫者，赏银 500 元。在英勇机智的山门底群众面前，不管敌人耍弄什么阴谋诡计，都白费心机。

山门底基点的开辟与各种组织的建立，正是处在敌人八个月疯狂“围剿”的最艰难时期，在白色恐怖之下，许多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敌人的屠刀下壮烈牺牲了。面对这种残酷的斗争环境，山门底的群众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配合我党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赢得了反“围剿”斗争的最后胜利。1937 年底，刘英同志在平阳北港特地接见了李奕柱、林鸭妹、林珠妹、杨亚绿、邱御

烛五位同志，高度评价了他们顽强的斗争精神，并称赞他们是山门底的“五虎将”。

在山门底期间，我们还很注意做统战工作，这是刘英同志教给我们的。桐山城里的联保主任吴泽夫是我的同学，也是好朋友，保长温承厚是我的亲戚，他们在桐山城里有社会地位，都同情革命。敌团长见多次搜查抓不到我，悬赏通缉也不见成效，就强迫他们送信动员我“投降”，并许下重愿，只要职务不高于他，要当什么官就给什么官。他俩被迫无奈只得送信。他们知道岭头乡长谢阿登是我们的人，与我们有联系，就先去找阿登，阿登见是我的好朋友，不经我们同意，就在一天夜里把他们带到山门底来了。山门底是我们唯一可靠的秘密据点，一般人是不准进来的。我和辉山同志商量，研究了对付办法：一是加强岗哨，日夜戒备，防止敌人偷袭，由林辉山负责；二是看他们的态度怎样，如果真是帮着敌人来劝降，那就有来无回了。想不到他们态度很好，还鼓励我说：“要干就得干到底。”经过观察确知他们后面没有可疑的人跟踪，林辉山就出面热情招待他们，对他们讲明当前形势和我党的光明前途，并要求他们给予帮助。他们都爽快地答应了。还共同商量应付敌团长的办法，只说找不到人，信无处送。他们回去以后，一直帮我们收集情报，购买物品，帮了不少忙。后来敌人闻到了一点风声，1939年春，把吴泽夫抓去坐牢，但他没有动摇。当时林辉山同志也被抓，关在同一个牢房里。敌人不知道抓的是林辉山，而吴泽夫明明认得他，也不指破，这个事例说明我们的统战工作有是成效的。桐山城里有一个人叫郑阿九的，是个流氓无产者，曾被敌人利用，经常到根据地刺探我方情报。他不知道我们在山门底，常来这里赌博，被我们抓了起来，通过一番教育把他争取了过来，利用他和敌人的关系，搞来了一些“通行证”和壮丁

队符号。有了这两样东西，虽然桐山城里驻扎着敌人一个团，我们可以自由进出活动了。

为了保护根据地的群众和我党干部的安全，还必须除掉为害最大的叛徒。当时我们力量不足，使用武装力量去除掉叛徒有困难，而且会暴露目标。因此想了一条反间计：以我们的名义写了一封信给陈文凯、陈鸣皋、翁振南三个叛徒，打通溪底村敌人内部的一个妇女（陈统细的姐姐）把信带进去，故意失落在敌人连长那里；再叫一些开明财主、士绅告陈文凯等人，说他们搞了那么久，不用说抓不到共产党要人，就连一个伤员也抓不到，分明是打一进来假投降的……敌人连长正为抓不到人而恼火，一听这些舆论，又有那封信作证据，一怒之下，就在排头地方，把陈文凯、陈鸣皋、翁振南这三个叛徒杀掉了。敌人失去了耳目，我们的行动可自如了。像茗阳那样老根据地，过去因为叛徒跟踪，我们被迫撤出，除掉叛徒以后，我们又可以在那里活动了。

当时我们的经费很困难，同志们分散住在群众家里，群众省吃俭用供给衣食，但时间久了，问题就突出了。在根据地里打土豪筹经费会暴露目标，不能搞。因此决定打桐山水北溪税务所。辉山带几个武装队员打进税务所，虽没有搞到经费，但这一仗震动了城里的敌人，揭穿了敌人散布的“共产党消灭光了”的谣言，对于处在白色恐怖之下的革命群众是个很大的鼓舞。

我们的经费虽很困难，但坚持在泰平区的陈辉等一批同志比我们更困难，我们多次派人送钱去支持他们，并把在那里隐蔽的一部分同志转移到山门底来，以减轻那边的负担。余龙贵同志就是那个时候由泰顺转出来的。后来，坚持在山门底的同志增加到三四十人，现在还活着的有余龙贵、蔡爱凤同志。蔡爱凤能逃出敌人毒手，是革命群众舍身相救的。1937年10月底，蔡爱凤同志

在高滩宣传抗日，被福鼎县特务察知，遭到敌人突然包围，高滩妇女金维娇把蔡藏在神龛里，但来不及把抗日宣传标语藏好，敌人以此为证据将金维娇及其夫蔡宗竹、还有蔡宗木、蔡吓菊、张以起、张吓椿等六人逮捕，押解到福鼎县城。县长林应根对他们加以严刑拷打，他们没有吐露一句实情。金维娇怀孕六七个月，被敌人一刀一刀活活割死。其他几位革命群众也为掩护我党同志，宁死不屈，壮烈牺牲。

七七事变以后，国民党反动派才停止对闽浙边根据地的进攻。我闽浙边临时省委与国民党四省边区主任刘建绪谈判达成了协议，至此，历时八个月的反“围剿”斗争宣告结束。坚持在闽浙边开展游击战的健儿们都集中在北港，经过整训后，由粟裕同志带领开赴皖南，编入新四军。从此以后，闽浙边根据地的党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浙南特委的领导之下，一直坚持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长期艰苦的斗争，直到全国解放。（中共泰顺县委党史研究室：《泰顺革命亲历记》，1995年内部编印。）

## 回忆粟裕同志

余龙贵

我是1934年开始在粟裕同志身边工作的，当时他担任红七军团的参谋长。1934年红七军团奉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中央军委命令，随军北上，从瑞金出发，取道闽东、闽北、浙西，向皖南进发。在当地党组织和游击队的密切配合下，红七军团突破敌人的层层防线，打了不少胜仗。到了闽浙赣苏区后，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团合并，组成了更强有力的北上抗日先遣队。

国民党反动派为了破坏先遣队的北上抗日，调集重兵分多路对我军尾追堵击。在浙赣边界的一次战斗中，粟裕同志的右臂负了伤。当时战斗频繁，医疗条件很差，粟裕同志的枪伤好久不能愈合。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以普通一兵的身份要求自己。行军路上，与战士们一起挖野菜、吃草根，忍着疼痛，指挥着部队行军作战。看到这种情况，我们大家都很难过。同志们坚持要用担架抬他，可粟裕同志坚决不同意。一路上，他还与大家谈笑风生，给我们讲许多革命道理，鼓励我们克服各种困难。

1935年新组建的红军挺进师，在师长粟裕、政委刘英的率领下，向浙江进发，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在当时艰难的环境下，部队给养十分困难，常常是三九严寒天还只能穿着单衣。粟裕同志由于缺乏较好的医治，过去右臂负过重伤并残废，一切事都得靠左手来做。在那动荡的岁月里，他作为一名红军的高级指挥员，工作非常紧张，即使部队行军停下休息时，仍不能休息。当时他



身边只用了一个警卫员和一个挑夫，遇上部队有紧急行动时，他还时常自己背干粮等物品，以减轻周围同志的负担。记得有一次夜行军，我们翻山越岭，走的是羊肠小路。天下着雨，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一不小心就会滚下山去。栗裕同志走着，走着，也滑倒在山沟里，幸亏下面没有大石头，才没受重伤。但他手、脚皮肤磨破了，腰也跌伤了，痛了好几天。当时，警卫员和我们下去把他扶起来，我们担心首长跌伤了，不能行走，他却安慰我们说：“不要紧，我可以自己走。咱们走吧！”这时大家才放心了。

1936年11月，我军与敌人在浙南泰顺峰文又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战斗中，我军主力部队为了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栗裕同志命令我带领第一大队担任阻击敌人的任务。我全队战士英勇顽强地守住阵地，打退了敌人的一次次进攻。在战斗中，我的手负了伤。当我们顺利地完成任务，冲出敌人的层层包围，与主力部队汇合时，栗裕同志高兴地说：“我们一直在为你们担心，现在你们都回来了，好，好！”他既高兴又心疼地看着我们，要我们赶快去吃饭，休息，并关切地询问了我的伤势。因我的伤势较重，栗裕同志要我留在后方养伤，但我坚决要求跟部队走，可他对我说：“你受了伤，行军打仗是很困难的。现在给你两个任务，一是留下安心把伤养好，二要协助当地党组织发动群众与敌人开展斗争。”部队要离开时，栗裕同志给我留下了一点钱，还给了我半支他一直舍不得吃的人参。当时，我想，首长工作这么忙，身体又不好，我怎么能收下呢？但栗裕同志还是硬把这半支人参塞在我手里，并再三嘱咐我要好好养伤，争取早日归队。我拿着人参，心情格外激动，深深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无比温暖。在养伤的日子里，我牢记着栗裕同志的嘱咐，在与当地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我被敌人围困在山上，饿了七天，靠着栗裕同志给我留下

的半根人参充饥，最后终于找到了党的地下交通员，回到了部队。

1939年春，我向粟裕同志提出要求，去军部教导团学习。经过几次要求后，粟裕同志终于同意了，他对我说：“现在前方部队战斗十分紧张，任务也很繁重，但根据你的多次要求，我们考虑下来，还是决定让你去学习。”临行前粟裕同志特意搞了几个菜，请我去吃饭。他语重心长地说，你要努力学习，提高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回来能为革命事业作出更多的贡献。还叮嘱我在学习期间要经常写信给他。当我出发离开部队时，粟裕同志还特地来送我，望着首长那慈祥的面容，我不禁热泪盈眶，深情地向他敬礼告别。

如今，我们敬爱的老首长粟裕同志不幸与世长辞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仍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一九八零年六月粟裕同志来杭州时，还在百忙中亲切地会见了我们几位参加过浙南三年游击战争的老同志，并与我们合影留念。粟裕同志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对同志无比关心的高尚品德，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摘录于《一代名将——回忆粟裕同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

## 回忆刘英同志在白柯湾的日子

吕作成

当时白柯湾村子不大，只有 20 来户人家，靠近平阳县，群山蜿蜒起伏，松竹郁郁葱葱，尽眼望去，苍山如海，地形相当险要。从 1935 年 11 月刘英率领红军挺进师来到泰顺山后、九峰等地建立革命根据地后，就看中了我们这个村子。不久，他带领一支队伍，开上白柯湾，住在村中央的卢老哥家里。

当时，刘英的生活很艰苦。他穿的是我们老百姓的旧棉袄；和战士们一样吃青菜杂粮，每天都坐在一张方板桌边办公到深夜。他不但能打一手好枪，还能写一手好字。当年他曾亲手在村子里的板壁上，写过许多大标语。老交通员卢志串家里的两块蒸得发黑的门板上，现在还能看得出刘英留下的字迹“反对国民党卖国政策，中国工农红军万岁”“抗租抗捐”。

当年临时省委的成立大会，就放在我家隔壁的小厅上开的。来自各地的 400 多位同志，人人都带着步枪和背包，坐在泥地上开了两天一夜的会议。那时还没有煤油灯，夜里开会就用一盏暗洞洞的猪油灯。为了保证这次会议开好，我们当地的赤卫队员，除了配合红军战士站岗放哨外，每天还要派十来个人上山砍柴，派三四个人专门出村去挑粮食。村子里的妇女们也都组织起来帮助部队烧饭、做菜，就像办喜事一样热闹。

就在这次大会上，刘英当选为临时省委书记，同时成立了（福）鼎平（阳）泰（顺）边区，提出了“抗日救国”“抗捐抗税”“二五

减租”等斗争口号。临时省委成立后，开了一次庆祝大会，红军战士们在南头的庙里演出了“打土豪”的文明戏。刘英也亲自来教我们赤卫队员唱红军歌。年青的时候，我也是喜欢凑热闹的人。现在我还记得有一支“工农兵四季歌”是这样唱的：

春季里，桃花满树红，  
工农兵起义在广东，  
三天夺得广州市，  
血染羊城旗帜红。

夏季里，莲花扑鼻香，  
我红军起义在南昌，  
阶级斗争初开始，  
红旗招展处处扬。

秋季里，菊花正萌芽，  
打倒地主资本家，  
劳苦人民亲团结，  
天下工农是一家。

冬季里，梅花雪里开，  
革命运动大开展，  
抗租抗税打土豪，  
人民成立苏维埃。

好戏还在后头呐。当时国民党泰顺县长何芸生听到我们成立

临时省委，就亲自带了两个连，急匆匆地赶了过来。那天傍晚，敌人开到离村 15 里的地方，我们就得到情报。刘英召开动员大会，说：“同志们，泰顺县的何县长亲自上山来给我们送礼，今天夜里大家睡个好觉，明天早晨四点钟起床，准备好武器，打它一个漂亮仗，还他一个见面礼。”其实不到四更天，红军部队就开出了白柯湾，埋伏在东北角的岭头上。

敌人也想给我们来个措手不及，昨夜又从西地赶了 10 里路，住进邻村——前坪仔。天蒙蒙亮，有一连尖兵就到了岭脚，敌人做梦也没有料到红军会在半路上迎接他们。等到敌人的队伍快要登上岭头时，只听“轰”的一声，一颗手榴弹在他们中间开了花，接着一阵激烈的枪声，打得敌人晕头转向，往灌木丛里乱钻。坐在前坪仔督战的国民党县长一听岭上杀声震天，知道大事不妙，立即带走身边的一个连，拔腿就逃了回去。这一仗打得真痛快，我们收缴 1 挺轻机枪、56 支步枪和大量子弹。从此，敌人不敢再上白柯湾来了。因为有了临时省委的统一领导，我们浙南的革命火焰，就像干柴碰上烈火，越烧越猛了。（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刘英纪念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2 年版。）



## 从反“清剿”到国共合作的转变

陈 辉

1937年2月中旬，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在泰顺东安的牛童往连续几天召开了紧急会议。针对峰文大战后敌人集中大量正规部队进攻浙南根据地的严重形势，为了避免被敌人包围，同时又能胜利地坚持这一场斗争，省委改变了原来把红军挺进师主力留在浙南狭小根据地里作战的做法，决定采取化整为零的方针，转到敌人的侧翼和后方，或敌人比较不注意的新地区打游击。

当时，我担任浙南人民革命委员会委员、共青团瑞平泰中心县委书记。峰文大战后，我跟随红军挺进师一部到平阳玉苍山活动了几天，又回到老根据地瑞平泰县泰平区。走了三四天，才到了天门下。这时临时省委会议已结束。粟裕同志带领红军挺进师主力向泰东南方向撤退。在敌人的追击下，仅活动很短时间，就向北通过敌独立第九旅和五十二师的数道封锁线，回到龙泉河以北浙西南地区。刘英同志带省委机关到敌人侧翼地区活动。地方工作干部也分散隐蔽活动。这样，就避开了敌人雄厚兵力的大举进攻，有利于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

三月中旬，我跟随刘英同志和省委机关到达山后，住了三天。为了向国民党官兵宣传抗日，促使其停止“剿共”，刘英同志亲自起草了“快邮代电”。油印组卢云山、郑香山、施崇道等同志连夜抄写了20多封快邮代电。然后，我通过施光曼同志把信送进驻峰文的国民党浙保部队的营房。

过了几天，刘英同志把整个反“清剿”计划部署停当，便率领省委机关部队的100来人撤出泰平区。从山后爬山经坳下银洞坑、石围坑到顺溪上面的瓜场东冲，我一直陪同刘英同志。在东冲，刘英同志住在小路旁一座房子里。深夜的时候，刘英同志让通讯员来叫我去。他说：“这次敌人进攻规模大，来势凶猛。我们以前是采取比较集中的活动。根据现在的形势，改为分散隐蔽活动。这次我们分开，时间可能会长一点，估计会有三四个月。你要回到泰平区去坚持工作。回去不要走大路，要走山路住山上。我们和粟裕同志到新区活动，主要是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以保存自己。”刘英同志问我身边是否还有钱，并将30块银元递到我手里，叫我节省用。他坚定地说：“你们在这里坚持几个月，我们会回来找你的。”第二天，天还未亮，刘英同志就带着部队走了。部队刚开走，敌人就从小路追到东冲。

我从瓜场东冲回泰平区时，没有走小路，都是爬山。走了一天，到了黄土岭，路上遇见李正玉。李不小心踩着竹尖，脚板受伤。因为这一带村庄都住满了敌兵，我和李正玉就在黄土岭的山上住了两个晚上。当时的形势不允许我们在泰平区公开活动，我们就买了一些盐，借来一只破锅子，搞到一点米和蕃薯丝干，住到山后和峰文之间莒岗湾的密林之中，进行新的斗争。

这时，横坑、西地、九峰、湾头、峰文、岙下、天井、东安、五里牌、彭溪、莒溪等村庄都住满了敌兵。敌人实行了移民并村、联甲制、连坐法、强迫群众自新等反动措施，烧杀抢掠无所不用其极。在这样的环境中，革命队伍中的一些人经不起磨炼，变节投降。临时省委撤出泰平区没几天，区委书记陈鸣皋就投敌叛变了。红军山洞医院的伤病员庄定效投敌叛变，带敌军来包围山洞医院。在洞中护理红军伤病员的当地群众陈成赞当场牺牲，红军

伤病员被捕两个。幸好余龙贵等同志安全脱险。

这时，敌人强迫壮丁队和联甲兵配合，大肆搜山，但群众仍冒着生命危险给我们送粮。莒岗湾龙潭郑子球同志就因为给我们送粮，被敌人抓去打得死去活来，最后又被残酷杀害。子球同志牺牲后，我们越过峰文，隐蔽到双溪口。先找到黄明星同志了解情况。随后又碰到了红军伤病员余龙贵、周福生、朱忠成等人以及从青景丽撤退出来的陈昌会。我与陈昌会商量，红军伤病员在双溪口、隔后这个地方隐蔽，我们就移往青皮坳、板寮岗一片隐蔽。随后，我、李正玉和陈昌会等人转移到峰文山边来。

峰文虽然是个反动据点，但双溪口、青皮坳这一片党的群众基础较好，支持革命斗争的群众较多。这对于我们坚持斗争是个有利条件。但我们这时最困难的是身边没有钱。刘英同志原来给我们的几十块银元早就用光了。我们只能靠青皮坳、板寮岗、双溪口、小南山的群众偷偷弄一点粮食来维持半饥半饱的生活。有一天晚上，我们在板寮岗山上，不巧被从彭溪来的几个砍柴人看见。当天晚上，我们转移到青皮坳村的山林里。次日天未亮，想到村里老百姓家去搞点东西吃，再转移到山上去。但我们刚进到青皮坳的房子里，敌人就分几路包围上来。我们立即撤退到后山。敌人发现了我们，马上开枪。陈朝近同志当场中弹牺牲，陈延算同志负伤。还好下着大雨，山上雾浓，我们多数同志乘机冲出敌人的包围圈。

进入大树林中，淋了一天雨，当晚转移到古洞坑、十八丘。这里的群众还未回村，我们就在十八丘后背山住了一天。两天来没有一粒饭下肚，饿得难受。天黑时，转到灵家山村，走进一户人家。这家人正在吃饭，看到我们七八个人进去，吃了一惊，紧张地站起来。我见他们惊慌，忙解释说：“我们是红军同志，受

敌人追击，已两天没有吃过饭。”他们很客气，连忙让坐，并将锅里的饭先让给我们吃。饭后，我告诉他们，现在红军已去新区活动，不久肯定会回来的。随后，我们动身离开灵家山，一夜就摸到大长坑、半岗。半岗有座单独的房子，灯亮着，我们知道这里的群众回来了。推门进去，住户包建洪没有丝毫害怕的样子，很热情。当我们向他说明来意后，他满口答应，马上为我们做饭。饭后，又安排我们分散到瓦窑洞里住。过了几天，我们又主动搬到坑底村的山洞里住。住了半个月，都无人知晓。

一直到六月份，我们都在这些崇山峻岭之中辗转不停的活动。隐蔽在鼎泰区和福鼎县城附近的中共瑞平泰中心县委书记郑丹甫同志派温德奎、陈德胜前来找我们，并送来了一些钱，见到他们，接上了组织关系，我们非常高兴。当他们走后，我们陆续送了几个同志到郑丹甫同志那里去。

在这异常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敌人不断地扫荡、搜山，还捏造刘英和郑丹甫等同志“投降了”等等谎言来动摇我们。但绝大部分同志都没有被敌人的淫威所吓倒，敌人的欺骗宣传更不能动摇我们的信心。当然也有个别败类向敌人自首叛变。但螳臂挡车谈何容易，个别叛变分子当然无法阻止革命事业的发展。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中国掀起抗战救亡的热潮。“围剿”浙南游击根据地的国民党正规军陆续退走，在泰平区只留下一些保安队。我们抓住这一时机，到大乡村去恢复工作，向群众宣传共产党是消灭不了的，是一定能够胜利的，红军肯定会回来的。一天晚上，我们到路口岭下的施公范家。施公范看到我们很高兴，拿出老酒、粉条招待。我告诉他准备去湾头恢复工作。他说：“湾头暂时还不能去，那里有个叫子强的很坏，壮丁队也经常来抓人。”听了他的劝告，我们未去湾头。过了两个星期，9月中旬，刘英

派一个交通员送信给我们。这位交通员经过湾头，被壮丁队抓去，送往泗溪区署。后经多方交涉，这位交通员才被释放出来。过了几天，张文碧同志带着20多人，1挺机枪，扛着旗子经过湾头时，壮丁队就不敢动了。这时，我们在古洞坑，听说部队回来，都赶到路上去迎接。张文碧同志告诉我们，浙江国共合作谈判已成功，红军挺进师改为“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并通知我们到平阳山门集中。接着，我派人送信到福鼎，找到郑丹甫同志。丹甫同志接到通知后，先到了山门。我是同张文碧同志一道走的。林辉山迟一两天来。他带着几个伤病员和几支步枪，经过峰文时，被壮丁队扣住枪支。这时，刘英刚从山门过来，在莒溪吃饭。当他知道林辉山等人的枪支被扣，非常气愤，立即向驻在峰文的壮丁队去信，迫使他们将枪支如数送回来。

在平阳山门集中期间，我和浙闽边的一些干部参加了临时省委举办的区以上干部培训班。主要学习了中共中央于1935年8月1日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和中央的一些重要文件。在学习过程中我了解到党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已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打土豪分田地和“八抗”的方针，改为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在山门学习了10多天。学习结束后，省委让学员回老区抓两件大事。一是扩大训练部队；二是恢复开辟新地区和宣传抗日，做好统一战线工作。

9月底，我和几位干部从平阳山门返回泰平区等地恢复工作。回来时，省委以“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司令部”的名义发给我们一个护照，即身份证。上面印有司令粟裕、政委刘英的名字。带着这个护照，在浙江各地万一遇上国民党军警找麻烦，也可以应付。这使我们有了一定的合法地位，可以公开半公开地开展工作，为恢复开辟党的基本地区创造了新的良好条件。



此后，我主要在泰平区、泰东北区来回活动，李正玉在泰平区，刘宝生在泰东南。工作的重点是进行宣传和恢复党组织。主要开展了这么几项工作：一是弄清情况。在国民党八个月大“清剿”中，好些地方党组织被破坏。泰平区我们在坚持，谁表现好坏我们都知道。而有些地方没有脱产干部坚持，就需要进行调查，了解什么人已自首，自首的有没有叛变。对没有叛变的革命群众要恢复其工作关系，对坚持斗争的好党员要恢复其组织关系。二是宣传为什么要停止打土豪分田地。三是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对保甲长、乡长、地方士绅、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就宣传团结抗战的意义。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充分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时机，公开地自由出入于各个大小村庄甚至国民党派兵把守的据点。有时被国民党军警碰见责问，就说是去通知掉队的红军战士上前线抗日。这样工作了两三个月，再去山门过春节。

春节过后，杨雅欣带领六七个同志到翁山、横坑、五十五、东湾坑、百丈镇等地开展工作。到达百丈口时，百丈镇长比较热情，还叫我们的同志吃饭。但百丈警察所却把杨雅欣等同志叫去查问。杨雅欣同志说自己是抗日部队的，并拿出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的护照，说是来找掉队红军回去抗日的，警察所这才作罢。也就是在这时候，泗溪乡长林蔚松经郑丹甫同志教育和我们反复宣传后，开始转变反动立场，向共产党靠拢。林蔚松对我们说：“你们如遇到国民党军警，就说是我的朋友。”这样，我们的同志在泗溪一带的活动就更方便了。同时，在这一带开始建立党支部的工作。

这时，中共泰顺县委恢复了，杨雅欣提升为县委书记。县委下辖泰平、泰东北、泰东南三个区，统一领导泰顺境内的党组织。李正玉任泰平区委书记，我任泰东北区委书记，刘宝生任泰东南

区委书记。原中共瑞平泰中心县泰平区委划归泰顺县委领导，原中共瑞平泰中心县鼎泰区委划归中共福鼎县委领导后，瑞平泰县也随之不存在了。（中共泰顺县委党史研究室：《泰顺革命亲历记》，1995年内部编印。）



# 传承篇





## 向老一辈革命家学习

——浅谈参加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 80 周年纪念活动的感受

陈法文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刘英、粟裕、叶飞同志领导的工农红军在浙西南、浙南、闽东北地区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1935 年 11 月 7 日，他们在泰顺县白柯湾小宫庙宣布成立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以下简称临时省委），刘英任书记、粟裕任组织部长、叶飞任宣传部长兼少共临时省委书记。下辖浙西南特委、闽东特委等。同时成立了闽浙边临时省军区，粟裕任司令员、刘英兼政委。80 年后的同一天，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和温州市委在泰顺县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我受主办单位的邀请参加了这次纪念活动，实地参观了工农红军挺进师纪念馆、临时省委成立旧址小宫庙和刘英、粟裕同志的办公旧址。这些史料和文物，引起我一系列的联想。广大革命先烈和刘英等老一辈革命家用鲜血铸就的爱国情怀、民族气节、英雄气概、必胜信念，给我极大的启示和深刻的教育。

我首先想到的是刘英、粟裕、叶飞等老一辈共产党员和工农红军走过的那种波澜壮阔、枪林弹雨的革命斗争经历。我的思绪回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从 1933 年下半年开始，蒋介石调集 100 万军队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挥，造成了工农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斗的节节失利。为牵制敌人对中央苏区的进攻，中共中央于 1934 年 6 月决定将红七军团编为中央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转战闽浙



皖赣四省边境。到1935年1月，这支部队在江西怀玉山遭敌围击，大部分指战员包括领导人方志敏同志英勇牺牲。此后由粟裕、刘英率领的红军挺进师就是继承北上抗日先遣队的遗志，以先遣队的先行部队和突围部队为基础而组成的。挺进师成立于1935年2月，名义上是一个师，实际上只有538名指战员。挺进师进入闽浙边境后，面对强大的敌人，先是国民党军队的将领卫立煌、罗卓英任“清剿”总指挥部正副指挥，拥有七八万兵力的“清剿”；后又经历了由刘建绪任“绥靖”主任，拥有10余万兵力历经八个月的“清剿”。挺进师在反“清剿”的斗争中，屡遭敌人的围追堵截，他们经过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战斗，终于克敌制胜，使自己在浙南立足生根，创建了一块游击根据地。如果后人要问，是什么力量能使他们经受这种血与火、生与死的严峻考验呢？我想只有从他们坚定的理想信念中去找这个答案。因为当年的中国积贫积弱，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许多革命前辈出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寄希望于共产主义的美好前途，所以才能前仆后继，顽强斗争，使革命的理想、战斗的意志像一支不息的火炬，从一个人的手中传到另一个人手中。今天，我们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中，以习近平总书记的党中央反复强调广大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增强党性，坚定理想信念，勇于承担历史使命，坚持艰苦奋斗，开拓前进。老一辈革命家的光辉实践，就是我们学习的最好榜样。

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的历史背景又是我引起思考的一个问题。我重温了红军挺进师在浙南进行三年游击战争的历史，其中有这样一段叙述。1935年10月5日，刘英、粟裕率领的挺进师转战至福建省寿宁县郑家坑村，与闽东特委书记叶飞率领的闽东独立师会师，双方领导人开了一次联席会议。大家一致认为，国

民党已经组建了“闽赣浙皖边区清剿总指挥部”，统一指挥中央军和四省地方军队“清剿”边区的红军游击队，而浙闽边区的红军游击队自从与中共中央和中央分局中断联系后，失去上级领导，相互隔绝，致使坚持在浙南、浙西南、闽东、闽北斗争的游击队各自为战，这对反“清剿”斗争十分不利。因此，他们提议成立闽浙边临时省委，统一领导上述地区的革命斗争。这无疑是一个正确的判断和决策。临时省委成立后的实践证明，对于加强闽浙边党的领导，加强闽东游击区与浙南游击区之间的联系和配合，推动游击战争的开展，抵制国民党军队对闽浙边地区的“清剿”，为挺进师较快地立足于闽浙边，都创造了有利条件。此后，闽东特委还将有相当工作基础的福鼎、鼎平地区划归临时省委直接领导。这为临时省委和挺进师开辟了浙南游击根据地创造了条件。抚今追昔，我们体会到老一辈革命家善于从实际出发、果断决策的魄力和能力，这为我们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具有深刻的启示。

临时省委成立以后，将工作方针确定为进一步实行武装斗争，并与做好群众工作紧密相结合。同时将临时省委机关与挺进师主力分开活动。这样做的结果是进一步打开了革命斗争的局面。到1936年底，党的组织建设显著加强，党员发展到3000多名，县委一级组织由3个增加到6个，参加地下工作的人员达500多人，参加各种群众组织的人数扩大到10万多人。总的说，从1936年春夏到11月的半年时间，是挺进师进入浙江以来，斗争环境最好、发展最顺利的时期。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临时省委和红军挺进师在斗争实践中培养了像龙跃、郑丹甫等多名领导干部和一批骨干分子，锻炼和储备了一支战斗队伍，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浙南游击部队的发展和壮大，播下了火种，奠定了基础，

使浙南这块革命根据地成为我国南方革命的一个重要战略支点和新四军的发源地之一。临时省委和挺进师的历史功绩，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世代传承。

老一辈革命家与时俱进的远见卓识也是供我们终身学习的精神财富。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发动七七事变，中国出现了全面抗战的局面。在七七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临时省委就发出通电和宣言，敦促国民党当局在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必须无条件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时，顺应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社会矛盾的形势变化，及时调整斗争策略和党的具体政策。把红军挺进师改为人民抗日红军挺进师，把赤卫队改为抗日义勇军，把苏维埃政府统一改称为人民革命委员会。为了扩大团结对象，改变了过去打土豪的办法，把没收地主豪绅财产改为征收“抗日捐”；对国民党的乡、镇长由惩治改为尽可能的争取；把“穷人不打穷人”的口号改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还重视团结争取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让城镇的客商进山做买卖，促进山区经济发展，改善群众生活。这些政策措施，有效地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有利于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和扩大。这也说明我党的老一辈革命家，具有高度的大局观念，敏锐的政治敏感性，与时俱进的远见卓识。这些对于我们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刘英之子刘锡荣同志在纪念大会上的发言，更使我想起了刘英同志在1942年壮烈牺牲的情景。我心里很沉重，充满了崇敬之情。当年，刘英同志那种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崇高形像浮现在我的眼前。高山仰止，精神永存。刘英同志是我们终身学习的楷模。

## 深深怀念我的父亲阮英平

阮朝阳

我的父亲阮英平，生于1913年9月，是福建福安顶头村（今英平村）人。1947年4月，受中央派遣回敌占区迎接解放时，我才一个月；1948年2月3日，父亲罹难时，我刚满一岁。在我的人生历程中，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留给我什么样的精神血脉，我应该做什么样的人，怎样做这样的人，一直是我思考并践行的重大人生命题。我虽然从小失父，但我觉得他老人家从未远去，一直在默默注视着我、激励着我、伴随着我前行：困难时给予我力量，迷惘时给予我方向，成功时给予我清醒。父亲没有留下几张照片，但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通过母亲的讲述和他战友的回忆，不断地丰富起来，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愈发清晰，愈发高大。

### （一）

父亲自1930年参加革命，1932年3月入党，到1948年牺牲，这近二十年里，正是我国积贫积弱、强敌入侵的二十年，也是我党从弱到强、从小到大的二十年。在这期间从事革命工作、执著党的事业，如履薄冰、步步惊心，时刻面对着生与死的考验，但父亲凭借对党的坚定信仰，始终毫不动摇理想信念，始终忠诚于党的事业。

父亲幼年丧父、家境贫寒，艰难的生活、繁重的劳作使他认

识和感受到社会的黑暗与不公，也促使他养成了仗义执言、敢作敢为、打抱不平的品质与性格。1932年3月，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十多年时间里，父亲先后在邓子恢、陶铸、叶飞、曾志、詹如柏、马立峰、叶秀潘、刘少奇、徐海东、粟裕等人的领导下，在不断推进“三抗”（即抗租、抗捐、抗粮）农民运动、组织发动甘棠等地农民暴动、创建红军独立师、开辟建立闽东红色根据地、独立坚持三年游击战争、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转战苏浙、进军山东、重返福建开展敌后战场中，经受住大风大浪的考验，经历了血雨腥风的洗礼。但不管环境有多么艰难险恶，他都能坚守目标追求，坚定理想信念。

面对威胁，毫不动摇。1931年，地主恶霸、反动民团头子黄清河，得知父亲是当地共产党主要分子，就把身小力薄的奶奶抓去，进行恐吓威胁，逼迫二姑父将父亲找回去。父亲却对二姑父说：“咱们穷人除了闹革命，没有别的出路，我是铁了心跟共产党走了！”

面对困难，坚定不移。1934年，由于福州中心市委遭到破坏、主要领导叛变和国民党对红色根据地大举“清剿”，闽东革命斗争形势到了最危急最困难的时期，父亲所在的安德苏区又是闽东白色恐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面对敌人的疯狂“清剿”和血腥屠杀，队伍中一些经不起考验的人不辞而去，甚至投敌叛变，但父亲继续带领部队在安德边境打游击，在山寮、山洞中度过日日夜夜、闯过千险万难。

面对困惑，拨云见日。1946年春，随着抗战胜利和停战的实现，部队内部的思想状况发生了变化，部分同志对当时尖锐复杂的斗争形势认识不清，对革命的长期性、艰苦性认识不足，针对这一情况，时任新四军一纵第一旅政委的父亲，组织全旅官兵围绕“和



平是从哪里来的”“军队国家化”等问题展开深入讨论，使大家清醒认识到国民党反动派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进一步认清了形势，提高了认识，坚定了信仰。

父亲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在追寻真理的漫漫征途中，在追求人民翻身做主的奋斗上，不怕苦难，不怕牺牲。父亲这种忠诚理想、坚守追求的精神，引领我从小便确立起坚定的革命信念，给了我战胜各种困难的无穷的勇气和力量。

## （二）

父亲作为一名从基层成长起来的指挥员，不仅能够勇于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更善于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使自己逐步成长为闽东红军和新四军、山东野战军中一位令敌人闻风丧胆、英勇善战的名将。父亲的老战友、福建省军区原副司令员陈挺叔叔回忆道：“英平没受过正规军事训练，体质也不太好，但打起仗来，他决心下的快，并且常常带头打冲锋。……他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和忘我牺牲精神，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

身先士卒，一马当先。在甘棠暴动中，父亲在突击队当先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袭击了敌哨兵，为暴动队伍打开行动通道，为这次暴动立了头功。在第二次反击国民党海军陆战队多次疯狂报复作战中，父亲率红带会队伍冲出敌军包围后，又迅即率部杀了一个回马枪，不仅解除了被包围在刘家祠堂的第一支队危急，还对撤逃出甘棠镇的敌军进行了坚决的打击，为夺取这次反击战的胜利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经验丰富，扬名南北。在坚持苏中抗日根据地和开辟苏浙皖边区的斗争中，父亲先后组织指挥部队参加了苏中区的多次反“扫

荡”斗争和攻取苏皖浙边区的孝奉、天目山、宜兴城等重要战斗。1945年，时任苏中军区司令员的粟裕来到父亲和陶勇所率领的第三纵队，特别向与会的各级干部介绍了父亲：“你们三纵队的阮政委，是闽东苏区和红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在闽东苏区率领红军坚持武装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山地作战经验，你们在今后指挥部队进行山地作战中，要注意向你们阮政委请教学习。”在转战山东鲁南与鲁中地区期间，父亲先后参加了攻打兖州、泰安和鲁南、宿北等重要战役、战斗及胶济路西段的对敌斗争，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粉碎国民党军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进行了英勇不懈的奋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游击制胜，威震闽东。1947年，父亲根据中央指示，为迎接我人民解放军南下，开辟敌后战场，回到福建开展游击战争。他以闽东老区为立足点，以长期坚持这一地区斗争的游击队为基础，广泛发动群众，大力扩充武装，不断向敌人展开进攻，先后组织了七都、霍童坂头堂、虎贝、洋中、赤溪、莒溪、贝龙楼等一系列战斗，大挫敌人嚣张气焰，震惊闽东与国民党福建当局。

父亲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实现了从农民到我军高级将领的转变，源于他对理想信念的执著追求，源于他为党的事业舍生忘死的崇高品质，源于他为国杀敌、习武报国的责任意识。父亲这种英勇无畏的精神，影响了我的一生。

### (三)

父亲自幼就爱学习，但由于家境贫寒，只读过两年私塾。为适应革命需要，不管条件多么艰苦、环境多么恶劣，他都不放过一切可利用的学习机会，刻苦勤奋，坚持不懈。曾任父亲警卫员

的陈文发在回忆录中写道：“闽东三年游击战争中斗争环境极为艰难险恶，长期过着食无定时、宿无定所的生活，但是阮英平首长却抓紧时间学习文化，学习党的政策。……他就是这样一直孜孜以求，不耻下问地刻苦学习。”

虚心请教，刻苦学习。在独立坚持闽东三年游击战中，父亲为改变他在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不足，只要有空余时间他就向叶飞请教，学习文化和党的方针政策与理论。在这期间，虽然没有可供他学习练字的纸和笔，他就用树枝作笔，大地当纸来练习写字。

珍惜机会，系统学习。父亲在闽东红军被编为新四军三支队第六团北上皖南抗日前线后，被派往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父亲十分珍惜这难得的学习机会，克服了露天上课、没有桌椅、物质匮乏等困难，不管是上课还是听中央领导作报告，不仅专心听讲，还认真做好笔记，两三个月下来，他就做了几本厚厚的笔记。在与同学共同学习讨论和课余的交谈中，他都很注意倾听他们参加革命的经历、对敌斗争的经验和讨论对某些问题的认识理解，让他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令父亲最难忘怀的是他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期间，在向毛主席汇报了闽东的土地革命和独立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情况后，主席鼓励他：“要好好学习，过去打游击没机会学习，现在有学习机会了，要珍惜，多懂些革命道理，回去好工作。”

以学促用，智慧过人。长期坚持学习，使父亲视野越来越开阔，斗争经验越来越丰富，谋略水平也越来越高。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的重要历史转折关头，一直未与上级取得联系的闽东党组织，在以父亲为主要成员的闽东特委领导下，通过各种方式与渠道搜集有关报刊了解时局的发展变化，从中分

析党的政策重大变化，即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不仅根据斗争形势的转变及时向国民党福建省当局提出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要求，还以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在谈判斗争中坚决粉碎了国民党福建当局企图借国共合作，对红军部队整编之际一口吞并的阴谋。

父亲为了适应事业需要，长期在艰苦环境中坚持学习，并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能力。他的这种精神多年来一直教育和影响着我。

#### (四)

父亲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在工作生活中，他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和疾苦、战士的冷暖与健康放在心上，关心、爱护、体贴同他一起工作的战友、同事、部下。他的一位战友深情回忆道：“英平不仅因为打仗勇猛在红军战士中享有威望，还因为他关心下属，平易近人而受到同志们的敬重，他手下的人都喜欢跟他在一起”。

大局为重，维护团结。1935年1月，闽东特委在福安东区洋面山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如何应对国民党反动集团的大规模“清剿”。会议发生了激烈争论，形成了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相持不下。在这关键时刻，父亲联系自身经历，为时任闽东特委领导人、闽东红军独立师政委的叶飞叔叔统一与会人员的思想认识发表了积极的意见，不仅为这次会议的正确决策作出了贡献，同时也促进了地方同志和独立师的团结。

艰难困苦，不忘遗孤。1935年，闽东苏区被国民党占领后，实行了“白色恐怖”统治，部队生存十分艰难。这年冬天，天寒地冻，时任安德地区负责人的父亲带领部队在安德边境打游击，

连续两昼夜没有粒米落肚，官兵们只凭单衣蔽体，冻得手足皲裂，鲜血真流，行走都十分困难。在这种困难情况下，父亲还不忘交代部下要好好照顾詹如柏烈士唯一弟弟舜书和马立峰烈士的妹妹菊英，他说：“马、詹只留下他们两个命根子了！”当有战士劝他休息一会时，他却说：“五十多个战士和两个烈属，叫我怎么睡得下？”感动得全体战士热泪盈眶。

不顾劳累，惠及战友。1939年，父亲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党校经费十分紧张，物质非常匮乏。为了丰富师生的饮食，他不顾学习劳累，利用课余时间带领党校的几名工作人员，办起了制作糕点的作坊，结合延安当地各种土杂粮的特点，改进工艺，制出了桃酥、炒糖、饼干等多种点心，被学员们称为“糕点专家”。据说，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吃到后都交口称赞。

长期的革命实践中，父亲做党的群众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成为一名密切联系群众、用心关爱同志的好干部、好领导。他在无私地关心、帮助着别人的同时，也得到了同志、战友的爱护、支持和帮助。

## (五)

父亲不仅是一位具有高度党性原则的领导人，也是一位很重亲情的好丈夫、好爸爸。我的母亲曾饱含热泪说道：“我们结婚后聚少离多，他到处打仗，每到一个地方，有了空隙就给我写信。这些信，不仅记录着他为党为人民打江山，抛头颅洒热血的战斗足迹，也记录着我们在血与火岁月中凝成的患难与共的爱情。……尽管那些信在几十年前奉命忍痛烧掉，但他对我的至爱与勉励，令我终生难忘，不尽思念。”



战地相爱，关心体贴。1943年是抗日战争还处于最艰难困苦的时期，父亲和母亲相识于苏中根据地，在战争洗礼中相知、相爱最终走到了一起。婚后虽然离多聚少，但父亲对母亲非常关心、疼爱 and 体贴。抗战后期，父亲积劳成疾，组织上决定要母亲来护理他，尽管父亲的病情已经十分危重，但仍忘不了想方设法减轻母亲的负担。父亲在奔赴福建敌后战场前夕，专门给他的老战友，时任十二纵政治部主任、南京军区原副政委孙克骥叔叔写了封信，信中写道：“吾奉命调回福建，即日成行，唯以妻儿为念，此去万一牺牲，请帮助照顾妻儿。”

爱女亲子，父爱无限。姐姐出生后，父亲正率部转战南北，战事极其频繁紧张，但他总是趁行军作战的间隙给母亲写信，问寒问暖，了解姐姐的成长情况，鼓励母亲独立克服生活中的困难。我出生时，他正在前线指挥部队作战，为了不使他分心，母亲并没有写信告诉他。直到满月时，适逢他奉中央之命回福建开展敌后工作，从前线回到沂蒙山区的沂水县看望母亲，才知道我已出生快一个月了。他闻讯后立即进屋把正熟睡的我轻轻抱起，搂在怀中，不停地说：“我有儿子了！我有儿子了！”在临行前的那段时间里，父亲对我们姐弟俩总是亲不够，每天深夜工作完回到家里，总是端着蜡烛看看已在熟睡中的我们姐弟俩，摸一摸我们屁股下是否尿湿了，生怕我们受什么委屈。在奔赴福建战场前一天晚上，他把我和姐姐抱在怀里，看了又看，亲了又亲，轻声对我们说：“等革命胜利了，我派人来接你们，要听妈妈的话。”接着又叮嘱母亲道：“你要坚强地工作、生活下去，不管今后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要把我们的两个孩子抚养成人。”

## (六)

父亲驰骋疆场，出生入死，南征北战，戎马一生，虽未壮烈牺牲在战场上，但他的英名却永远与日月同辉，与山河同在。他在亲人心目中，大爱无私，待他人胜过自己；他在战友心目中，英勇果敢机智，富有感人的亲和力，是引导大家在艰难险恶中夺取斗争胜利的一面旗帜；他在跟随共产党为人民打天下走过的山山水水中，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令敌胆寒的传奇，留下了他奋进不息的闪光足迹！因此，他的精神、作风与品质，令人难以忘怀，心头永记。

战友情深，荫佑后人。1948年2月，时任闽浙赣省委常委兼军事部长、闽东特委书记的父亲在宁德狮峰坪被歹徒杀害，不幸牺牲。他牺牲后，组织和战友们没有忘记他。当他的老战友、老上级叶飞叔叔率十兵团解放福建后，在百废待兴、日理万机之中，专门命令公安部门查实父亲被害一案，并对罪犯进行了严惩。六十年代初，叶飞叔叔将我接到他家，关爱备至，视如己出。父亲的众多老战友、老同事、老部下，除关心母亲生活和我们姐弟俩成长之外，还没忘记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回忆和怀念父亲。陈挺、孙克骥、左丰美、黄垂邦、黄垂明、陈文发、黄烽等父亲的老战友、老部下，先后撰写了很多回忆纪念父亲的文章与诗词。这些文章和诗词的字里行间，充满着他们多年在血与火战斗岁月中凝成的出生入死、患难与共的战友情谊，读起来令人思绪万千、柔肠寸断，教人景仰、催人奋进。

历经风雨，告慰亡夫。父亲牺牲后，母亲牢记父亲临别时的叮嘱，兢兢业业地工作，悉心毕力地抚养教育一双儿女，并以其坚忍不拔的意志，利用工作之余，对父亲生前事迹资料进行搜集

整理，从有关博物馆、档案馆和报刊、书籍中认真抄录了大量关于父亲的史料，仅抄录成册的就有近40万字。几十年来，每年清明节，母亲都要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默悼，以表她对为革命牺牲的千百万先烈的崇敬和对父亲深切的悼念。

勤奋努力，不负遗志。父亲去世时，我刚满一岁。我懂事后，母亲便含泪讲了我的身世，并要求我一定要继承父亲的遗志，努力学习，成为建设新中国的有用之才。从那时起，我就决心将巨大的悲痛和对父亲的不尽思念，化为发奋学习、努力工作的强大动力，用实际行动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六十多年来，我时刻不忘自己是烈士的儿子，父亲的音容笑貌总是浮现在我的眼前，父亲的英勇事迹总在启发、教育、鼓舞和激励着我努力继承他的遗志，踏实工作，奋发有为，用自己有限的智慧和力量，投身我国国防科技和我军装备建设中去。现在，我已经居家安享晚年，能够静下心来，认真研究和梳理父亲的事迹，编写的近30万字的《阮英平传》于2008年付梓，将父亲的光辉事迹再现给世人。

高山仰止，世人楷模。父亲是福建人，在近二十年的革命生涯，大部分时间征战在福建，最终为了福建人民的解放事业牺牲在福建大地上。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闽东地区是块红色的土地。”这片红色土地上的人们永远忘不了父亲这位闽东人民的优秀儿子，自从父亲的遗骨迁入坐落在福安的闽东革命烈士陵园纪念堂后，每年的清明节，驻福安的机关干部、部队官兵、工人农民、学校师生都会前来祭奠英灵；解放初期，家乡的父老乡亲便将顶头村命名为“英平村”；1980年，家乡村民又在生活还不宽裕的情况下集资修建了“英平楼”永久性纪念建筑；在父亲牺牲40周年之际，福安县委、县政府隆重举行纪念活动；2006年，闽东革命烈士陵园又安放了父亲的铜像。

光阴荏苒，岁月流逝。回首自己的成长道路，总结父亲对我的巨大影响，心中倍加充满了对他老人家无限的崇敬和追思。最难忘怀的是父亲始终牢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不畏艰难，忠诚事业，一往直前，百折不屈；始终牢记自己是一名战士，热爱祖国，服从命令，英勇善战，坚毅顽强；始终牢记自己是一名革命者，刻苦学习，努力钻研，光明磊落，不计得失；始终牢记自己是群众一分子，团结协作，肝胆相照，爱护战友，关心遗孤；始终牢记自己是一个丈夫和父亲，热爱家庭，热爱生活，以身作则，教育后代。这就是父亲的精神，将由我们这一代和我们的后代来继承和发扬光大！这就是父亲的生命，在这闪光的精神下延续！我们就是他精神的继承人，我们就是他生命的延续！

## 栗裕泰顺行的前后回忆

——兼记参加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 80 周年纪念活动

鞠 开

2015 年 11 月 7 日，是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 80 周年的日子。经中共浙江省委同意，决定举办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 80 周年纪念活动。纪念活动由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温州市委主办，中共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泰顺县委承办。我有幸受邀参加这次盛会，感到非常荣幸。

泰顺紧邻福建，是浙江南部的一个边陲小县。这里山高林密，地形复杂，易守难攻，是红军打游击最理想的地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栗裕同志率挺进师在这一带打过游击，创建了以泰顺为中心的红色革命根据地。他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与数十倍于我之敌进行极其艰难困苦的斗争，多次粉碎了敌人“围剿”，同泰顺人民结下了深情厚谊。1938 年 3 月，栗裕奉命率挺进师主力离开浙南，前往安徽歙县岩寺集中，改编为新四军。栗裕人走了，心没有走，泰顺的人民、泰顺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仍在他的心中。

### 怀念泰顺

光阴似箭，斗转星移，栗裕离开泰顺 23 个春秋了。在这漫长岁月里，他是多么想回泰顺这个老革命根据地看一看啊！可是总抽不出时间。



1961年冬天，粟裕因身体不好，经中央军委批准，在上海养病。与其说是养病，还不如说是在工作。他除了看病治疗外，不是下部队，就是到工厂、农村、学校进行调查研究。目的是为了写一些有份量的报告，供中央参考，使政策制定得更加切合实际。

大家劝他好好休息，他说：“病要治，工作不能不干啊！”不仅如此，他还准备南行一趟，最后目的地是泰顺。粟裕认为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再不去，又不知要拖到何年何月了。要是会不到老红军战士刘宝生、红军山洞医院创建人黄明星等同志，要是了解不到峰文战斗中负伤的几十个伤病员的情况，那将成为他终身的遗憾。

医生担心他身体吃不消，建议他不要去。他说，不要紧，自己会注意的。再说，又不是一下子到达目的地，沿途还要到几个地方看看，走走停停，也就争取到休息时间了。见他决心已下，医生只好尊重他的意见，立即作出发前的准备。

### 视察舟山

1961年11月6日，粟裕从上海出发，开始了泰顺之行。9日，到达宁波。次日又从宁波出发，由省军区副司令阮贤榜、舟山基地政委阙中一同志陪同，乘昆明舰到达舟山定海沈家门。

舟山是华东的门户，海防前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粟裕对这一战略要地非常重视，他早就说过要到舟山看看。一到舟山，他马不停蹄地对定海、岱山、普陀三岛的陆海军部队训练、兵力部署、工事构筑、火力配备、政治思想工作、行政管理、文化娱乐生活、仓库、码头、哨所、炊事房、厕所等，一一进行了视察。

临走时，同岛上的领导同志进行了座谈，对驻守海岛部队表

示慰问，就舟山群岛的战略地位和作用，给部队工作提出意见：

1. 要充分认识舟山战略地位的重要性。粟裕认为，定海是舟山的心脏、主阵地，整个舟山又是华东的天然屏障，陆军、海军加上地方三家要携起手来，共同搞好军民联防，很有必要。保卫好它，就是保卫了整个华东。因此，从长远观点看问题，重视它、加强它、建设它，都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要把它建成钢铁长城，叫敌人有来无去。

2. 要保护好舟山的渔场资源。舟山是我国最大的渔场之一，渔业资源十分丰富，每年可帮助国家解决相当一部分人的吃鱼问题。但要合理捕捞，不要乱捕乱捞，把鱼子鱼孙都捞起来，渔业资源枯竭，吃鱼就成问题了。在保护好渔业资源的同时，要保护好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因为海里经常风大浪大出事儿，要及时抢救。

3. 普陀是旅游胜地，来往游客很多，可以为国家创造很多财富，这是件好事。但香火兴旺说明信神的人多了，部队住在这个环境里，不能没有影响，要加强部队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教育，防止唯心论对部队的侵蚀。

粟裕带病到岛上看望大家，使干部战士很受感动，影响很大，反映很好。大家纷纷表示：“一定把好这个东大门，让党中央、毛主席放心。”

### 途经温州

11月18日，粟裕到达温州。在去温州的路上，谈起了他在瑞安、平阳、泰顺一带打游击时的一些情形。粟裕说，那时，在这一带打游击，蒋介石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千方百计要想法将这根刺拔掉。除了集中四十几个团进行“围剿”外，还不断给国

民党浙江省主席黄绍竑下令，要其到处张贴告示，捉拿粟裕，捉到赏大洋多少多少。捉了很长时间，没有结果，蒋介石很不满意。为了对敌斗争的需要，粟裕化名“金米”。谈“金米”，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谈粟裕老百姓就陌生了。粟裕到平阳县矾山矿参观，这位厂的领导怎么也没有想到，站在他面前的首长就是当年在这儿打过游击的“金米”。经介绍，他才恍然大悟，立即握住粟裕的手说：“老将军，你可回来了，你走了，我们这儿的人民可想你啊！”1949年全国解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宴会上，粟裕和黄绍竑相遇，以高姿态和黄主动握手，并说：“过去我们是对手，今天我们是朋友了，过去的事情让它过去吧。”黄说：“惭愧、惭愧。”

粟裕在温州住下后，想起另一件使他伤心的事。他说，到了温州，就想起了他的亲密战友刘英同志。他们一块战斗了好长一段时间。万万没有想到，刘英在潜入温州后，由于叛徒的出卖被敌人捕去，仍坚贞不屈，牺牲了宝贵的生命。这是浙江革命斗争的一大损失。正因为如此，他到温州的第二天就去江心屿参观刘英烈士纪念馆，并向刘英烈士遗像鞠躬敬礼，并敬献花圈来告慰刘英烈士的英灵。

### 抵达泰顺

隔山隔水也隔不断粟裕怀念泰顺的心。11月20日上午7点半，从温州出发，经过长途跋涉，209公里的路程，走了6个小时，下午1点半，粟裕终于抵达泰顺县城。泰顺县的领导早就在县城外等候了。见到县委书记于奉图同志，粟裕第一句话便是：“我可回来了。”道出了这位久经沙场的将军对泰顺人民的深厚感情。

他又说：“这次我没有带任务来，主要是想看看大家。”

吃过午饭，他没有进房休息，天还在下雨。他不顾水汪汪的路，打着伞上街看市容去了。解放十多年了，他看到人民生活还很贫困，心情十分沉重。看完市容，就去烈士墓。粟裕在烈士墓前敬献花圈，默哀三分钟，行三鞠躬，并看了他自己亲笔题写的碑文。我看他内心很沉重。回来后，在县委会议室，同在座的同志一一握手问好。老红军、副县长刘宝生问他：“粟裕同志，你还记得我吗？我叫刘宝生，不仅跟你打过游击，我还是山门救亡干部学校的学员。”粟裕说：“记得，记得，我这次来就是想看看你和明星同志。”接着又详细询问了红军医院伤病员的一些情况。黄明星同志说，都伤愈归队了。粟裕说：“这是你们的功绩，你们在敌后坚持斗争，辛苦了！”刘宝生同志接着说：“我们终于挺过来了。”县里领导将县的工作基本情况汇报后，粟裕谈了国际国内形势，谈了如何发展泰顺经济问题。他说：泰顺的经济不发达，交通不便，这是事实。但泰顺有泰顺的优势。泰顺经济资源很丰富，有竹子、有木材，有大理石和其他经济作物，要充分发挥这个优势。他还特别提到种生姜的问题，说：“这是个好东西，既可食用，又可药用，生长快，半年可成熟，你们不妨试试。”晚上为他放电影《马兰花》，他没有看，而是邀请原红军医院负责人黄明星、黄孔请以及林志东副县长等老同志会面，畅叙别后之情。

夜深了，粟裕才进房休息。他看了看由两间办公室临时改设的卧室（作为他和省军区副司令阮贤榜的卧室，由于当时县里没有招待所），桌上铺的桌布是新的，床上被褥、枕头、毛巾、床单全是新的，桌椅也全是新的。他知道这是特意为他准备的，就不高兴了。他想泰顺人民这么穷苦，怎么能这么搞呢？他马上把随员叫去，要求把新的床上用品和家具换掉。他说：不换就不睡。

事后，栗裕对县里领导解释说，我不是有意为难你们，要是不将新的换掉，我躺在床上心里很不安。栗裕如此关心体贴泰顺人民，如此严格要求自己，使大家深受感动，使泰顺人民终身难忘。第二天，快要走了，栗裕还把老红军以及县里主要领导找来一块合影留念。打那以后他再没有回去过。他多么希望再回去一次啊！1984年2月5日，无情的病魔夺去了栗裕同志宝贵的生命。消息传到泰顺，泰顺人民处在无限悲痛之中。1994年5月，我专程到泰顺访问了一次。泰顺同志说，见不到栗裕同志，见到在老领导身边工作过的人员也是一种安慰。

## 泰顺巨变

栗裕1961年11月20日重返泰顺，我作为随从人员。1994年我又来泰顺，2013年再来一次。今年来泰顺参加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80周年纪念活动，已是第四次了。前后54年，每次来都有变化。这次来变化最大，不是小变，是大变，可以说是一次前无古人的巨变。

变化是多方面的，我就不一一去细说了，我侧重谈谈两件事。一件是交通问题。我清楚地记得，当年我跟随栗裕从温州来泰顺，209公里路程，足足跑了6个小时，平均每小时35公里。而且路况很不好，走的都是危险的盘山砂石路。路又不平，高高低低、坑坑洼洼，汽车像扭秧歌舞，弹跳很厉害，飞扬的灰尘像一条长龙，在汽车后面追赶。从半山腰或山顶往下看，真像万丈深渊，真有点吓人，让人提心吊胆。我对首长说这种情形，他说我是胆小鬼，没有出息。而这一次从温州机场到泰顺，170公里的路，大部分是高速路，过了一个山洞又是一个山洞，洞洞相连。最长的有3300多米，不到两个小时就到了，行程缩短了三分之二，



这是多么大的变化。

再谈住的问题。粟裕那年来，县里没有合适的招待所，临时腾了两间办公室给他住，他看到一切都是新的卧具，想到泰顺那么穷困，他很不高兴，直到将新卧具换成旧卧具他才进房间休息。

泰顺那个时候确实穷，但泰顺人有骨气，有志气。今天，在党的领导下，在改革开放路线的指引下，经过艰苦努力，泰顺经济上来了，不要说普通楼房到处有，上等级的高楼大厦也有了，如开元大酒店。腾出办公室做首长卧室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这又是多么大的变化啊。县委常委组织部长黄益友对我说，泰顺贫困县的帽子已经摘掉了，“我到乡下访问了一户农民，他说：现在的日子过得很好，这都是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搞得很好。”黄部长又说：到2020年，在习主席的领导下，一定可以全面奔小康，过上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美好生活。泰顺会比现在更美好。

如果粟裕老首长在九泉之下，知道昔日穷困的泰顺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一定会欣慰和高兴的。



粟裕在视察途中与当地干部合影留念

## 青春梦想永不停歇

——在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 80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表态发言

共青团温州市委书记、市青联主席 林小露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同志们：

今天，我们怀着无比激动和崇敬的心情，在这里共同纪念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 80 周年。“江山锦绣能如许，尽是先烈血染成”，没有革命先烈的前赴后继、浴血奋战，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和美好家园。此时此刻，我们缅怀刘英、粟裕、叶飞等革命先辈的不朽功勋，追思他们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不懈奋斗的崇高精神。在此，请允许我代表全市 280 万青少年，向在闽浙边地区英勇斗争的革命先烈、老战士、老同志致以深切的怀念和崇高的敬意。

80 年前，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与闽东独立师，将革命的种子播撒在浙南大地，带领广大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战争。闽浙边老一辈革命先驱的精神和信念，铭刻在我们青年一代记忆的深处，成为了我们宝贵的财富。岁月积淀的革命精神，陪伴我们一代人又一代的一生，激励着我们的成长。

习总书记说过“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如今，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和平幸福的年代，我们更要弘扬闽浙边革命先辈的精神，这是当代青年的根，更是当代青年的魂。铭记这段历史，传承这种精神，我们责无旁贷，我们使命光荣。让我有幸代表全市青年表态如下：

一、弘扬革命精神，就是要继承和弘扬革命先辈忠诚于党、

矢志不渝的光荣传统，号召当代温州青年听党话、跟党走，深化革命教育，传承红色文化，切实把个人追求融入到“中国梦”的共同理想之中，让爱党、爱国、爱家乡、爱人民成为广大青年的信仰支点和人生支柱，在前进道路上始终信念坚定。

二、弘扬革命精神，就是要继承和弘扬革命先辈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光荣传统，号召当代温州青年敢担当、勇作为，弘扬“敢为人先、特别能创业、特别能创新”的温州人精神，在岗位上尽职尽责，在改革中率先有为，在困难前奋勇前行，在赶超发展中建功立业。

三、弘扬革命精神，就是要继承和弘扬革命先辈品德高尚、追求真理的光荣传统，号召当代温州青年勤学习、甘奉献，把善于思考、敏于求知、奉献社会作为自身的一种品格、一种人生境界，自强不息，迎难而上，争做时代风尚的引领者、和谐社会的推动者，在引领风尚中锤炼品格。

四、弘扬革命精神，就是要继承和弘扬革命先辈始终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同甘共苦的光荣传统，号召当代温州青年下基层、接地气，践行群众路线，力行“三严三实”，把农村和基层当成人生的大课堂、大平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新青年下乡的“星星之火”推动形成农村繁荣发展的“燎原之势”，在服务群众中成长成才。

年轻的热血一直奔腾，青春梦想永不停歇。革命先辈的优良传统和实践经验，是温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宝贵财富，更是我们青年一代成长的指路明灯。我们要加倍学习传承先辈精神，加倍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以昂扬的状态、实干的作风、不懈的奋斗，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温州的赶超发展注入澎湃的动力，用青春和智慧书写新一代青年的理想和光荣，谱写新的历史篇章。

##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的原因与教训

李岳松

1934年10月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中有一支部队叫红军挺进师，它在浙江及浙闽边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了浙西南和浙南游击根据地。

红军挺进师的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红军开始两万五千里长征之前的三个多月，中央派出一支部队，高举北上抗日的旗帜，从中央苏区的东部出动，向闽、浙、赣、皖四省国民党后方挺进。这支部队，就是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这次北上抗日，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34年7月7日，红军第七军团受命担负抗日先遣队的任务，从瑞金出发，先后转战于闽中、闽东、闽北、浙西、浙皖边和皖赣边，10月下旬到达闽浙赣（即赣东北）苏区。第二阶段是11月初，红七军团与原在赣东北的红军第十军合编为红军第十军团，继续担负抗日先遣队的任务，转战于浙皖边、皖赣边和皖南。两个阶段共历时六个多月，行程五千六百多里，沿途且战且走，先后进行了樟湖坂、福州、庆元、清湖、旌德和谭家桥等三十余次重要战斗。一度震动了福州、杭州、徽州、芜湖以至蒋介石的反革命统治中心南京。广大指战员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一边宣传我们党的抗日主张，一边长途跋涉，孤军奋战，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以牵制敌军力量、达到策应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谱写了一篇雄伟壮烈的人民革命史诗。然而，在蒋介石调集大军不间断地围追堵截

下，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的领导，这次行军最终未能摆脱被动的处境，招致了1935年1月的怀玉山战斗失利。

遵照中央的电示，1935年2月，以怀玉山胜利突围的部队为基础，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由粟裕担任师长，刘英为政治委员，率部向浙江西南部、南部进军，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

在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80周年之际，重新回顾红军挺进师的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对于继承和发扬革命优良传统，砥砺意志，振兴中华，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 抗日先遣队组建的背景及其任务

三十年代初期，我国国内形势出现了错综复杂的局面。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我国东北、华北，中国面临亡国之祸，全国人民纷纷要求停止内战，抗日救亡。但是，蒋介石无视全国人民的愿望，顽固地坚持对日妥协投降和加紧扩大内战的反革命政策。

此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着党中央。第四次反“围剿”以前，他们就排挤了毛泽东同志对中央苏区和红军的领导。到第五次反“围剿”时，“左”倾的军事指导方针已在红军中取得统治地位。从军事冒险主义到军事保守主义，实行消极防御方针，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节节失利。

1934年夏，中央苏区已由原来的纵横各近千里，缩小到各三百余里，周围敌重兵压境，并不断向我中心区进逼，军事形势已十分危急。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组建并派出的。

1934年7月初，红七军团奉命从福建连城地区调回瑞金待命。



部队到瑞金后，党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宣布由红七军团组成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立即向闽、浙、赣、皖等省出动，宣传我党抗日主张，推动抗日运动的发展，并规定这次行动的最后到达地域为皖南，要求七军团在一个半月内赶到，支援和发展那里的革命局面。

宣传抗日和支援皖南，是当时赋予七军团的任务。为了宣传我党抗日主张，中央公开发表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等文件，并印制了“一致对外——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和“拥护红军北上抗日运动”等大量宣传品，总数达一百六十万份以上。通过沿途向老百姓发放宣传资料，推动了抗日运动发展，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

中央派出这支部队的更加直接的目的，是企图以这一行动威胁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吸引和牵制一部分“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即将实行的战略转移。

七军团是中央苏区红军主力中较新的一个军团，较长时间在中央苏区东线作战。经过实战锻炼，逐渐发展成为一支英勇顽强、善于野战的部队。当接受抗日先遣队任务时，由于在东线连续作战的消耗，全军团约有四千人。为了执行新任务，突击补充了两千多名新战士，合计六千多人。其中战斗人员四千多人，分编为三个师，实际上各相当于一个大团；非战斗人员约二千人，包括中央派出的一个随军工作团。武器也很不足，全军团仅有长短枪一千二三百支，一部分轻重机枪和六门迫击炮，许多战士背的是梭镖。但其它物资却不少，中央交付部队随带的宣传品，连同部队的后勤物资及炊事担子，总共五百多担。这时，部队新成份多，非战斗人员多，武器不足，负荷很大，行动笨重，远不如在东线作战时那样精干了。

## 怀玉山的失败

谭家桥战斗之后，敌人第四十九师、补充第一旅、第二十一旅及一些地方部队，一共约近二十个团的兵力，蜂拥而来追赶我部。为了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从1934年12月下旬到1935年1月上旬，我军在皖南和皖浙赣边的泾县、青阳、石埭（今广阳）、黟县、开化等十余县地区往返转移，进行了大小十余次战斗，大都是消耗战，虽然给予敌人以相当的杀伤，但因敌我力量悬殊，我军处境日趋险恶。

化婺德苏区，是闽浙赣大苏区北面的一个外围小苏区，周围约一百里。1月12日晨，军团到达化婺德苏区东北边缘的杨林（属浙江开化县）时没有休息。这时方志敏和粟裕随军团机关人员、伤病员（包括乐少华、刘英在内）、后勤人员，以及四个缺乏弹药的迫击炮连和重机枪连共800余人的先头部队继续翻过一个山头，并到了靠近闽浙赣大苏区的港头，才停下来休息。刘畴西率领的军团主力到达杨林之后，敌浙江保安第二纵队第五团从星口连夜急进七十里，堵截了我军前进的路线。我军团主力进到徐家村受阻，与敌发生激战，只好以一部分兵力为掩护，大部队折经南华山、王山村，15日才进入化婺德苏区。

16日，方志敏和粟裕商定，先头部队应先走，同时通知刘畴西率军团主力迅速跟上，在当日夜全部通过敌陇首地段封锁线，进入闽浙赣苏区。刘畴西考虑到部队战士疲劳，当晚不能再走。而粟裕的意见是，今晚必须通过敌人封锁线。方志敏完全同意粟裕的意见，他担心刘畴西犹豫迟疑，便决定亲自留下，同主力部队一起行动，要粟裕率先头部队立即前进。

这时，敌人虽已加强了化婺德苏区与闽浙赣苏区之间的封锁

线，但兵力不足。当粟裕率领先头部队通过时，派出两个战斗班去佯攻，吸引敌之火力，上半夜全部通过了敌人的封锁线，安全到达闽浙赣苏区的大小坪、黄石田（均属德兴县）地区。到达之后，先头部队一面同省委、军区进行联系，一面等待主力部队。大约过了一个星期，获悉蒋介石下令说：方志敏、刘畴西等仍在山上，在没有搜到以前，凡要求撤出休整的“杀勿赦”。16日晚，刘畴西因坚持就地休息，以后在通过封锁线时，接连改换了几次方向，延误了时间，被敌军赶上，陷入重重包围之中。我军经过长途行军作战，弹尽粮绝，伤亡不断增加，终被分割、冲散。在如此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我军将士仍坚持各自为战，顽强战斗，表现了革命战士无比坚定、无限忠诚和誓死与敌血战到底的大无畏精神。敌人极端野蛮残忍，见人就杀，见房子就烧，把搜出来的粮食全部彻底烧掉。因山高林密、不便搜索、敌人就放火烧山，走不动的伤病员，有些就被烧死了。只有少数同志跑回闽浙赣苏区来，另有一小部分同志向北突围到皖南去了。军团主要领导人刘畴西、方志敏同志隐蔽在陇首封锁附近的山里，至1月27日，先后不幸被敌军搜捕。此后，方志敏等同志在狱中坚贞不屈，同敌人作了坚决的斗争。1935年七八月间，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方志敏同志和其他几位同志在南昌英勇就义。

### 失败的原因及其教训

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历史关头，我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这支劲旅，在蒋介石反动派以七倍于我军兵力的疯狂追堵和围攻下，不幸失败了。这次失败的原因，在客观上，是敌人力量的暂时强大，主观上是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它给我们以极

其深刻而沉痛的教训。根据有关领导的回忆文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其失败的原因与教训主要有：

一是给抗日先遣队的任务要求过高，没有结合当时的实际。派出抗日先遣队的战略意图，是要以它的北上行动“促使敌人进行战略与作战部署上的变更”。这战略意图没有现实客观基础，因而是主观主义的，它导致了在作战指导上的盲目冒险。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自1934年7月初从瑞金出发，到1935年1月在怀玉山失败，全部过程处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时期。1979年底，粟裕曾问过叶剑英同志：抗日先遣队是否是在王明“左”倾错误指导下派出的？叶剑英同志说：“五次反‘围剿’初期，毛主席主张过把红军主力挺进到苏浙皖赣地区，以打破蒋介石的‘围剿’，当时毛主席不在位，中央没有采纳。后来派出先遣队，主力红军已经要作战略转移，那时毛主席处于无权地位。”1973年12月，朱德同志回忆：“当时的战略意图是准备退却，派先遣队去做个引子，不是要北上，而是要南下（指中央红军主力从中央苏区向南部转移）。”朱德、叶剑英两位领导同志向我们指出了北上抗日先遣队派出的历史背景和实际意图。

当时派出一支部队深入到敌人后方去活动，争取在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时对敌人起一定的牵制作用，这从战略指导上说，是可以的。然而，中央赋予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任务却远远超出了上述要求。蒋介石绝对不会由于我党北上抗日号召的提出和一支较小部队的出动，就抽调走大量兵力，放松对我中央苏区主力红军的“围剿”。再者，在当时整个红军作战严重失利的情况下，中央苏区老根据地八万主力红军都呆不住了，却要求七军团这支六千人的部队，深入到蒋介石国民党的闽浙赣皖腹心地区去“最

高度地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更是完全脱离实际的臆想。

从政治上看，在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我国华北，民族矛盾急剧上升，全国人民要求抗日救亡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红军北上抗日的口号，举起红军北上抗日的旗子，是正确的，对于揭露蒋介石的卖国、内战政策，宣传我党抗日主张和推动抗日运动的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当时闽浙赣皖地区尚无直接对日作战的形势，推动抗日运动的关键，是要实行政策和策略上的调整和转变，而这一点恰恰又是“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中央所未能解决的。

二是没有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及时调整军事战略。在七军团阶段，军团有些领导同志，经过一段行军作战实践以后，结合井冈山斗争和中央苏区军事斗争的体验，逐渐感觉到，部队孤军深入白区，远离后方，面对优势敌军的堵追，必须适当改变军事行动的指导方针。但是，由于军团领导权掌握在曾洪易、乐少华手中，同志们的这些正确意见得不到重视和采纳。七军团整编为十九师后，摆脱了曾洪易、乐少华的干扰，在寻淮洲同志领导下出动浙皖赣边，那一段仗就打得比较活，形势出现了转机，这有力地说明了在敌人深远后方活动，必须相应地改变作战指导方针。总而言之，在红七军团阶段，还没有预见到要实行由正规军向游击队的转变，中央没有给军团这样的任务，他们也不敢设想把一个大的军团改编为游击队。

在中央红军主力转移后，当时我军已估计到敌人会加紧对闽浙赣苏区的“围剿”。我军没有根据形势变化，仍不采取分散游击的方针，却把擅长于打游击的红十军和地方武装同长于打运动战的红七军团合编，组成新的大兵团，集中在一起打运动战。可



以说，这次合编更是一个沉重的教训。1973年12月，朱德同志在关于战史问题的谈话中评价这次合编时就曾指出：“不编不垮，一编正规战打不成，游击战也打不成。经验还是要把正规军变成游击队。”朱德同志的谈话，指明了“左”倾冒险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所犯错误的要害。

三是实行绝对集中的作战指挥，使部队作战行动陷于被动。当时，抗日先遣队的全部战略行动甚至战术行动，都由中央和中革军委直接指挥。本来，派出这样一个军团，深入敌人后方去独立执行任务，敌情那样复杂多变，环境那样困难险恶，中央和中革军委除了规定它的战略行动方向和基本任务外，理当给予较大的机动权。然而当时的中央和中革军委却使抗日先遣队的一切行动都严格受其控制，实行绝对集中的指挥，使军团的作战指挥受到严重的限制，造成军团陷于极其被动的境地。

抗日先遣队北上行动过程中，在七军团阶段，战略思想上受“左”倾错误指导，军事指挥行动上实行绝对的集中主义，军团内部又有曾洪易、乐少华这样的干部只知机械地执行上级指示，事情就更加不好办了。更何况当时是在远离中央，深入白区的环境中进行孤军活动。至于红十军团组建以后，则主要是由于战场指挥方面的失误。谭家桥等几个关键性的仗都没有打好，从而加速了先遣队的失败。这些又都说明了战役指挥员，在这战局不利的情况下，尤其要从实际出发，灵活机动地、正确地发挥主观能动性。

四是按照“左”倾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配备起来的宗派主义干部，严重地损害了七军团的领导核心。少数“左”倾政策的坚决执行者，掌握着领导权，包括军事指挥最后决定权。指挥者无知与专横，盲目机械地执行中革军委的命令、拒绝结合实际

积极建议，这给七军团带来的灾难，其教训确实太深刻。

组成红十军团时，领导干部的配备，仍然受着“左”倾宗派主义的影响。保留了乐少华的军团政委职务，反而把军团长寻淮洲降职为师长，并把他排除在军政委员会之外，这不仅是对寻淮洲个人实行宗派主义的打击，同时也是无视七军团转战数省以流血牺牲换来的宝贵经验。“左”倾错误的干部政策，同抗日先遣队的失败是密切关联的。在战争中间，主要军事指挥员的配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是导致抗日选遣队失败的组织上的原因。

先遣队失败的主要原因归根到底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造成的结果。根据后来挺进师的经验，当时先遣部队早点下决心“化整为零”，把整个军团散到浙闽皖边境或四省境内，或许可以多保存一点部队下来，可惜当时没有下这样的决心。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执行北上抗日的神圣任务中，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虽然失败了，然而由方志敏等同志领导的广大指战员和烈士们的可歌可泣的战斗业绩将永载史册！它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工农红军的战争史上所起的重大作用是不可磨灭的。它的突围部队所组成的红军挺进师在浙江南部和浙闽边境敌人腹心地区，汇合了各种革命力量，创建了新的游击根据地，成立了由刘英为书记、粟裕为组织部部长、叶飞为宣传部长的闽浙边临时省委，在浙南胜利坚持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挺进师在浙南一带的活动，在整个浙江党史和新四军发展史上的作用不可低估。三年里实现了两大战略目标：一是掩护和配合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浙南特委、瑞平县委的工作，从而为抗战初期的浙江省委准备了一个安全、巩固的后方基地；二是化整为零，保存和发展了革命的有生力量，扩大了党与苏维埃新的根

据地，建立党的组织，保卫闽浙赣基本地区及邻近游击区域，为北上抗日准备了一支战斗力很强的正规武装。抗日战争爆发后，这支部队又成了光荣的新四军的组成部分，重新北上，转战大江南北。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红七军团、红十军团的光荣斗争史将永远铭记在人民的心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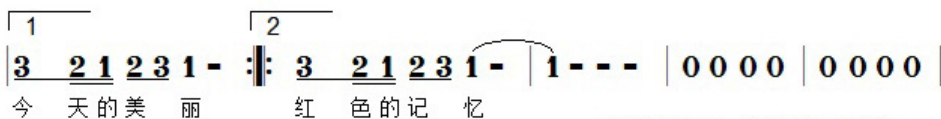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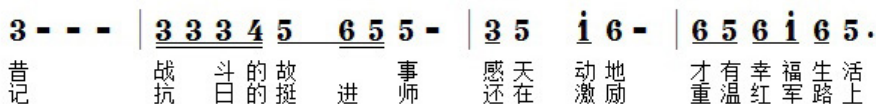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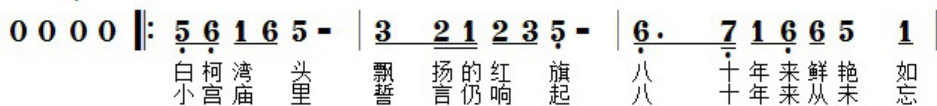
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组织者、参战者和广大先烈的革命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纪念。

# 白柯湾·红色印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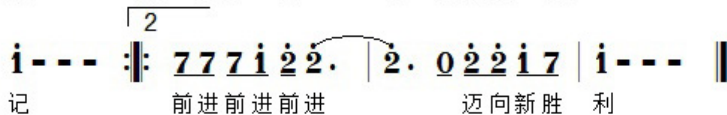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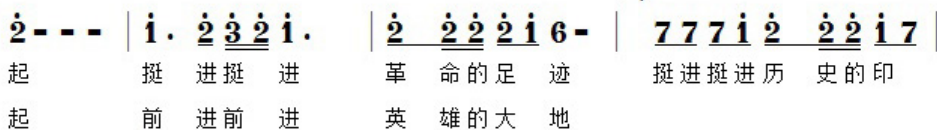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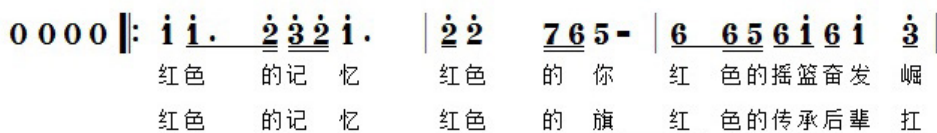
——为纪念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 80 周年而作

作词 思 未  
作曲 张 俊

1=F  $\frac{4}{4}$



(速度加快 间奏四小节)



## 挺进浙南 红色的辉煌

——少先队员在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 80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献词

陶汉心 汪航健

（独白）巍巍洞宫山，浩浩飞云水。浙南大地，山水竞秀，人文争辉，这是英雄的土地！八十年前的今天，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联合闽东红军，在白柯湾成立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带领浙南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绚丽的篇章。

### （一）

我们回望

八十年前的历史夜空

星月如晦

风雨如磐

苛捐，杂税

土豪，劣绅

与一切罪恶势力

构筑起反动统治的牢笼

黑暗中的人们

盼着星星



盼着光明  
曾经的抗争，一次次失败  
最后，是谁——把浙南大地的烽火点燃

(二)

五百颗星星光耀长空  
燃烧的铁流喷涌向前  
浙江大地迎来革命的劲旅  
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

白柯湾简陋宫庙里的灯火  
照亮革命者刚毅的脸庞  
临时省委的旌旗  
如熊熊的烈焰，映红了天

布告、传单、标语  
唤醒苦难中的人们  
镰刀、斧头、长矛  
是消灭敌人的武器  
党组织、苏维埃、赤卫队  
如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  
炸碉堡、打土豪、分青苗  
泰顺山区迎来革命的大热潮

这是一条艰辛的红色之路

“围剿”、杀戮、收卖、叛变  
缺衣、少食、忍饥、挨饿  
在征途中，多少革命志士倒下

反“清剿”斗争中  
残忍的敌人割下革命者不屈的头颅  
悬挂示众七天七夜  
数百名战士壮烈牺牲  
五百多位干部群众英雄就义

为了让游击队不暴露目标  
范妈妈用毛巾捂死了怀里啼哭的婴儿  
为了清除内奸  
刘大娘用断肠草毒死自己的独生子  
为了保卫红军山洞医院  
赤卫队员沈希怀被敌人用开水活活烫死

在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  
黑暗的恶魔终于死去  
历史的天平倾向正义  
泰顺人民终于迎来革命的胜利

### (三)

斗转星移，光阴荏苒  
八十年沧桑变幻

白柯湾的山花，开了又落，落了又开  
崇高的革命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

今天，为了实现国家的民主与富强  
为了圆好伟大的中国梦  
我们踩着先烈的光辉足迹  
继承革命者的优良传统  
顽强拼搏，昂首奋进

## 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 80 周年感赋

郑云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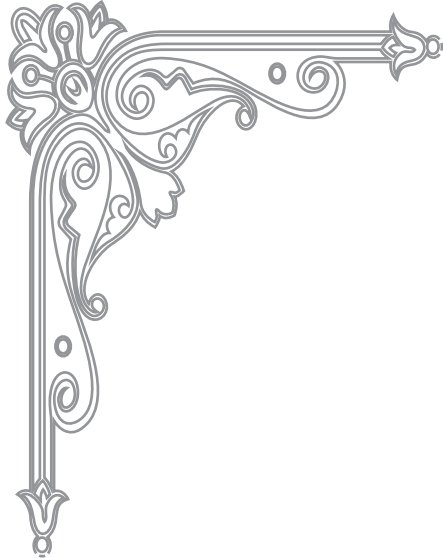
为扬八秩当年志，远道相拥聚一堂。

携手恳谈今喜晤，促膝共忆昨激昂。

昔时赤胆纾国难，先辈捐躯慨且慷。

感悟余身虽岁暮，尚腾热血步国殇。

（注：作者郑云峰，即参加此次纪念大会的郑丹甫亲属郑正祥）



# 聚焦篇







## 红色泰顺 绿色崛起

（《浙江日报》2015年11月7日专版）

“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在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80周年这个重要时刻到来之际，对光辉岁月的回顾、对英勇先烈的追忆、对红色历史的重温，便有了特别的必要。

青山巍巍依旧，历史彰彰如昨。作为有着传奇革命历史的泰顺，山川见证了烽火硝烟，大地留下了先驱脚印，百姓记忆铭记着峥嵘往事。也正因为如此，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的英勇精神，一直鞭策着山城的干部群众奋发图强。

近年来，泰顺坚持“生态立县、绿色崛起”战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昔日代表闭塞落后的青山绿水正为这座浙南山城注入强大的发展后劲，作为生态文明建设先行区的泰顺正焕发勃勃生机，相继获得了“国家生态县”“中国廊桥之乡”“中国名茶之乡”“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中国市场投资开发第一县”等美誉，被列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示范县、国家主体功能区建设试点县、国家级生态保护与建设示范区，成为绿色发展的“泰顺样本”。

见证红色历史，事业代代相传。通过对80年前这段峥嵘岁月的缅怀纪念，传承革命精神，弘扬优良作风，可以让后人获得更多前进的动力，让泰顺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 山城迎来活动盛典

1月7日，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80周年纪念活动，在浙南革命老根据地泰顺隆重举行。

纪念活动由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温州市委主办，中共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泰顺县委承办。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领导的亲属和后人代表，挺进师转战地的党史研究机构负责人，省内党史部门负责人，以及温州、泰顺的干部群众，一起重温了这段英勇壮烈的历史。

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领导刘英、粟裕、叶飞的子女后人来了；临时省委委员阮英平、范式人的子女后人来了；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参谋长王蕴瑞、浙南革命委员会主席郑丹甫的亲属也来了；甚至粟裕的秘书已经耄耋之年还专程前来。这一切，都是因为泰顺的山山水水，值得他们魂牵梦绕。

九峰白柯湾，是泰顺县泗溪镇东北方向的一个小山村，地处海拔1100米的白凉尖半山腰上。村边的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纪念馆，始建于2001年，在浙南的红色教育基地中，有着不小的知名度。

7日早上，沿着刚刚拓宽翻新的水泥路，驱车不断蜿蜒盘旋而上，雾气越来越浓密。天空忽然下起霏霏细雨，雨雾织就的纱幕，让纪念馆变得若隐若现。代表们一起来到白柯湾，不由为眼前陌生而又亲切的峰峦叠嶂所惊叹，为周边村民热情友善的欢迎所感动，更为革命历史陈列的史实所感染。

根据活动的安排，代表们在纪念馆前聚集在一起，和着旋律高唱革命歌曲，一时间群山回音，大地共鸣。怀着对泰顺这片绿水青山的感激，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三位领导的后人一起来到植

树点，挥锹培土种下桂树，留下了一份美好的纪念。

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纪念馆，建筑面积 900 多平方米，收藏了 500 多张历史图片和百余件老红军捐献的历史文物。面对图片中熟悉的面孔和一些耳熟能详的故事，代表们都有些激动。阮英平儿媳钟德沪在临时省委 11 个委员的图片前，热切地向边上人讲述自己熟知的一些往事；叶飞长女叶小楠一边徜徉一边感慨：“父亲战斗过的其他地方，我都已经走过，只有泰顺我是第一次来，总算走遍了。”

白柯湾村的一座老宅，苍黑的柱子和墙壁显示着岁月沧桑，挂着“刘英粟裕同志办公旧址”指示牌。代表们来到老宅堂前，面对先辈工作过的地方，纷纷探看各处，感受曾经的艰苦岁月。

白柯湾村头有几棵古老的苦楮树，遮罩着一座小宫庙，是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旧址。现在的庙内，三个人物蜡像围着一张桌子在开会，重现商讨成立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时的场景。刘英、粟裕、叶飞的后人，对着亲人蜡像倍感激动和亲切，纷纷诉说父辈经历，找位置合影留念。

叶小楠与妹妹叶葳葳一起在小宫庙外合影。她说：“今天参观，我内心十分激动。父亲当年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奋勇拼杀，开创了一段难以磨灭的光辉历史。我们作为后人，不仅要缅怀，而且要懂得思考，为什么他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毫不畏惧，勇往直前。”

王蕴瑞的孙女王红兵，一个人悄悄地走到小宫庙后坡的纪念碑前，对碑文拍照。她感觉没有署名的碑文字体很眼熟，所以细看是否亲属所写。她说：“抬头注视着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纪念碑，它似乎静静地讲述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红色岁月，不仅激励我们后人要倍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也要继续在今后的生活

中奋发图强。”

粟裕之子粟戎生则提出：抗战爆发后，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在无法及时得到中共中央指示的情况下，把握形势独立分析，积极争取与地方国民政府谈判参加抗日，这种开拓创新精神值得后人好好提炼总结。年轻人从革命先驱的斗争实践中可以学到很多有用的东西，能对当下的工作、生活、信念提供指导。

参观中，不知何时雨雾散去，天色豁然开朗，在连绵雨天竟出现久违的灿烂阳光。蓝天白云映衬着连绵青山，壮美山河尽收眼底。

代表们震撼于峥嵘岁月的艰苦卓绝，敬佩于前辈先烈的丰功伟绩，感怀于红色精神代代相传的历史使命，也感动于泰顺老区群众的深厚感情。刘英之子刘锡荣感慨：以前这里的路都是羊肠小道，现在都变成康庄大道了，当地政府为老根据地发展，做出了很多努力！

## 红色历史峥嵘岁月

80年前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的成立，似乎源于战争中的偶然，实则出于历史发展的必然。通过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领导的后人代表讲述，大家聆听到了那段烽火连天、艰苦顽强的岁月记录。

1934年10月，为保存革命有生力量和北上抗日，中共中央、中央红军主力撤离苏区，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留下部分红军和党政机关人员，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坚持了英勇无畏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是由原红十军团（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突围部队为基础组建而成的，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



重要武装力量。1935年2月组建时，全师仅538人，粟裕任师长，刘英任政委。

1935年3月，红军挺进师到达浙西南，并于当年夏天建立了以仙霞岭为中心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队伍发展到近千人。但第一次“围剿”，使根据地遭受严重摧残，队伍锐减至300余人。由此，1935年10月，红军挺进师主力转移到闽浙边，以泰顺东部山区为中心开辟浙南游击根据地。

1935年10月5日，粟裕、刘英率红军挺进师主力120余人，与叶飞等人率领的红军闽东独立师在寿宁县含溪村会师。当日双方召开了第一次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并拟定了领导名单。

1935年11月上旬，叶飞来到红军挺进师驻地泰顺县九峰白柯湾，就联合开展革命行动进行深入协商。11月7日，在白柯湾小宫庙，红军挺进师、闽东红军独立师双方领导人举行第二次联席会议，正式宣布成立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当时的临时省委委员共11人，刘英任书记，粟裕任组织部长，叶飞任宣传部长兼少共临时省委书记。临时省委下辖浙西南、闽东两个特委。同时成立闽浙边临时省军区，粟裕为司令员，刘英兼政委。

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的成立，对于加强闽浙边根据地的统一领导、有效组织反“围剿”斗争起到积极作用，使闽东、浙南、浙西南、浙东四个游击区基本上连成一片，有力推动了红军挺进师在浙南一带展开革命活动。

在中共闽东特委和浙南地方党组织的支持下，至1936年底，红军挺进师兵力发展到1500余人。1937年2月，浙南军民经受住了第二次“围剿”的严峻考验。

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日益紧迫，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领导审

时度势，争取与国民党地方当局和平谈判，共同抗日。1937年8月，双方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10月，300多名红军挺进师战士到平阳山门集中，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

1938年3月，粟裕率领抗日游击总队开赴皖南，编入新四军；刘英等一批干部则坚守浙南，继续领导浙江党组织开展工作。

1938年5月，中共东南分局决定撤销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中共浙江临时省委。至此，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光荣地完成了历史使命。

### 薪火相传贡献巨大

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的成立，红军挺进师在浙江的三年游击战争，对新民主主义革命作出哪些贡献？经历其中的当事人，曾经有过诸多回忆；研究历史的专家学者，作出了深入分析和评价。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所著的《中共浙江党史》记载，红军挺进师有力地掩护和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保存了一支能排除万难、创造奇迹的武装力量，积累了游击战争的经验，在浙江各地培养了大批革命新生力量，为浙江的解放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红军挺进师以顽强的革命意志、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完成了党所赋予的光荣任务，推动了浙南与浙江革命形势的发展。处于浙南游击根据地核心区域的泰顺人民，舍生忘死、无私奉献，全力支持浙南党组织和红军挺进师，为浙南革命斗争的发展作了巨大的贡献与牺牲。

在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浙南——南方革命的一个战略支点》一书，收录了刘英1940年夏在皖南撰写的《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详细记录了红军挺进师在

闽浙边各个时期行动的情形及经验教训。

粟裕在《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一书中，记录了挺进浙西南、创建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反“围剿”、迎接抗日高潮的全过程。

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浙南游击区》一书中，叶飞专门撰写《忆三年游击战争中的粟裕同志》，描述战争经历。

同样经历这段难忘岁月的龙跃，1982年7月口述了《红军挺进师在泰顺（1935年-1936年）》和《台边战斗与仓边战斗》的回忆文章，具体回忆亲历的战斗。

此外，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红军挺进师在泰顺》等书籍，整理出一颗颗史实珍珠，串成了可歌可泣的泰顺红色历史。

“红色之区”泰顺，目前境内保留着20多处革命胜迹，1988年被命名为“革命老根据地县”。为了让革命精神代代相传，泰顺县一直大力保护革命胜迹，中共浙闽边临时省委成立旧址已被列入《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第二批名录》；白柯湾小宫庙旧址、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纪念馆等构成的红色纪念路线，已成浙南重要的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在纪念活动中，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主要负责人总结道：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传承历史，回眸过去是为了更好地展望未来。我们要以纪念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80周年为契机，深化革命传统教育，传承推广红色文化，继承弘扬革命精神。

### “红色之区”今朝绿色崛起

8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在泰顺开辟浙南游击根据地，是因为山高林密，地处偏僻，交通落后；80年后，天堑变通途，山乡换新颜，红色的精神依然流淌在洞宫山下、飞云水畔。来自

各地的代表重温了红色历史，更零距离看到泰顺天翻地覆的变化。

在绿水青山的建设实践中，泰顺县作为浙南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传承红色精神，弘扬红色文化，形成“红绿相间”的旅游新格局。红色旅游正与廊桥文化园、氡泉景区、乌岩岭国家自然保护区相辉映，形成泰顺四大旅游品牌。

今年5月，泰顺县投入大量资金，拓宽了泗溪镇通往白柯湾的道路，旅游大巴已能直接开进白柯湾村。“今年泰顺以挺进师纪念馆为重点，对周边区域包括白柯湾、灵家山、小南山三个村进行统一整修。纪念馆通过图文展播、场景还原、浮雕蜡像、3D互动影像等方式，真实地重温了红军挺进师艰苦卓越的三年游击战争。”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纪念馆馆长林上兆介绍说，每年有三万余人前来参观，现在纪念馆的内容丰富了，形式也多样了，参观的人肯定会更多。

根据泰顺红色旅游整体规划，泰顺未来的红色旅游，在重走红军路、聆听红色故事、唱响红色歌曲之外，将以九峰省级风景名胜区的优美自然环境为依托，以工农红军红色文化为主脉，结合农业发展和乡村特色旅游项目，形成“一条红色路，一群彩色村”的红色旅游格局。

传承红色基因，加快绿色赶超。泰顺将以纪念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80周年为契机，在探索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的征途中，坚定不移举生态旗、打生态牌、走生态路，推进廊桥国家公园建设，绘就美丽泰顺的生动画卷。（徐明 叶小西 虞佳琳 张陈晨）

# 追忆浙南烽火 传承革命精神

——纪念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 80 周年

（《温州日报》2015 年 11 月 7 日专版）

巍巍洞宫山，浩浩飞云水。浙南大地，山水竞秀，人文争辉，这是英雄的土地。1935 年秋，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转战浙南，联合闽东红军，于 11 月 7 日在泰顺白柯湾成立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带领浙南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绚丽的篇章。

## （一）转战浙南

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主力军，是由红十军团的突围部队为基础组建的。1935 年 2 月组建时，全师仅 500 余人，师长粟裕，政委刘英。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部队由赣东北进入浙西南。1935 年夏季，建立了以仙霞岭为中心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队伍发展到近千人。4 月，红军挺进师从景宁上标进入泰顺。20 日，挺进师到达台边村，歼灭国民党泰顺县基干连半个连兵力。次日，敌剩余逃兵在里光叶山村被红军俘虏缴械。接着，挺进师兵分两路，一路向泰顺县城进军，迫使城内守敌不敢出城，另一路攻打百丈口。百丈口敌兵闻风而逃，红军缴获一些物资，破坏了泰顺县城通往瑞安的电话线，切断敌人与温州的水陆交通。挺进师在泰顺首战告捷，引起强烈反响。战后，部队向景宁方向转移。

7月至10月，国民党军队发动第一次大“围剿”，浙西南革命根据地遭受严重破坏，红军挺进师许多领导骨干牺牲，队伍锐减至300余人。

10月5日，刘英、粟裕率挺进师主力120多人在寿宁县含溪村与闽东独立师会师。当日，双方在寿宁县郑家坑自然村召开联席会议。会议提议联合挺进师、闽东红军和闽北红军三方力量，建立省委组织，统一领导革命；决定创建浙南革命根据地，把闽东鼎平办事处管辖区域划给挺进师，作为挺进师转战浙南的立足地。

为了打击敌人嚣张气焰，刘英、粟裕率领挺进师部队于10月17日再次攻克百丈口，全歼敌警察一个分队。18日，挺进师约三个支队到达泰顺县垟溪乡可溪村，成功俘虏约一个连的敌军，缴获其全部武器。经过多次战斗，红军挺进师在泰顺东部山区扎稳脚跟，并开始准备成立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

## （二）成立临时省委

1935年11月7日，刘英、粟裕、叶飞等人在泰顺县九峰乡白柯湾小宫庙召开第二次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正式成立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刘英、粟裕、叶飞、黄富武、阮英平、刘达云、许信昆、洪家云、范式人、方志富、许旺等11人组成临时省委委员会，刘英任书记，粟裕任组织部长，叶飞任宣传部长兼少共省委书记。同时成立闽浙边省军区，粟裕任司令员，刘英任政委，统一领导闽浙边区的武装斗争。

接着，临时省委以中共闽东特委刚开辟的鼎泰区为基地，全力整顿地方党组织。12月，省委将闽东鼎平中心县委所属的鼎泰区单独划出，作为省委直属区，并在挺进师和省委驻地——泰顺



县九峰、峰文一带成立泰平区。同时成立中共瑞平泰县委，下辖鼎泰区和泰平区。这是挺进师进入浙南以来的第一块根据地。

有了根据地作依托，挺进师在军事上转为主动出击。1935年12月到次年5月间，挺进师在泰顺境内取得了攻打里光基干队战役、白柯湾之战、冥斋岩遭遇战、伙爬岭伏击战等重大军事胜利，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在浙南的反动统治。

### （三）创建革命根据地

1936年3月，临时省委在泰顺峰文乡小南山自然村成立中共浙南特委，郑宗玉任书记。8月，浙南人民革命委员会和浙南军分区相继成立。接着，还成立了鼎平、泰顺、瑞平泰等县级人民革命委员会及其下属组织。上述各级党政军机构的健全，为广泛开展武装斗争及创建浙南革命根据打下坚实基础。

是年下半年，为了对付粤、桂军阀发动的两广事变，原驻福鼎、霞浦等县的国民党第九师一部和驻泰顺的第十八军第十一师相继调往湖南。国民党主力部队一走，留驻泰顺的保安团和基干队不得不收缩战线，躲进各大据点，闽浙边的革命潮流旋即高涨。农民在“四抗”（抗租、抗债、抗捐、抗税）运动的基础上，提出分配土地的要求。临时省委顺应革命形势发展，贯彻土地革命纲领，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中共瑞平泰县鼎泰区委发动福鼎上奥等村贫苦农民100多人，浩浩荡荡地前往泰顺峰文，分掉双溪口村地主的粮食；接着还发动泰顺月湖柘下村贫苦农民250多人分掉当地18户地主2.5万斤粮食。8月下旬，浙南人民革命委员会主席郑丹甫，在泰顺县东云自然村召开土地改革会议，同时举办土地分配训练班，培训土改骨干力量近70名。9月份，瑞平

泰县全面开展分粮斗争和土地改革，按人口先分谷子后分土地，群众热情高涨。下属鼎泰区在泰顺境内的月湖、富垌、鹏山三个乡就分配耕地 3463 亩。

1936 年下半年，浙南革命根据地蓬勃发展。根据地内普遍建立共青团、妇救会、贫农团、儿童团等群众组织。临时省委和浙南特委以党的基层组织为依托、以群众团体为基础、以武装斗争为手段，深入开展政权建设与土地革命，有力遏制了国民党的反动势力，扩大和巩固了革命根据地，使得农村基层政权基本上被我党控制。这期间，泰顺革命根据地成为浙南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成为闽东苏区的可靠后方。全县革命根据地面积达 630 平方公里，游击区面积达 1120 平方公里，分别占县域面积的 33%、58%。

#### （四）反“围剿”斗争

1936 年冬，国民党当局在浙赣铁路以南、瓯江流域和浙闽边境等地，部署正规军和地方部队 10 万余人，对红军进行“围剿”。

为了对付敌人的“围剿”，1937 年 1 月底，红军挺进师在泰顺县峰文村重建红十九师，红十九师下设三个团和一个师直属教导队。红十九师组建后的第六天，敌人就向峰文发起进攻。峰文战斗是红军挺进师在闽浙边与敌作战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战斗。红军挺进师和新编红十九师投入兵力 1100 多人，国民党军有浙保第二团、第三团和八十师的一个团共 3000 多人。当年苏联《红星报》曾报道过峰文大战的消息。

2 月 8 日，为了避免和占优势兵力的国民党军队硬碰，刘英、粟裕决定将部队分几路撤离，主力由粟裕率领，暂时到泰顺中部山区游击，刘英率省委机关人员、省委教导队和红十九师的部分

战士转移到平阳南部一带活动。

2月19日，省委机关及教导队100多名战士转移到平阳县玉苍山增瓠（今属苍南县）休整。第二天上午与国民党军十九师遭遇。打仗一整天，红军被赶来增援的敌军包围在一座孤山上。刘英率部突围时，又遇敌人伏击，红军十九师师长罗连生中弹负伤，被俘叛变。省委教导队战士保卫省委机关领导，战斗至天黑，终于冲出敌人包围圈。辗转几天后，重返泰顺县峰文乡董家坪村。

这次战斗后，红十九师的番号消失。罗连生的叛变，使敌人查明临时省委和省军区及挺进师的主要负责人都在泰顺山区，红军的实力完全暴露。因此，国民党第十九师、独立第九旅、浙保第二团第三团第四团和八十师及闽保第四团第六团，从东、西、南三个方向蜂拥而来，企图一举将红军挺进师合围聚歼在泰顺、福鼎、平阳三县交界地区，形势十分严峻。

为了跳出敌人的包围圈，2月下旬，刘英在泰顺县松垟乡天门下村牛童往的一座茅草屋里，召开省委紧急扩大会议。会议决定采取与敌人相向而进、易地而战的打法，将部队“化整为零”，转到敌人的侧翼和后方打游击，或到敌人不大注意的地方隐蔽起来。牛童往会议过后，刘英带领省委机关教导团短枪队撤离泰顺，几经周折，于3月28日夜，急行军抵达瑞安，渡过飞云江，跳出重围。粟裕率领部队前往泰顺卢梨村，与敌人展开捉迷藏似的周旋。当发现漫山遍野都是国民党军、反共义勇队、壮丁队，粟裕毅然率部北撤，突破国民党军队数道封锁线，回到龙泉以北的原浙西南根据地。

挺进师突围离开泰顺后，中共瑞平泰县委和泰顺县委的干部仍就地坚持斗争。地方武装力量顶着巨大的压力，与敌展开殊死斗争，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敌兵占领了泰顺各大村庄，修筑碉堡 280 余座。同时，实行移民并村政策，反复进行“清乡”，并配合搜山、烧山等做法。国民党当局还公布了所谓“十杀无赦”的条令，施行“连坐法”。

红军挺进师撤离泰顺时，将 30 多名重伤员交托给泰顺县峰文乡双溪口村等党支部。双溪口党支部黄明星临危受命，发动当地党员和革命群众，利用本地复杂地形，以山洞为居所，建立“红军医院”，安排伤员养伤。在面对敌人封锁、搜查、拷打、屠杀时，当地党员干部克服重重困难，历尽千难万险，甚至付出惨重的牺牲。据峰文钓鱼坑村 86 岁的老人林秉吨回忆，钓鱼坑赤卫队员、红军伤病员护理员沈希怀，为了保卫红军山洞医院，被敌人投入大木桶，用开水活活烫死。后因双溪口山洞医院暴露，十几名伤员秘密转移到灵家山继续疗伤。灵家山现年 80 岁的周祖员，小时候常听长辈说起保卫“红军山洞医院”的往事。当时，进山洞的伤员面色十分憔悴，有的伤口已经化脓，村里两位民间医生周福善、周福坤冒着生命危险为伤员医治，村民按着方子上山挖草药。一次，国民党军逮捕了灵家山 12 名党员群众，在各种酷刑之下，没有一人出卖红军伤员。经过八个月的反“清剿”斗争，红军病伤员在党组织和革命群众的掩护下，同敌人、同饥饿、同病痛作斗争。最后，他们大都恢复了健康，重新走上了战斗岗位。

在国民党军队大肆“清乡”期间，泰顺境内共有 456 名干部和群众为保卫革命根据地英勇就义，有 4424 间民房被国民党当局烧毁。

### （五）奔赴抗日前线

为实现中共中央提出的“团结抗日”主张，临时省委和红军

挺进师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政治上和浙江国民党当局开展了一系列的斗争。

1937年3月25日，临时省委和省军区发出《快邮代电》，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要求国民党派代表与红军方面谈判。九峰山后村现年85岁的老人施巨生，1937年时正是7岁的少年。施巨生老人回忆，当时刘英就是在他家里连夜起草并刻印了20多封《快邮代电》，年少的他当时并不知道家里来的就是省委书记刘英。见证了这段重要的历史，老人至今感到无比自豪。

5月至6月间，临时省委相继发出《为团结御侮共赴国难以及和平谈判破裂告各界人士书》《呼吁各界人士要求当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宣言》。8月24日，挺进师方面派吴毓、黄耕夫和陈铁军为代表前往温州，在温州申江旅馆与国民党当局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9月16日，刘英在平阳县山门会见了刘建绪的代表，商定红军集中的地点由泰顺峰文改为平阳山门，集中的最后期限为10月1日。

9月中旬，坚持在泰顺及边区的60多名干部和红军伤员按时赶到山门集中。刘英同时派出张文碧到浙西南寻找挺进师师长粟裕及其部队，集结到80名红军战士。10月份，集中山门的红军战士达三百多人。部队番号按和谈协议改为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粟裕任队长，刘英任政委。开赴前线之前，抗日游击总队抓紧时间开展军事政治训练，积极吸收新战士入伍，仅泰顺月湖乡柘坑下村就有十多名青年参军。

1938年3月上旬，东南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曾山到达平阳山门，传达东南分局指示：（一）浙江红军部队改编为新四军，尽早出发，往皖南泾县集中。（二）撤销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中共浙江临时省委，等中央批准后，转为正式省委。（三）

粟裕率部赴皖南前线，刘英和一部分干部及三个短枪班留在浙江坚持斗争。3月18日，粟裕率领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500余人从平阳山门出发，经丽水、衢州等地，最到达皖南，被编入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三营，粟裕任第二支队副司令员。

红军挺进师在浙南的游击战争，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牵制和消耗了国民党军的大量兵力，有力地掩护和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同时积累了丰富的游击战争经验，培养了大批革命新生力量，为浙南的提前解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挺进师在浙南的革命斗争是中国南方革命的一个战略支点，在以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 （六）传承红色精神

相伴历史，让时光更觉温纯；守护遗存，让历史焕发光彩。白柯湾原村党支部书记卢立明有个雷打不动的习惯，每天清扫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旧址小宫庙旁的落叶，掸去临时省委领导刘英、粟裕办公旧址内的落尘。如今，泰顺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旧址，已被列入《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第二批名录》。白柯湾小宫庙会议旧址、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纪念馆等多个红军路沿线景点，已成为浙南地区重要的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吸引三万多人前来参观。

泰顺作为浙南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深深地烙着红色印记，曾书写着烽火岁月的光荣与神圣。为了加大红色革命胜迹的保护和利用，泰顺县委、县政府大力推进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纪念馆、中共浙南特委纪念馆等场馆的改造，建设配套设施等，工程计划于2017年完成。今年政府投入资金，拓宽了泗溪镇通往白柯湾



的道路，旅游大巴也能直接开进白柯湾村。同时，在当年红军活动主要区域兴建浙南红军路（竹岚脚－峰文－铁炉岭段），公路全长 27 公里，总投资 1.61 亿元。工程已于今年 9 月开工建设，建成后的红军路将极大地改善老区人民的出行条件，大大方便了游客探访革命旧址。

红色基因正在为绿色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根据泰顺红色旅游整体规划，未来的泰顺红色旅游，将在重走红军路、聆听红色故事、唱响红色歌曲之外，以九峰省级风景名胜区的优美自然环境为依托，以工农红军红色文化为主脉，结合农业生产和乡村特色旅游项目，形成“一条红色路，一群彩色村”的红色旅游格局。

泰顺是革命老根据地县和典型的山区县。近年来，当地党委政府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老区精神，紧紧依托绿水青山，一以贯之地坚持“生态立县、绿色崛起”战略，致力打造廊桥国家公园。相继获得了“国家生态县”“中国廊桥之乡”“中国名茶之乡”“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中国市场投资开发第一县”等美誉，被列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示范县、国家主体功能区建设试点县、国家级生态保护与建设示范区，同时还被评为“中国最美乡愁旅游目的地城市”“中国生态养生旅游目的地”“浙江省十大养生福地”等，泰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发展之路越走越宽。

传承历史，汲取力量，我们将永远铭记在这片土地上战斗过的先辈，是他们开创了一段难以磨灭的光辉历史，留下了宝贵精神财富和精神动力，激励泰顺人民在追求幸福生活的道路上奋力前行。（陶汉心 虞佳琳）

## 继承革命光荣传统 推进绿色赶超发展

——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 80 周年纪念大会隆重举行

（《今日泰顺》2015 年 11 月 7 日专刊）

追忆浙南烽火，传承革命精神。11 月 7 日下午，纪念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 80 周年大会在我县隆重举行，热烈庆祝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 80 周年。

中央纪委原副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书记刘英烈士之子刘锡荣，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组织部长粟裕同志之子粟戎生中将；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宣传部长兼少共省委书记叶飞同志之女叶小楠，省委常委、温州市委书记陈一新，中共浙江省委原副书记陈法文，中共温州市委常委、秘书长仇杨均，县委书记张洪国出席并在主席台就座。会议由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金延锋主持。

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及挺进师领导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代表；省、市及温州市所属各县（市、区）党史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温州市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县四套班子成员和各有关部门、乡镇主要负责同志，泰顺“三老”人员和老同志代表，驻泰部队代表，少先队员、青年代表和群众代表等应邀出席会议。

80 年前，浙南山区卓绝革命、红旗不倒；80 年后，这里发展如歌、风景如画。

深秋时节，天关山麓分外妖娆。参加纪念大会的各界干部群众代表意气风发，他们是泰顺这片红色热土建设与发展的参与者、

见证人。在今天这个历史性的日子里，自豪喜悦写在每个人脸上，大家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里，共同纪念这个伟大日子。

刘锡荣代表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领导亲属讲话，回顾总结了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的光辉历史，充分肯定了此次活动举办的意义及老区近年来的发展。他深情地说，作为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及挺进师的后代，能够借此机会欢聚一堂，追忆父辈，承上启下，继往开来，对活动的举办表示衷心感谢。

刘锡荣说，泰顺县是地处边远的革命老区，改革开放以来，泰顺老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将当年不畏艰险，马上打天下的革命精神，化作了敢为人先、马下建天下的改革开放精神，摘掉了贫困的帽子，发展成绩令人欢欣鼓舞。今天，我们为之奋斗的伟大中国梦，实现千百万人民英雄美好崇高的理想，就是对他们英灵忠魂的最好告慰，希望老区人民能够更加紧密的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陈一新在讲话首先代表省委和温州市四套班子深情缅怀为浙南革命做出卓越贡献的老一辈革命家和为浙南解放事业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向所有的老红军、老党员、老同志和革命先烈的亲属表示崇高的敬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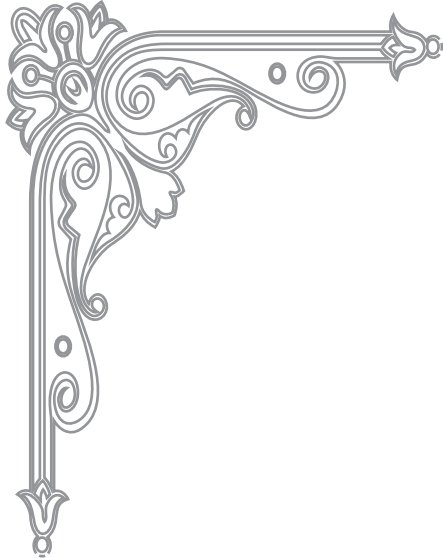
陈一新强调，党史是资政育人的最好教材，是永葆共产党人先进性和纯洁性的营养剂，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弘扬伟大的革命精神，就必须始终坚定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我们一定要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始终拧紧理想信念这个“总开关”。

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弘扬伟大的革命精神，就必须始终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我们要继续坚持用好党的群众路线这一重要“法宝”，坚持人民群众主体地位，以共享发展的理念引领广大人民群众创新创业，使党的执政基础坚如磐石。

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弘扬伟大的革命精神，就必须始终抓好科学发展这一第一要务。我们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统领，以“五大发展理念”为引领，以“八八战略”为总纲，以富民强市为追求，以全面转型赶超为主线，深入实施“五大战略”和“十大举措”，加快推进温州赶超发展，高水平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弘扬伟大的革命精神，就必须始终大力支持革命老区的发展。革命老区是我们党发展壮大的摇篮，老区人民为党的事业发展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代价，我们必须要坚持协调发展不动摇，以切实有效的举措帮助、支持和推动革命老区加快发展，努力使老区人民早日脱贫致富，过上幸福生活。

张洪国在致辞中表示，泰顺作为革命老区，深入挖掘、整理和研究泰顺的革命历史积淀以及红色文化内涵，传承和发扬好革命精神，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泰顺县委、县政府将以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80周年纪念活动为契机，进一步传承弘扬优良传统、红色文化以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革命精神，为开创泰顺绿色赶超发展新局面、打造“廊桥国家公园”新目标注入新的活力。（陈祥磊 曾敏婷）



# 附录







## 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 80 周年 纪念活动来宾名单

- 刘锡荣 中央纪委原副书记，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书记刘英之子  
粟戎生 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中将，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组织  
部长粟裕之子  
陈一新 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温州市委书记  
陈法文 中共浙江省委原副书记  
叶小楠 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宣传部长兼少共省委书记叶飞之女  
叶葳蕤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外事局原副局长，中共闽浙边临  
时省委宣传部长兼少共省委书记叶飞之女  
阮朝阳 解放军总装备部综合计划部原部长、少将，中共闽浙边  
临时省委委员阮英平之子  
范希健 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委员范式人之子  
金延锋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仇杨均 中共温州市委常委、秘书长  
鞠 开 粟裕同志秘书  
郑正祥 浙南革命委员会主席郑丹甫亲属  
李 顺 浙南革命委员会主席郑丹甫亲属  
詹黛薇 刘锡荣同志夫人  
张婉如 陈法文同志夫人  
钟德沪 阮朝阳同志夫人  
徐迪民 鞠开同志夫人

- 阮 闽 阮朝阳同志之子
- 王红兵 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参谋长王蕴瑞亲属
- 王 瑞 刘锡荣同志秘书
- 杜金勇 粟戎生同志秘书
- 陈 峰 福建省公安厅技侦大队大队长，泰顺籍新四军陈辉之子
- 张 敏 中共温州市委副秘书长
- 朱 健 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副巡视员、宣教处处长
- 包晓峰 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一处处长
- 沙 勋 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办公室主任科员
- 韩 卫 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 王琼烽 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综合处处长
- 樊孟军 宁波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 赵降英 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 赵万磊 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 张 林 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综合处处长
- 郭东升 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综合处副处长
- 盛 璆 江西省上饶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 王智勇 湖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 何飞龙 湖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科员
- 叶永强 嘉兴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 吴晓华 金华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 包江雁 舟山市史志办公室主任
- 胡和平 丽水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 许宏志 台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副调研员、综合处处长
- 林小露 共青团温州市委书记
- 李方华 温州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

陈建中 温州市新四军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程雪朝 江西省德兴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毛丽珍 福建省福鼎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朱冬洋 福建省寿宁县党史研究室主任  
郑明华 福建省福安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洪关旺 松阳县史志办公室主任  
蓝飞鹏 遂昌县史志办公室主任  
李岳松 温州市鹿城区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孙作材 温州市龙湾区委党史区志办公室副主任  
李 展 温州市瓯海区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卓桂荣 温州市洞头区委党史区志办公室主任  
章华虎 瑞安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谢向荣 永嘉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林 强 乐清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钟雪华 文成县委党史县志办公室主任  
陈 敏 平阳县党史研究室主任  
钱克辉 苍南县史志办公室主任  
雷志华 宁德市闽东革命纪念馆馆长

## 泰顺县四套领导班子成员名单

- 张洪国 中共泰顺县委书记  
董旭斌 中共泰顺县委副书记、泰顺县人民政府县长  
胡荣登 泰顺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洪碧玲 泰顺县政协主席  
卢 斌 中共泰顺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周秀松 中共泰顺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雷全勉 中共泰顺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李 群 中共泰顺县委常委、纪委书记  
翁晓彬 中共泰顺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黄益友 中共泰顺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张建国 中共泰顺县委常委、副县长  
钱继华 中共泰顺县委常委、公安局局长  
叶加贤 中共泰顺县委常委、人武部部长

张美爱	泰顺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赖立峰	泰顺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陈志清	泰顺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童德平	泰顺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郭素琴	泰顺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杜成威	泰顺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雷子亮	泰顺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钱克忠	泰顺县政协副主席
胡昌迎	泰顺县政协副主席
赖立新	泰顺县政协副主席
胡兴田	泰顺县人武部政委
邹挺谦	泰顺县人民法院代院长
陈学志	泰顺县人民检察院代检察长
齐圣阳	乌岩岭管理局局长

## 纪念大会议程

主持：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金延锋

一、少先队员献词

二、泰顺县委书记张洪国致辞

三、中央纪委原副书记、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领导亲属代表

刘锡荣讲话

四、青年代表、共青团温州市委书记林小露发言

五、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温州市委书记陈一新讲话



## 纪念活动日程

11月6日

全体人员报到。地点：泰顺香洲开元大酒店

11月7日

8:00 全体人员乘车前往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纪念馆

9:30 挺进师纪念广场演唱革命歌曲

9:40 嘉宾及有关领导合影

10:10 闽浙边临时省委委员亲属及相关领导植树纪念

10:30 参观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纪念馆

11:30 全体人员乘车前往泗溪廊桥文化园

13:00 全体人员参观廊桥文化园

14:00 全体人员于廊桥文化园展厅观看木偶戏表演

15:00 全体人员于县影剧院观看纪录片

15:30 召开纪念大会

## 泰顺县情

泰顺县位于浙江南部，与福建交界，明景泰三年（1452）置县，取“国泰民安，人心效顺”之意。县域总面积 1761.5 平方公里，辖 9 镇 1 乡，总人口 36.7 万人。

泰顺是“红色之区”。1935 年 4 月，刘英、粟裕率领的红军挺进师进入泰顺，11 月 7 日在泰顺九峰白柯湾成立了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目前境内保存着中共浙南特委成立旧址等 20 多处革命胜迹。1988 年泰顺被命名为“革命老根据地县”。

泰顺是“生态之县”。泰顺是国家生态县、国家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示范县、国家主体功能区建设试点县、国家级生态保护与建设示范区。县域森林覆盖率达 76.7%，空气质量优良率、生态环境状况指数排名居全省前列，主要河道出水水质、出界水质均达到Ⅱ类以上标准。境内自然资源丰富，旅游资源单体总数 295 个，其中五级资源单体 3 个（廊桥、氡泉、乌岩岭）、四级资源单体 13 个、三级资源单体 66 个。泰顺入选“中国最美乡愁旅游目的地城市”“浙江省十大欢乐健康旅游城市”。

泰顺是“廊桥之乡”。现存各类桥梁 970 多座，古廊桥 33 座，其中 15 座古廊桥和“仕水矸步”被列为国家级文保单位，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闽浙木拱廊桥入选中国“世遗”预备名单。泰顺乡土民俗文化底蕴深厚，被列入国家和省市非遗名录 116 项。

泰顺入选“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浙江省第一批传统戏剧之乡”“第二批浙江省传统节日保护基地”。

泰顺是“养生之地”。拥有省级自然保护区、省级风景名胜区“承天氡泉”，被称为“神水宝地”“天下第一氡”，为全省两个4A级温泉之一。氡泉为国内罕见的高热含氡矿泉，表露水温54-62℃，含氡量21.4埃曼，具有40多种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具有极为显著的医疗、美肤和养生功效。泰顺入选“中国生态养生旅游目的地”“浙江省十大养生福地”。

泰顺是“印石之都”。泰顺矿产资源丰富，尤以泰顺石最为著名。泰顺石储量丰富，理论储量1亿吨以上，极具文化艺术创造价值和收藏价值，是与寿山石、昌化石、青田石、巴林石“四大名石”同等优秀的工艺石。泰顺龟湖被誉为“世界蜡都”。泰顺籍篆刻大家方介堪先生，为20世纪中国三大篆刻大师之一。

泰顺是“珍禽之家”。泰顺乌岩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原生态系统完整，动植物种类占全省一半以上，被誉为“天然生物基因库”和“绿色生态博物馆”，是世界唯一的黄腹角雉保种基地和科研基地。黄腹角雉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乌岩岭现存种群数量600多只，是目前已知的野生黄腹角雉最高种群密度区。泰顺被命名为“中国黄腹角雉之乡”。

近年来，泰顺县在省市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关心支持下，按照省市的部署要求，坚持“生态立县、绿色崛起”战略，经济综合实力不断增强，生态产业发展态势良好，城乡发展面貌日新月异，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2014年，全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4.31亿元，增长7.7%，“十二五”前四年年均增长8.9%；财政总收入8.22亿元，增长16.4%，年均增长15.3%，其中公共财政预算收入6.19亿元，增长10.2%，年均增

长 15.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2.58 亿元，增长 18.2%，年均增长 16.7%；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6166 元，增长 9.4%，年均增长 12.3%；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1739 元，增长 11.5%，年均增长 14.2%。在 2014 年度全市同类县绩效考核中，泰顺综合成绩排名第一，被评为“优秀单位”。